

國家發展研究

JOURNAL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STUDIES

第三篇 決斷與困惑·····	1
邵軒磊／自反而縮： 「文革」與日本中國研究學術社群的主體建立···	3
莊雅涵／妾身未明？ 石原慎太郎的世界觀與「中國」論·····	29
劉智瑋／面對中華思想：中嶋嶺雄解析現代中國·····	63
第四篇 從邊緣回寫·····	89
阮懷秋／大國的陰影： 越南《中國研究期刊》對越中關係的認識·····	91
顏欣怡／從殖民地看向東亞： 留日學生蔡培火的身分意識·····	119

第三篇 決斷與困惑

國家發展研究 第七卷第二期
2008 年 6 月 頁 3-28

自反而縮： 「文革」與日本中國研究 學術社群的主體建立

邵軒磊^{*}

收稿日期：2007 年 5 月 30 日

接受日期：2007 年 12 月 15 日

^{*} 邵軒磊，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研究領域為東亞政治、中國大陸研究，通訊處為 11605 臺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 64 號，電話：0911899262，E-Mail：93260505@nccu.edu.tw。

摘要

自 1962 年福特基金會事件之後，日本中國研究界注意到自我反省的意識，帶來了一波「學術社群的主體性何在」的思維。而隨著文革運動氣氛而逐漸升高，此一思維轉變為整個日本中國學界自我批判與左翼革命思維高峰。本文從「自我主體性」的觀點，以當時的研討會與代表性著作為研究資料，發掘當時的中國研究者的思想系譜，是將中國文革放在什麼樣的脈絡下來理解。在這段時期的主要特色是：知識論上的主體反省，藉由社會運動與研究者生命歷程結合，而且文革對於日本研究者的意義並非固定，而是在歷次事件中都有改變。研究者逐漸從「我與中國的關係為何？」的問題轉變為直接研究「中國是什麼？」，並由此建立自己的主體性。本文以此視角貫串，將此一歷史嵌合進入中國研究界 1962 年的福特基金會事件，以及 1970 年代末開始的「再評價」運動之中。瞭解這波造成整體日本中國研究界甚至整體思想界至今社會主義最大的高峰，不僅能對整體日本中國研究做出瞭解，更能對現在的日本民族主義思維有所認識。

關鍵詞：現代中國研究系譜、學術社群、文化大革命、主體性、
戰後日本

壹、研究背景

日本中國學界延續安保運動所提出的研究方向轉換問題¹，在 1962 年福特基金會事件²之後，更開始了一波學術社群必須加強自我反省的主張。³這個主張與運動隨著文革發展而逐漸升高，終於到達整個日本學術中國社群的自我批判運動與左翼革命思維的高峰，以 1971 年由朝日新聞社所召開的座談會「中國研究者的自我造反與自我批判」⁴做為代表。學界各個群體也在此時分裂與展開激烈論辯。文革結束後數年間，戰後的主流研究視角——革命史觀⁵逐漸消失，同時日本研究者對於從前中國的觀點與研究幾乎失去信心⁶，從而在 1980 年代展開了一波「再評價」風潮，並隨之提出種種新的亞洲／中國思維。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之下，

¹ 安保事件對史學界的變動有三方面：一、從「一國史」的思考模式進展到「東亞甚至是全球」的史學；二、「人民鬥爭」從觀念論到具體的研究；三、經濟史的研究焦點從「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的研究」轉變為「資本主義社會自身轉變方式」的研究。（柴田三千雄，1977：498）

² 原文為：アジア、フォード財団事件，又稱亞細亞財團／福特財團事件，以下簡稱「AF 事件」。指的是「在 1962 年 1 月到 7 月時，日本的中國研究者之間，發起了對於美國的亞細亞財團／福特財團的現代中國研究計畫的批判運動。」（山根幸夫，1983：503）簡單的說，是美國以鉅額金錢補助日本的中國學界，造成日本研究者對此感到憂心，認為美國「意圖不軌」。其中，福特財團主要是針對東洋文庫（中國研究部分），而亞細亞財團主要針對京都大學東南亞研究所（亞洲發展中國家及東南亞部分）補助，因此日本學者討論這個事件時，並稱其為「AF 事件」。此一運動可說是日本中國研究學術社群最重大的政治社會運動，也被認為是 1960 年安保運動的延長。

³ 同時社會上也有對於「近代化史觀」的反省風氣。由於在 60 年代所出現的公害問題，使得社會上對以工業化為主軸的近代模式懷疑越來越多，甚而帶來了對「近代主義」發展觀的批判。當時針對「近代化不等於進步」的觀點，提出只用「變動」（changing）來理解。（山室信一，2004：26）

⁴ 原文為：中國研究者の造反と自我批判。詳細的紀錄，於當時的《朝日雜誌》掲載，請參閱 Mark Seldan 等著，1970：17-25。

⁵ 革命史觀簡言之，就是依照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社會主義史觀模型，說明中國的歷史方向。中國到清朝為止是封建社會，中華民國是半封建社會……而與前兩者對立的現代中國是「正確」的。（國分良成，1995：1396-7）

⁶ 山田慶兒在 1967 年的《日本中的亞洲、非洲研究現狀與課題》（日本におけるアジア、アフリカ研究の現狀と課題）中，提出「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當時的《中國學研究者》對於現實認識的程度之低，令人驚訝。」（引自山根幸夫，1983：495）

本文著眼於日本學界在文革氣氛帶動之下，所發生的反省與主張其中的「主體性」，尤其以戰後第二代的學者的觀點而言：文革是讓日本反思「亞洲能不能自我變革？」的同時，也帶有對日本自身命運的自憐與對現狀打破的渴望。（野澤豐：1998：115）深究此言背後的意義，正是作為日本自身主體性的建立以及學術要如何研究的重要思維歷程。

因此，本文從福特基金會事件落幕之後的 1963 年開始，闡述之後的文化大革命、學界自我批判風潮與學術社群分裂等事件對日本學界帶來的影響。綜觀而言，在文革的衝擊下，日本社會上爆發了最後一次大型學運（1969 大學占領事件）；而同時戰後第一代研究者也於文革後期開始告別人世，逐漸進入世代交替。以此帶出其中 10 餘年間學界與此對應的自省與思想的轉變，並以「主體性」概念為核心整理出文革時期日本現代中國研究的思想系譜。本文指稱的主體性，是以「需不需要他者證成」做為基準，也就是說，在中國研究者敘述中國的時候的重要參照點是「我（日本）與中國的關係」亦或是能夠「直接描述中國」的兩種不同的思維，代表著「自我存在」是否已經確立，也就是主體性的「從無到有」。在之後的文獻分析中，將處處能夠看到研究者對於此種研究前提的轉向。瞭解這波造成整體日本中國研究界甚至整體思想界對於主體思維最大的高峰，才能對現在的日本民族主義思維有所認識。

貳、文獻回顧與研究架構

本節藉由對「文革時期日本學界」研究文獻的回顧，來說明現今文革對日本學術界影響的普遍性看法。首先從研究方法的變化來看，中國研究的知識論問題有兩期的轉變：在文革之前主要是從「意識形態途徑」，也就是將所有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行為與政策都歸類到社會主義進程中解釋。甚至把「新中國」視為社會主義在亞洲的實現，並加以無條件的支持與讚美。（姬田光義，2000：21）直到 1970 年代之後中國政府

自身否定文革，由此研究者對於中國與中國革命能夠客觀看待，把中國當成「普通」的國家，回到了普通外國研究的基礎上。（伊藤一彥，1990：3-4）而進一步在立場上，久保與江田也強調意識形態的對立面⁷。從以上關注研究方法的文獻指出：日本學界在 1960-70 年代達成了研究方法的轉變。

轉變的過程關係著學術社群之間的論爭。既有的文獻指出，戰後日本中國學界長期以來分為兩派，一方堅持科學與客觀中立研究，而另一方更強調中國研究的目的性與道德性，兩者間針鋒相對，經過一個時期⁸的分裂與混亂。（久保亨、江田憲治，2006：264）姬田也指出「1949-66 年時期是屬於不滿冷戰體制下的中國宣傳，而認為必須教育人民的一群人，與強烈反對這種論點的人的極端狀態。」（姬田光義，2000：21）尤其是文革時期「不僅政黨與大眾團體產生分裂，就連研究團體內部也產生分裂。」（里井彥七郎，1967：741）野澤的著作中也不止一次提到「分裂與對立」所造成的遺憾，諸如野澤提及：在文革中研究「組織分裂」的情況下，對新興理論並無共識也缺乏相互的討論，也因為學問見解與政治立場不一樣，也造成了感情對立。（野澤豐，1985：10）甚至影響到 AF 事件中達成共識的國際交流三原則⁹也呈現無法進行的狀態。（野澤豐，1985：5）

⁷ 「（1970 年代之前）是由兩種對立觀點組成，一方對革命有著感情，研究重心放在作為革命中心史觀的中國革命史，對於封建制開始到資本主義，接下去到社會主義這種馬克思主義的發展階段論，也就是對所謂的蘇聯社會主義的進程認識而存在。另一方則是納入美國的中國研究手法，對於中國共產黨的政治支配特質加以考察，對中國的經濟實態做出數量（量化）把握的調查研究，此種把握的形式基礎，通常立基於對於歐美的近代化過程與社會發展的模型與意識。」（久保亨、江田憲治，2006：264）

⁸ 尤其是在在「中國文革混亂與美國對於越南『侵略』（原文用語）失敗後，直到 1970 年代末期開始急速轉變。」（久保亨、江田憲治，2006：264）

⁹ 在 1962 年 5 月所召開的歷史學研究大會表達了反對「東洋文庫現代中國研究」接受福特基金的聲明；同時《歷史評論》也以特集的形式刊載了反對的文章。並以「學術民主」為由，號召舉辦研究會邀請正反雙方一起討論。並做成了有關學術國際交流的三個決議：「自主對等、不妨礙與其他國家交流、計畫內容成果公開」三項。（歷史學研究會，1962：24）

也有文獻將其歸因於「支持／反對」文革的脈絡：「對文革的不同看法，使日本的中國研究隊伍出現了嚴重的分裂，這種分裂後來擴大成為政治立場的對立和人與人的對立，危及了研究人員共同對話的基礎。」（何培忠，2002：111）。¹⁰嚴紹盪的文章中討論到支持與反對的原因，分別為：贊成者有：「一、在理論上信仰馬克思主義，對於中國充滿了信仰¹¹；二、從自己生存的實際情況出發而相信文化大革命¹²；三、少部分極端的個人集團者、投機取巧者與謀取私利的集團。」（嚴紹盪，2005：5）反對者則是：「一、執著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學者或文化人¹³；二、對中國歷史的發展和中國社會的真實情況比較瞭解的學者¹⁴；三、對中國革命精神感到恐懼的日本人¹⁵；四、長期敵視中國的日本人¹⁶；第五種反

¹⁰ 「現代中國研究者中對文革持肯定態度的人占多數，他們由於對前蘇聯和東歐國家的封閉狀況感到失望，而寄希望於中國來打破封閉，將紅衛兵對幹部和學術權威的批判理解為對官僚主義的批判。（何培忠，2002：111）另一方面否定文革的人認為，文革過於強調階級鬥爭，紅衛兵運動是將毛澤東絕對化。而與反右鬥爭時相同甚至是進一步擴大化。」（何培忠，2002：111）然而，對於一個國家的內政問題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反應，甚至影響學界達十數年之久，有必要進一步說明。

¹¹ 一些知識份子在年輕的時代就是在日本以及世界從事馬克思主義的運動，並且曾經為馬克思主義理想在國內和國外堅持過抗爭或進行過鬥爭。但是他們沒有在日本實現馬克思主義，卻在中國看見了馬克思主義國家的誕生，所以他們認為中國是馬克思主義成功的實例，並幻化成認為中國的一切都是馬克思主義的表現。（嚴紹盪，2005：4）描述的是支持革命史觀的心情，但對此評價為「然而他們沒能瞭解中國歷史的複雜性，也沒有能夠瞭解中國革命進程的複雜性。他們嚮往中國的道路卻沒有能夠完全理解中國的道路。」（嚴紹盪，2005：4）

¹² 而有很多日本人對自己生存的現實和日本的教育制度不滿。他們從中國的革命中看到了很多新鮮的因素。……他們沒有經歷過文化大革命本身，卻從革命的表層看到了與自己的情緒相契合的某些成分。（嚴紹盪，2005：5）指的是對於現狀不滿而藉由文革發洩的一群人。

¹³ 他們看到文化大革命是以文化為革命的目標，他們感到非常不理解，而且感到非常反感和憤怒。（嚴紹盪，2005：5）指的是對中國的傳統文化喜好的人。

¹⁴ 他們在自身的生存過程中，對中國的歷史和現實有很多的把握。他們認為這個革命是假借文化而進行的一場政治革命，而在革命進程中間又對中國的許多優秀知識份子加以政治迫害。（嚴紹盪，2005：5）

¹⁵ 日本長期以來對中國有一種恐懼感，他們覺得一個強大的中國必然會對他們造成威脅。中國的文革是以非常「革命」的姿態，把自己作為全世界革命聖地表現出來，有些日本人對此有一種非常恐懼的感覺。（嚴紹盪，2005：6）

¹⁶ 比如當時由日本的國會議員們組成的「青嵐會」之類。……他們對於中國發生的任何事情都要非議，都要反對抨擊。他們是一批敵視中國的「職業反華」的日本人，（也就是）具有日本國家主義、民族主義以及日本皇國國家觀念的分子。（嚴紹盪，2005：6）

對者是日本共產黨¹⁷。」（嚴紹盪，2005：6）也就是說，支持或反對者藉由文革議題表達自身的政治與利益主張。茲將既有文獻回顧以表一做出說明：

表一、研究文獻中對文革時的日本學界氣氛轉變的解釋

主要視角	代表文獻／寫作年代	文革對日本的影響
研究方法的轉變	伊藤／1990；姬田／2000；久保、江田／2006	主流研究方法由意識形態研究轉為實證研究。
研究團體長久以來的對立	里井／1967；野澤／1985；姬田／2000	戰後以來研究者對中國的研究感情的對立。
對文革的支持與反對	何培忠／2002；嚴紹盪／2005	以文革為中心，支持與反對的意見激化。

資料來源：由作者自製。

這三種解釋方法不一定是對立的，更多是呈現互相補充的情形。由以上的文獻回顧中，讀者能夠對文革時期的日本中國學界建立基本的圖像，也能瞭解到這段時期所產生的衝擊甚大，足夠作為一種歷史轉折點。但既有的文獻的解釋途徑有所不足，如：雖然能夠理解成支持與反對兩種觀點，但是這兩種觀點如何呈現？或是說如何放在整體知識社會學脈絡中理解？雖然有論者指出表述意見的成員的多樣性的理由與多

¹⁷ 從日文文獻中有如下說明：1966年3月日共領袖宮本顯治率領日本共產黨代表團，前往北京，意圖結成「反美帝侵略越南國際統一戰線」。但當時中共內部毛派與劉鄧正在激烈論爭，毛主張要「反美反蘇國際統一戰線」，日中因此不合。（參考小島優編，1996）而對於日中關係也產生影響，之後日中貿易促進會、亞細亞通信社解散。日中友好協會（親日共）與中國研究所（親中共）也因此分裂。自此，日本的中國研究又細分為親中共與親日共兩組。（山根幸夫，1983：504）這樣一來，社會主義者也不完全是站在同一陣線。

元立場（嚴紹盪，2005：5-6），然則大部分都具有現實主義色彩，也就是說，認定其為利益的視角是「現在的立場」，然而放在當時的歷史脈絡下能否如此理解？¹⁸其次，有竹內好等人的「中國文學研究會」研究中國文學哲學，屬於對中國傳統文化十分熱愛的學者。但與預期相反的，竹內對文革強烈支持，野澤認為他們受到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強烈。（野澤豐，1985：21）這樣一來，支持文革是不是「傳統文化人」的行為？或是什麼才是認定「執著文化的學者」之標準？很容易變成循環邏輯¹⁹。對於研究視角的轉變與研究團體的對立，則屬於現象描述性，使人想深入研究其內部動力與效應。

綜上所述，目前對於「日本對中國文革認識」此一議題，目前還是存有許多值得研究的空間。本文提出「主體認識」的觀點，將文革中日本文學的「自我批判」浪潮，結合 1962 年福特基金會事件的主體性反省浪潮，甚至上溯到戰爭結束以來，一直沒有處理的戰後心理重建²⁰的問題。本文以當時的研討會與代表性著作為例，發掘當時的中國研究者，是將中國文革放在什麼樣的脈絡下來理解的？而且與研究者的生命歷程產生了什麼樣的互動？在自我反省批判過程中將知識論上的主體反省，整個上升到社會運動，甚至是研究者的生命歷程之中，而且藉由中國文革作為標的開展。較諸以往對於文革影響的觀點，本文的「主體論」能夠將這段歷史嵌合進入中國研究界 1962 年的 AF 事件，以及 1970 年代末開始的「再評價」運動之中。

¹⁸ 如前文所指出的「對中國歷史的發展和中國社會的真實情況比較瞭解的學者」，現在看來可能合理的論述，但放在當時的脈絡中則很難具體理解。

¹⁹ 意思是說，並非由「不執著／執著」傳統文化來看「支持／反對」文革立場，而是由「支持／反對」文革立場來斷定「不執著／執著」傳統文化。

²⁰ 子安認為「日本對戰後的處理是以美國為核心進行的，這也使得日本對以亞洲為戰場的這場戰爭發生了誤解，而自己親手封住了根本改善與亞洲關係而重新發展建設的戰後日本道路。戰後不久出現了冷戰格局促使以對美關係為中心的日本急於完成對日後的處理。」（子安宣邦，2004：14）而擴大來看，其中非但沒有與亞洲國家間進行足夠的對話，甚至在日本國內自身的思辨都可能不足。

參、學界的主體性意識

戰後到 1960 年代為止，日本史學界長期壓抑的「研究與研究者的關係」問題，最早在 1962 年 AF 事件開始逐漸被意識，到文革時到達最高點。首先在 1960 年代開始，日本受美國的區域研究²¹影響，開始以國家為單位進行研究，同時研究結果有很高的政治色彩。²²在 AF 事件中，日本研究者對美國試圖使用金錢補助支配日本學界，甚至影響研究成果的行動為發端，對於研究者的「主體性」開始討論。AF 運動最終並沒有真正達到斷絕美國金錢援助，但代表的是，學界開始意識日本戰後長期沈潛的主體性與中國研究問題。在 AF 事件中，論述的策略是將美國比喻為日本舊帝國（蠟山芳郎，1966：120）並且意圖侵略亞洲，從而以「和平」作為主要觀點來反對美國補助。²³但在 AF 事件的討論裡，以否定美國的方法並無法真正處理發展的價值問題，在文革開始之前這種困惑與整個中國研究在方法上的心理困境，表現整體學界研究方法的不足，以及呈現出兩極化評價的價值對立現象。²⁴

具體而言，除了提出原有理論的侷限性²⁵之外，更要求研究者要有廣大的問題意識，諸如「1.中國史要如何作為日本學問而確立；2.中國

²¹ 區域研究在當時也是以歐美為中心編成的「近代」作為背景而生。（原洋之介，2003：11）

²² 初期的區域研究，研究者與被研究者有高度的不對稱性，對做為對象的區域情報蒐集並且「研究文化類型」的區域研究，作為一種學問體系，是含有高度政策目的性的實務研究。（原洋之介，2003：11-12）

²³ 蠟山指出：「從 1951 單邊媾和與日美安保開始，到 1952 年日華（台）講和，1953 年日本經濟恢復戰前水準，使得政經界乃至一般社會，『皇國主義』有復興的趨勢，但並未跟亞洲有來往，成為「脫亞」的戰後版。但不一樣的是，日本是做為美國的一部份對於亞洲（朝鮮、台灣、東南亞）滲透影響力。」（蠟山芳郎，1966：120）在這裡的說法中，表現了日本對於自己是否作為主體的高度敏感性。

²⁴ 當時對史學界的評論可體現當時研究視角與方法的不足：當時日中關係方面「政治史」與「思想史」截然二分的兩群研究。思想史研究的特點在於想要設定「日中關係的思想座標」；而政治史則是在既存的價值上，停留在反省侵略惡行與日中友好的範疇之上。（矢澤康佑，1962：673）

²⁵ 在從山本針對史學會創立 75 年以來，對史學界研究的觀察歸納發現：1.日本史

研究如何跟世界史理論與課題做出連結；3.中國與其民族的歷史發展內容為何？」（佐伯有一、加藤祐三，1965：725）表現在 1966 年對總體亞細亞史觀的再思考問題，由當時的重量級學者幼方直吉、遠山茂樹、田中正俊三人主編了《歷史像再構成の課題》（1966），其中對於「亞洲在世界史中的地位、研究方法的演變、日本人的中國觀」三個主題加以討論。可以發現日本知識社群在重要事件發生的時候，就會關心原本自己視角的正確性，而要求對研究對象的再定位，背後代表的正是對自身的再定位。在這些問題意識的背後，雖然隱含著要求對提出問題的主體加以思辯的動力，但不論是形式或是要求的答案，都在試圖回答「中國與我有什麼關係」，也就是處理主體的存在與中國的合一／分離問題。

在方法論上，部分學界人士嘗試引進科學與客觀主義。從 1964 年開始日本國內設立以民族學為主要研究途徑的「亞非語言文化研究所」²⁶。對此山本特別提及「一方面感到期待多方面的合作能使歷史研究者的視角多元化，但二方面也擔心『政治邀請』與『學術社會實踐』邊界不明會使歷史學喪失價值。」（山本達郎，1965：498）從山本的說明中可以感受到當時日本研究者的困頓與掙扎²⁷，想要尋求新的研究方法的同時

與東洋史學者缺少理論，而西洋史學者即使有理論，也是套用西方本來的理論。2.與國外相較，日本的史學研究種類太少，軍事史、海事史、科學史、技術史、思想史、文化史都不流行，而以社會與經濟史為研究大宗。3.與其他學科的連結太弱，對歷史學體系化有很大影響。（山本達郎，1965：498）

²⁶ 原文為：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所，簡稱 AA 研，設立於東京外國語大學內，而目標是作為跨學科領域與跨區域，而能提供日本國內與海外研究者研究資源的場所，請參考 http://www.aa.tufs.ac.jp/aa03_aa_overview_j.html 的說明。當時對於區域研究（日文：地域研究）一詞雖已經被學界接受，但 AA 研特地使用了「共同利用」一詞，但內涵與現今學界的區域研究理念完全相同。意指同時具有人文科學系與社會科學系特色的研究，最早包括語言學、歷史學、民族學等等，現在已經超越既有學科體系，而成為「跨學科式整合方法」（transdisciplinary research）（菅野卓雄，1999：2）。該所創立之後，很多研究機構（如文學部）也陸續接受以一國為單位的區域研究視角。現今主要研究指針為：1.東亞的社會變動與傳統文化的社會人類學研究；2.中國與周邊民族的交流與變遷；3.亞洲各地方的社會變動與比較文化研究（教育宗教等）；4.日本文化對亞洲社會的貢獻；5.現代化與文化變遷研究（以國際企業為中心）。（吉田辰雄，1999：9）

²⁷ 在 1966 年開始區域研究正式進駐了大學的文學部，山本認為「以國家為單位研究《歷史學的領域》，認為缺少文獻研究，而使得這種方法有所缺失。」（山本達

又擔心新研究方法的政治性。這種對問題意識的反省要求也影響當時對區域研究方法的觀感，甚至認為區域研究本身道德上有問題。如上原的批判：「美國現代區域研究就是把一國當作地方來研究，貫徹美國的區域地方化政策，甚至是想永久支配低開發國家的心理。」（幼方直吉，1966：141）以及宇野重昭批判「區域研究追求科學性的結果，使得研究有與中國的現實分離之虞。」（佐伯有一、加藤祐三，1965：726）中可以看出，當時日本學者對於將中國視為區域研究對象的主張²⁸，一直無法完全的接受。²⁹而不接受的理由，又幾乎都含有強烈的道德與動機意義，從這一點上可以發現當時已經進入主體建立的過程。

學界不只是採取上述區域研究的系統理解，更進一步引進了「比較政治」的方法。1967 年日本歷史學界由美國引進了比較政治的研究方法（市川健二郎，1966.12：90-98）被認為是對「除馬克思主義之外別無思想」的史學界帶來突破。（護雅夫，1967：697）比較政治作為研究方法，不需要討論被比較者的邊界與完整性，這個東西是作為研究者與讀者的共識而先驗存在，是在既存秩序下的研究觀念，同時也有強化現有秩序的感覺。1970 年代比較的範圍由國家擴展為文化，日本學界在 1971 年提出了比較文化論解釋「世界史要如何把握？」。主要來自於服部之聰提出「為什麼亞洲諸國中，印度成為殖民地，中國是半殖民地，日本卻能獨立？」這個問題，而主張要研究「中日韓比較史的認識」（尾藤正英，1972：900）主要的突破有兩點：首先再度解析馬克思主義中的亞細亞觀念，不再滿足於西方慣用理論的套用，其次要再一次辨明近代化論中「日本比中韓優越」的假設。日本即使把亞洲當作整體觀念加以

郎，1966：507）

²⁸ 而文革前更被批判為「缺乏帝國主義思維模式、缺乏階級支配觀點、菁英史觀」等等缺失。（佐伯有一、加藤祐三，1965：725）

²⁹ 一直到 21 世紀，對當時意義下的區域研究，都不甚諒解：「是以近代世界的再編為前提，擁有戰略的目的而出發的，就連美國的區域研究，都有這種強烈的傾向。」（原洋之介，2003：11）此處的「再編」，容易讓人聯想到非和平的意思。

研究，但也開始正視亞洲內部的差異性。在 71 年時大學中最新的學科即為「比較文化研究科」，被認為反映的是史學界對「史觀、研究方法、研究態度」的反思。（山本達郎，1981：27-8）

綜上所言，部分學界對於主體性的思維採取客觀科學態度從事區域研究，比較政治甚至是比較文化（人類學／民族學）的開展，採取價值中立的方式，其中問題主體的存在性就不證自明，甚至被刻意省略。但是雖然在比較與客觀研究上學界與研究者得以迴避自身何在的問題，但是並無法向別人說明自己的存在，可以說其自我關照的心理並沒有完全被滿足。於是當時的日本，在文革來臨時找到了另一波的主體成就路徑。

肆、學術社群的自我批判浪潮

從 1964 年開始，日中兩國簽署「日中記者交換協定」，使得日本人能夠親自看到中國（之前是只能引用西方媒體報導³⁰）。（山根幸夫，1983：503）這樣一來，能直接接觸到中國，使得支持社會主義中國的族群大為振奮，也使得文革的一手消息能直接傳達到日本³¹。在此一背景之下，前節所敘述之對於主體性認識的要求，也從文革與毛思想中，找到了可以正面主張的論述，而與當時的社會運動一起成長。文革中的毛思想要求藉由不斷自我批判來證成自我，從而每個人都必須藉由對過去自我歷史的檢驗，來重新認識自己。這種主張為主體性的要求帶來了一種完全不同於以往的思維，「對現在的中國理解而言，所謂的專家沒什麼用……專家的看法太過於狹窄，反而是不專家的人能說到重點。」（竹內好，1972。引自田中正俊，1968：525）也把主體建立的權力下

³⁰ 詳情參考《新中國年鑑 1967》（中國研究所編，1967）

³¹ 當時的持續交流，更使得中國青少年有機會訪問日本。據野澤的回憶，當時在中研的會議中，中國青少年報告攻擊黨中央的經過時，對當時的列席者都帶來了很大的衝擊。（野澤豐：1998：115）

放給學生，可以看到在學運與思潮的發展中，學生意識都扮演重要角色，甚至教授在道德上也必定要回應學生問題（石田米子等，1969：2）。當時的重要問題有：「大學是不是封閉的？中國研究是不是一種古董趣味？年輕人是不是不感興趣？」這些問題。（高橋孝助等，1968：757）這波浪潮與1968年9月到1971年9月中國本土發生的「鬥批改浪潮」（高尚斌，1994：64）的時間點幾乎吻合，而在形式上也多有相似之處。

初期對文革的評價是正面的，1968年田中正俊引用筑摩書房《講座中國》中竹內好的發言，歸納出當時中國研究的背景：一、受到文化大革命、日中國交未恢復、日中共分裂、美國的越南戰爭中對後進國的輕視影響，日本人對中國觀感不佳。二、日本人的中國觀是片段的，而且有意識形態過重之嫌。三、與其說是對中國的「知識」問題，不如說是對中國的基本態度問題。因此呼籲，對文化大革命不能採用「卑俗的權力鬥爭史觀，而必須對中國大眾有信賴與希望。」（田中正俊，1968：525）而且當時主要大眾雜誌也陸續對革命立場發表評論：「長征と出エジプト」（「長征與出埃及記」，住谷一彦，1967：33-61）與「現代中国と政治認識の問題」（「現代中國與政治認識的問題」，福田歆一，1967：33-61）等對於革命有著正面與積極的看法。

對東京大學而言，1969年的大學鬥爭事件，使得研究幾乎停擺。當年環繞反戰與文革影響，主要的思路都集中在對戰後「民主主義與近代化」思維做出反省，強調「人民」（非專家）的地位。如當年的歷史學研究會的主題是「帝國主義とわれわれの歴史学—国家と人民」而歷史科學協議會則是「アジアの変革における国家と人民」。不僅對於學問「所為何來？」做出質問，更對研究者的動機、研究制度做出討論，無疑的是當時重要的轉折點。而具體而言主要的反思有「日本本土研究理論的發展？」與「研究理論對於全體社會的位置？」

日本學術社群的重要面向則是社會活動，在1969年的「現代世界における研究者」（現代世界中的研究者）座談會中（石田米子等，1969：

1-30) 提出了中國研究者與學生、學問、大學、課題四個面向的關係。學生的自主團體在羽田鬥爭、日大門爭、東大門爭時以中國問題為槓桿來質問日本社會，比如說林彪的「人民戰爭論能否適用在日本？」等等討論。而這些都是研究者有義務要回答的(石田米子等，1969：2)。這樣一來與其說是對社會的關懷，不如說是「研究者被迫要將問題意識放在現在，不能只追求學術系統中的合理完整性，而更多要回答與現在日本的關係。」也就是西順藏主張的「觸摸魂的學問」(石田米子等，1969：6)。背後的意味就在於學術更進一步與社會連結。連結的方法就是在各種研究會、學會之中與群眾接觸。因此次年 1970 年代對於中國研究的回顧中，「有批判能力與否？」變成了當時中國研究社群的關鍵問題。而受到文革的帝國主義批判影響，當時的中國研究者對於自我定位與美日關係的反省，召開了「中国研究者の造反と自我批判」座談會(Selden，1970：17-25)，目的在於「藉由探討日本中國研究的目的，來考慮現在日本中國研究的現狀」(Selden，1970：17)。文中認為 1950 年代末期福特財團以政府力量為後盾，把價值觀與利害關係輸入日本，「收買學者」使得日本學界長期敵視中國的情形這二十年來情況都沒有變化。(Selden，1970：17) 反面來說，波多野認為日本在戰後缺乏敗北的認識，使得日本中國研究者在 1945 年之後雖然想要反省，但卻缺乏「方法論和新的問題系統」(Selden，1970：22)。當時這個研討會被認為是學界自我批判系列的高峰，引起巨大的迴響。

代表性的還有《講座日本史》(東京大學出版會，1971) 套書，其中五篇論文中的四篇，都是直接討論學術倫理學的問題，其中包括了戰後到當時歷史學作為學科的倫理學基礎的面向以及檢討帝國時期中歷史學為政治服務的性質，與提倡民眾史、抵抗史的研究視角(中村正則，1971：3-54)。以及社會科學概念與歷史學的關係，包括量化、理論化、與其他學科連結、實證研究作為方法論的正當性。(金原左門，1971：55-96) 以及對於歷史教學制度與國民意識的反省(山田昭次：1971：

173-200；佐藤伸雄、梅田欽治，1971：201-250）。這些文獻都由當時活躍的歷史學者所撰寫，不斷強調從「課題設定開始，就必須注意到學問的社會意義。」（荒井信一，1971：1）學問的社會意義放在知識社會學的面向之中，就是回應了研究主體建立的需求。

綜上所述，隨著文革進行的白熱化，日本學界從兩方面呼應這個趨勢：一方面將學術建立的方法「由下而上」，將學生的地位提高，並且認為學術也能從大學鬥爭中生成，甚至激進者完全不要學術只要社會運動。二方面則是道德意義完全處於優位，所有的研究成果必須有社會意義，更進一步要對之前的論述否定，也就是在主體性上不斷反省的功能。在這一波社會／學術運動中，學界承受了文革思想的重要核心，而沒有相應的社會政治動盪；也就是說，日本學界成為革命思想輸出的主要繼受國。在這些批判立場中，研究者不斷的在問自己「做中國研究的目的？」，意義在於處理自身（做為國家與個人）相對於中國的關係，是文革前期自我批判的特色。也就是說，在這一階段主體性的處理方法，是對於自身存在的意義加以詢問。但雖說如此，當時研究者只能以「複製」中國的批判態度所建立主體的脆弱面，到中國文革轉向時就完全被暴露出來，尤其是中國自身陸續否定文革之後，更讓這些支持中國的研究者幾乎失去立場，但也只有如此，才能建立真正的主體性。

伍、後文革時期的學術主體性

文革所帶來的批鬥否定觀點，也同時提醒了學界要有自身的立場，更增進了學界的主體性意識。如隨著批鬥劉少奇，否定劉少奇在之前新民主主義建設時期的經濟功績時，日本學者也順便發現這種中國的建設發展也並非如馬克思的社會主義藍圖一樣完美，而是充滿了嘗試錯誤，甚至對於學界之前對劉少奇的讚美產生懷疑。日本學界漸漸接受將中國放在一個理性的政治體系中做判斷與預測，意味著脫離討論與中國的關

係而試圖以普遍性來遠視中國，代表了主體性認識的一種階段。與此同時，中國被比擬於傳統封建中國的文獻也漸漸出現，以「東洋学から見た毛王朝」（宮崎市定等，1967：40-47）為代表，以「王朝史觀」來推論現在的中國，將中國比擬封建帝國³²在當時的日本是很罕見的。甚至具體主張「（中國研究）太過與研究對象密著而失去批判的空間，也缺少方法論的訓練。」（高橋孝助等，1968：757-758）依照此一評論，戰後日本學界常有將中國過度美化的傾向。

從學術社群間對於文革的看法與後來的演變，也能窺諸其中主體性思考的痕跡。竹內好作為文革支持派的代表，在《アジア學の展開のために》³³（竹內好，1972）的總論中表示「世界最先進的文明國是中國……這種文明觀能夠成為對近代歐洲文明變與自我反省的基礎。」（竹內好，1972：14-15）與竹內好同時代的中國研究者對文革分為支持與批判兩派，而幾乎沒有中間的立場；但相較之下，年輕世代中反而很多採取「文革懷疑派」的主張。主要的舞台（期刊）分別是：文革支持派有野村浩一在《世界》、批判派丸山昇在《文化評論》、懷疑派竹內實在《中央公論》。（野澤豐，1985：8）三者的立場鮮明，尤以表現在1972年的批林批孔運動評價之上。丸山對此評價為「十分複雜而令人奇怪」的現象；而竹內實則是將此運動理解為「周恩來引退劇」中的「國王與旗下派系間權力鬥爭」；野村則是將此運動上升到「一舉突破奴隸、封建、資本主義的三重歷史根源，也就是文革的頂點，全新的解放」。（野澤豐，1985：8）也就是說，從對於中共重大政治轉折的態度中，就可以看出學術社群逐漸朝向各個極端發展。

³² 一直到現在很多流行的「反對中國」論述中，將中國比喻為是封建王朝、帝國的形象，完全忽視民國的共和制度與中共的社會主義制度。

³³ 本書以每月一企畫的方式呈現，分別為：「總論、名與實—語言、華人社會—祖國、村—共同體、都市—人工的空間、音樂—感性的世界、民間信仰—民眾與神、國家—近代化的意義、文學—內與外的世界、技術、亞細亞主義—脫亞與興亞、十五年戰爭—善意與侵略之間。」（竹內好，1972）

在文革後期³⁴，尤其是 1971 年林彪事件之後，文革支持派無法以理性說明（甚至是以前正確而後來被鬥爭的人物與政策，如：劉少奇、鄧小平、林彪），只能緊抓者中國的任何行為並賦予更強大的道德意義。以批林批孔運動為代表，支持者固然依舊以道德絕對優位來說明，但是也意味著失去主體性，然而反對者與懷疑論者則已經逐漸跳脫這個脈絡。值得注意的是在文革前期（甚至 AF 事件時）採取高度批判立場的年輕的研究者群體，也逐漸轉為懷疑論或客觀研究論者，在將來的十年摸索期中可以看出這個群體的努力成果。與前期的「自我批判」運動做出比較，發現後期的論述中，比較不針對主體性做發言與反省，而是轉為對中國文革中的變化形式正面批判。甚至可以說是由於中國文革劇烈的鬥爭形式，使得支持者漸漸無法自圓其說，因此在「林彪（日本毛派十分支持的對象）反革命」最後到「四人幫逮捕」之後，可說是徹底使日本文革熱情幻滅。（姬田光義，2000：24）甚至文革結束後的《歷史決議》，讓很多這一代學者對自己從前的熱誠轉為失望，而停止研究。文革使中國研究界分裂，同時也造成支持文革學者因為中共 11 屆 3 中的轉向而斷然絕筆（川島真，1998：128）。

陸、結論

1962 年的 AF 事件，帶來了對美國甚至是近代主義的批判，造成史學界的廣泛再檢討風潮。日本學界從 AF 事件以來對主體性的反省需求，延伸到文革時期帶來自我反省的思維運動，造成了日本研究主體性

³⁴ 文革的階段劃分，大致上在中國的立場中將文革認為是 1966 年 5 月到 1976 年 10 月，其中分為三個階段，一、1966 年 5 月到 1969 年 4 月的九大；二、九大到 1973 年 8 月的十大；三、十大到文革結束。由《中國共產黨大辭典》和《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大辭典中》揭載，也是學術界對此的一致劃分。（高尚斌，1994：63）這也造成了日本中國研究界的幾次學術變動，在變動的過程中逐漸脫離原有認識框架的過程。

的決定。在以往的文獻研究中，往往將文革視為日本中國研究的負面因素，不只造成學術社群的分裂，同時也因為中國政治的混亂與轉向，使得很多學者對社會主義失望而離開中國研究界。但本文想要指出，在這些負面因素之外，文革帶給日本研究界的正是對中國重新思考的機會，甚至是對日本主體的「再定位」契機。再定位過程並不一蹴可幾，而是耗時十年，甚至可說是處理了日本戰後一直停滯的主體反省。

本文從主體性的立場來對日本「文革浪潮」加以闡釋，其中一條脈絡是科學與客觀主義所推至的「區域研究、比較政治、比較文化」系譜，藉由與被研究者疏離而不問自己所在，但在道德方面與當時的氣氛不合，因此成為思想界的非主流；另一條脈絡則受到毛思想的影響，以自我批判與社會運動實踐來確定自身。尤其在每一次文革的政治風向轉折，都帶來了研究者必須再一次反省自身跟隨中國的立場是否正確，也就使得中國研究者逐漸意識到自己主體研究的重要。也就是中國學者所評價：「文革暴露出的事實，不僅完全違背了肯定文革的人士的期待，也大大超出了否定文革的人士的想像。而且，研究人員發現，中國的問題也不是從文革開始出現的，而是早已有之。」（何培忠，2002：111）也就是說，文革對於日本研究者的意義並非固定，而是在歷次事件中都有改變。總之，若是要把文革理解為讓日本學術界派系對立激化的促進劑，則更應該認為文革不僅在思想上帶來了自我批判主體性思維，也在中共歷次的政治鬥爭中，強迫日本學者檢驗自身的主體性。伴隨著文革與日本國內的大學鬥爭所展開的「所謂舊權威與正統性的正面挑戰。」正是作為主體性建立所必要的叛逆期。

於是，主體性的建立逐漸從一開始對於自身研究動機的自我批判，演變成為文革後期能夠直接面對中國的研究，背後的意義是從關注「我與中國的關係為何？」轉變為直接研究「中國是什麼？」，這樣的轉變

研究者就能夠面對中國，成就自己的主體性。³⁵從這個觀點出發有之後對於「一次性認識」的強調，主張以實際接觸（田野調查）代替文獻資料的解讀分析，提倡使用傳記方法，而認為這樣能解決日本當前學術與現實疏離的問題。（山本達郎，1981：27）而在現實的歷史中，這樣的主體性建立的步調，隨著文革意外變動與研究者離世而過渡成為戰後第二代研究者的主要思維。

本時期的主要歷史意義，在於將日本學界藉此理清了 AF 事件以降「社會運動與學術研究」的形式，而在改革開放改變中國研究只能依靠官方資料³⁶的狀況，而重新以有另一層次的主體形式來研究中國。隨著研究人員以各種方式交流的增多，直接的往來成為可能，之後出現了一段「中國現狀熱潮」，進展到 1980 年代開始藉由對亞洲的思考而再次躍上舞台。尤其表現在冷戰結構崩潰與世界秩序重組的過程中，此時日本圍繞自身的定位問題，也漸漸開始將亞洲作為重要的問題區域，試圖重新加以構築。（子安宣邦，2004：57）日本在 21 世紀的今天，面對中國／亞洲也必然要面對主體性的問題，但現在必須更多的與其他國家對話共同參與互相的主體性建構，也是現今東亞歷史對話的重要意義。

³⁵ 正如石之瑜的研究指出：「日本知識界能不為中國而研究中國……，則自然中國就不在日本內部，日本也不在中國內部，中國與日本之間就成為津田左右吉追求的相互異別化關係。這樣的中國認識不為了任何人，是屬於世界的視角。」（石之瑜，2007：5）

³⁶ 伊藤認為在「戰後的冷戰構造下，研究（尤其是中國研究）受到政治的直接影響，對於中國自身的激烈變化有醒目的報導之外，由於資料不足，尤其是統計數字的不正確，只能停留在現狀介紹之上。」（伊藤一彥，1990：3）因此意識形態激化的形勢也此不無關係。

參考資料

日文文獻

- Selden, Mark, 幼方直吉、戴国輝、小島麗逸、加藤祐三、波多野宏一
(1970)〈座談会：中国研究者の造反と自我批判〉，《朝日ジャーナル》，1970年3月8日，頁17-25。
- 久保亨、江田憲治(2006)〈現代〉，礪波護等編，《中国歴史研究入門》，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發行，頁264-289。
- 小島優編(1996)《日中両党会談始末記：共同コミュニケはどうして破棄されたか》，東京：新日本出版社。
- 山本達郎(1965)〈総説回顧と展望〉，《史学雑誌》，74卷5期，頁497-501。
- 山本達郎(1966)〈総説回顧と展望〉，《史学雑誌》，75卷5期，頁505-508。
- 山本達郎(1981)〈あるアジア史研究者の歩み〉，《アジア文化研究》，13期，頁33-46。
- 山田昭次(1971)〈歴史学と歴史教育〉，《講座日本史》，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頁173-200。
- 山根幸夫(1983)〈現代：戦後の日中交流とわか国中国現代史研究の背景〉，山根幸夫編，《中国史研究入門》，東京：山川出版社，頁488-539。
- 中村正則(1971)〈現代民主主義と歴史学〉，《講座日本史》，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頁3-54。
- 中国研究所編(1967)《新中国年鑑・1967年版》，東京：極東書店。
- 市川健二郎(1966)〈比較社会構造論—アメリカから見たアジア史の捉え方〉，《東洋学報》，49卷2期，頁90-98。

- 幼方直吉、遠山茂樹、田中正俊（編），（1966），《歴史像再構成の課題：歴史学の方法とアジア》，東京：御茶の水書房。
- 田中正俊（1968）〈総説回顧と展望〉，《史学雑誌》，77 卷 5 期，頁 524-527。
- 田中正俊（1968）〈総説回顧と展望〉，《史学雑誌》，77 卷 5 期，頁 524-527。
- 矢沢康佑（1962）〈現代東洋史回顧と展望〉，《史学雑誌》，71 卷 5 期，頁 669-675。
- 石田米子、西順藏、野原四郎，〈現代世界における研究者〉，菅沼正久等編《講座現代中国》，東京：大修館書店，1-30。
- 石島紀之、山下米子（1964）〈中国をめぐるライシャワールの「新しい歴史観」〉，《歴史評論》，169 卷。
- 伊藤一彦（1990）〈日本の中国研究〉，安藤正士等編，《現代中国研究案内》，東京：岩波書店，頁 3-53。
- 吉田辰雄（1999）〈アジア・アフリカ文化研究所創立四十周年を迎えての回顧と展望〉，《アジア・アフリカ文化研究所研究年報》，34 期，頁 4-9。
- 宇野重昭（1964）〈アメリカにおける現代中国研究の動向〉，《アジア研究》，11 卷 1 期，頁 3-16。
- 竹内好（1972）《講座中国.1》東京：筑摩書房。
- 竹内好（1972b）〈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真の友好へ人民の前行進を〉，《朝日ジャーナル》，14 卷 54 期，頁 4-10。
- 竹内好編（1975）《アジア学の展開のために》，東京：創樹社。
- 住谷一彦（1967）〈長征と出エジプト—毛沢東思想と使命予言の現代的意義〉，《展望》，102 期，頁 33-61。
- 佐伯有一、加藤祐三（1965）〈総説回顧と展望〉，《史学雑誌》，74 卷 5 期，頁 725-737。

- 佐藤伸雄、梅田欽治(1971)〈国民歴史意識と歴史学〉、《講座日本史》、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頁 201-250。
- 尾藤正英(1972)〈歴史理論回顧と展望〉、《史学雑誌》81 卷 5 期、頁 508-512。
- 里井彦七郎(1967)〈東洋史近現代回顧と展望〉、《史学雑誌》76 卷 5 期、頁 741-753。
- 金原左門(1971)〈社会科学の諸理論と歴史学〉、《講座日本史》、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頁 55-96。
- 原洋之介(2003)〈アジア学の方法とその可能性〉、東洋文化研究所編、《アジア学の將來像》、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頁 1-33。
- 姫田光義(2000)〈中国革命與中国革命史研究について〉、《現代中国研究》、第 7 期、頁 16-27。
- 宮崎市定(1967)〈東洋学から見た毛王朝(座談会)〉、《中央公論》、82 卷 4 期、頁 40-47。
- 柴田三千雄(1977)〈総説回顧と展望〉、《史学雑誌》、86 卷 5 期、頁 497-499。
- 荒井信一(1971)〈序〉、《講座日本史 10 現代歴史学の展望》、東京、岩波書局。
- 高橋孝助、古慨忠夫、安井三吉(1968)〈東洋史近現代回顧と展望〉、《史学雑誌》、77 卷 5 期、頁 757-767。
- 国分良成(2000)〈建国 50 年—中国研究と中国近現代史の再検討〉、《北大法学論叢》、51 卷 4 期、頁 1390-1419。
- 野沢豊(1985)〈アジア研究の戦前戦後〉、歴史学研究会(編)、《アジア現代史》東京：歴史学研究会、頁 4-36。
- 野沢豊(1998)〈回顧と展望〉、《現代中国研究》、第 3 期、頁 101-118。
- 菅野卓雄(1999)〈アジア・アフリカ文化研究所創立四十周年を祝して〉、《アジア・アフリカ文化研究所研究年報》、34 期、頁 4-9。

福田歓一（1967）〈現代中国と政治認識の問題〉，《世界》，255 期，頁 25～52。

歴史学研究会（1962）〈フォードアジア兩財團の資金供與に關する
史学研究会總會の決議〉，《歴史評論》，143 期，頁 24。

蠟山芳郎（1966）〈殖民地獨立の時代と日本〉，幼方直吉、遠山茂樹、
田中正俊編，《歴史像再構成の課題》，東京：御茶之水書房，頁
85-124。

護雅夫（1967）〈東洋史總說回顧と展望〉，《史学雜誌》，76 卷 5 期，頁
696-701。

中文文獻

姬田光義（1967）〈現段階における中国近現代史研究の視角〉，《史潮》，
100 期，頁 201-209。

子安宣邦，趙京華譯（2004），《東亞論—日本現代思想批判》，吉林：
吉林人民出版社。

山室信一（2004）〈面向未來的回憶〉，中國社會科學研究會（編），《中
國與日本的他者認識—中日學者的共同探討》，北京：社會科學文
獻出版部，頁 13-31。

川島真（1998）〈近年中國史研究的變化〉，《台大歷史學報》，22 期，頁
125-136。

石之瑜（2007）〈退出中國—近代日本對華思想中的普遍性方法與政治
正確性問題〉，《中國大陸研究》，50 卷 1 期，頁 1-8。

何培忠（2002）〈戰後日本的中國研究：1945-1976〉，《國外社會科學》
2002 年第 4 期，111-112。

高尚斌（1994）〈關於文化大革命劃分的淺見〉，《黨史研究與教學》120
期，頁 63-65。

嚴紹盪（2005）〈戰後 60 年日本人的中國觀〉，《日本研究》2005 年第 3 期，頁 1-11。

Self-examination to Upright: Culture Revolution on the Subjectivity of Japanese China-studies Community

Hsuan-Lei Shao^{**}

Abstract

Since the Ford Foundation event in 1962, Japanese China-studies community started to notice thoughts on the identity of academic community. With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se thoughts transformed to become the epiphany of the community's self-criticism and Marxism. This article examined academic discussion and representative rese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lf identify" to explore the philosophy of

^{**} Hsuan-Lei Shao Ph.D.Student of Graduate Institute of East Asia Studies, NCCU. Research field : East Asia politics, China study. Address : No.64, Sec.2, ZhiNan Rd., Wenshan District, Taipei City 11605, Taiwan (R.O.C). TEL : 0911899262. E-Mail : 93260505@nccu.edu.tw °

China-studies back the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eriod are reflection of self identify in ontology, and entering the life of researchers through social movements. Moreover, the meaning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as inconsistent and changed over time. Researchers shifted their focus fro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to “what is China” and hence established their own identity.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study the history from the Ford Foundation event in 1962 to the re-evaluation movement in the late 1970’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peak of socialism in Japanese China-studies community. It will also be beneficial to understand Japanese Nationalism.

Keywords: Culture Revolution, Genealogy, Modern China Studies,
Post-war Japan, Subjectivity

國家發展研究 第七卷第二期
2008 年 6 月 頁 29-62

妾身未明？ 石原慎太郎的世界觀 與「中國」論

莊雅涵^{*}

收稿日期：2007 年 5 月 30 日

接受日期：2007 年 12 月 15 日

^{*} 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研究生；Email:yahanduken@gmail.com

摘要

石原慎太郎是當代日本民族主義政治家的要角，但他追求「正常國家」的論述仍離不開戰前日本以「中國」為參照點，俾能超越亞洲、與西洋大國平起平坐的問題意識。本文整理石原慎太郎的從政歷程以及他對於美國、中國的各種批評，認為他的國際關係圖式帶有大正昭和年間日本由「脫亞」轉回「興亞」，期望共興亞洲以抗歐美的色彩；但由於當代中國的崛起，使石原慎太郎無法效法戰前右翼收編中國，反而徘徊在歐亞之間，對日本的位置更趨困惑。

關鍵詞：亞洲、亞細亞主義、中國、冷戰、石原慎太郎、日本、
正常國家

現任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是當今日本右翼政治家中的代表性人物。1989年，他以「可以說 No 的日本」在日本暢銷一百萬冊，書中挑戰美國霸權的犀利觀點引起美方震撼，從此贏得「Dr. NO」的諺稱；1999年4月，他以超黨派之姿在東京都知事選舉中獲得壓倒性勝利，使一海之隔的台灣與中國對此結果呈現兩樣情懷¹；就任以後，毫不遮掩親台反中立場的他頻頻挑動中日台間的敏感神經，各種歧視性的發言²和鞏固右翼國家觀的舉措³也屢屢招來國內外爭議。2007年4月，在自民黨支持下，石原慎太郎又在東京都知事選舉中獲勝，堂堂邁入他的第三個任期。文學家出身的石原慎太郎不僅是位政治人物，也具有文化影響力，早年他以文學和電影在日本社會掀起旋風，引領大眾文化的流行；步入政壇後他仍寫作不輟，持續在報端發表政治評論，同時也涉足小說、電影編劇，且親自製作有線電視節目《東京男孩》，以荒謬搞笑的形式在節目中談論時政和日本歷史。雖然石原慎太郎只是地方首長，而非掌握日本外交的中央決策者，但向以直言著稱的他在各種議題上皆有鷹派立場鮮明的發言，能幫助研究者清晰掌握日本右翼的歷史認知和國際觀，而其政治生涯中的連戰皆捷，亦顯示其觀點能抓住日本社會的主要矛盾。本文將透過整理石原慎太郎的人生歷程與國際政治觀點，討論日本右翼如何在「歐」「亞」間自我定位。本論文的寫作前提是：近代日本

¹ 台灣媒體除了強調石原的右派立場之外，皆不忘提及石原「對台灣友好」、「曾允諾邀請李總統訪日」，呼應著李登輝任內積極建構台獨論述基礎、尋求重新詮釋台日關係的氛圍；相較於此，中國大陸對石原的批判卻是不假辭色，稱呼石原為「軍國主義的招魂者」、「中日關係的雜音」等等，還未待到石原正式就任市長，各方便隔著兩國媒體唇槍舌戰。

² 如2000年4月間在公開場合指東京地區應慎防「非法入境的三國人犯罪」，雖曾發表書面聲明道歉，2003年4月與2006年9月間仍再次發生類似發言，引起聯合國「人種歧視排除委員會」關注；2001年11月接受雜誌專訪時指「失去生殖能力的女性是無用之物」而遭到婦女團體控告，要求賠償精神損害並登廣告道歉，兩度審判都判原告勝訴；2000年七八月間則陸續發言指同性戀為「異常」且「落後」，且在東京都促進人權綱領中刪除對於同性戀的保障條款；2004年又公開指「我不得不說法語沒有資格成為國際性語言，因為它不能數數」而被21名在日本的法語教師告上法庭要求賠償。

³ 即要求市內公立學校使用「新版歷史教科書」，以及每年參拜靖國神社之舉。

在現代化的過程中為了成為符合歐美標準的文明大國，在歐洲與亞洲之間持續轉換與再定義其自我認同，而由於日本歷史上與中國的深刻聯繫，每一次的自我再定義，亦要重新處理「中國」的意義。本文的寫作目的，便是整理石原慎太郎關於美國與中國的言論，從而探討其自他認識與戰前日本退出中國的過程相比，有著哪些「變」與「不變」。

本論文共分為五段：第一段介紹石原慎太郎的身世背景、崛起文壇之路、以及日後從政的轉折；第二段介紹戰後日本從「經濟大國」逐步邁向「政治大國」的道路，和該期間外交政策的挪移；第三段、第四段分別整理石原對於美國與中國的批評，第五段同時也是結論，將為對石原的國際關係觀點提出總評。

壹、「太陽王」的誕生

1932年9月30日，石原慎太郎出生於神戶市兵庫縣。他的父親是一名白領階級，在山下輪船公司擔任主管。1937年，由於父親工作之需，舉家搬遷至北海道的小樽，在那裡石原兄弟度過一段優渥愜意的童年時光，就讀全市最好的私立小學，生活絲毫未受到中日戰爭衝擊。1944年，石原全家又搬回東京附近的湘南地區，不久，父親在上班時間因心臟病發去逝，家中頓失經濟依靠，身為長男的石原慎太郎毅然挑起家長責任，協助母親度量支出（石原慎太郎，1987：46）；同時，他的弟弟裕次郎加入鎮上幫派，動輒與警衝突，因此慎太郎必須扮演父親的角色，管教弟弟的起居行止（Nathan, 2001）。高中畢業後，石原慎太郎便休學在家，照顧母親與弟弟。

1950年，在家庭長輩的建議下，石原慎太郎放棄原本心儀的法國文學系，進入一橋大學會計系就讀。大學三年級時，同學邀他投稿《一橋文藝》雜誌，他以弟弟裕次郎及其朋友們放浪不羈的生活為藍圖，創作了第一篇小說〈灰色的教室〉。小說獲得的好評令石原大受鼓舞，乃著

手撰寫中篇小說〈太陽的季節〉參加雜誌《文學界》（《Bungakkai》）舉辦的新人獎，隨即得到首獎。故事描寫一群年輕人在親密關係中的迷惑：拳擊手龍哉與少女英子相戀，年青的他無法捉摸心中情感，先與兄長打賭將戀人「讓」給哥哥，與女友修好後卻發現其懷孕，左右為難之下還是要求英子墮胎，卻以手術失敗、英子併發腹膜炎死亡作結；整篇小說圍繞著男主角龍哉迷惘的內心世界，他從未考慮過英子的需求，即使在戀人的喪禮上面對其親人責難時，他心中的獨白只有「這一切你們都不會瞭解的！」

這部作品獲得了《文學界》評審的一致讚賞。在美國甫結束對日佔領，日本「五五年體制」⁴確立的1955年，當時成熟作家的作品往往仍無法擺脫戰爭記憶，充斥著大戰夢魘的囁語，而《文學界》獎項的評審群則為〈太陽的季節〉所描摹的年輕人面貌所動容，認為該小說成功地以「『十足的隨意口吻』（utter casualness）傳達了邊緣青少年的憤怒與敗德」，恰恰呼應著世界戰後文學（après guerre）的潮流，表現了新世代面對戰爭創傷的憤怒、迷離、自我放逐（Sherif, 2005：195）。1956年初，這篇作品又獲得了文學界的大獎《芥川賞》，然此決定隨即引起社會譁然，作家 Nakano Shigeharu 直批此乃玷污芥川獎的悠久傳統與地位，另外還有數位作家亦表示芥川獎不該肯定此種「任性青年的猥褻文學」⁵（謝志宇，Ibid：234）。

⁴ 1955年，日本的左、右兩派政治勢力相繼完成整合，並在眾議院大選中囊括97%選票，自民黨與社會黨的力量形成2：1的對比。這一對抗格局後被稱為「55年體制」，以保守獨裁的作風主宰日本內政將近四十年，直到1993年大選，自民黨失去獨大優勢被迫組成聯合內閣，55年體制才告崩解。「55年體制」所彰顯的不僅是「護憲、去武裝」／「修憲、重新武裝」之間的意識型態對立，在冷戰國際格局的牽動下，兩股勢力的互動也一再生產出新的衝突，以及對日本民主發展和國家定位的歧異理解。歷史學家 John Dower 便認為，1951年舊金山和會的締盟與1955年體制的成形，是決定戰後日本政治發展的兩層結構，而其間存在的張力在往後日本政治中便呈現為「民主」與「和平」兩種價值目標的衝突。更細緻的分析詳見 John Dower, “Peace and Democracy in Two Systems”, in Dower, John (ed). 1993, “Postwar Japan as Histo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p.3-33.

⁵ 其實小說中並沒有大量性愛場面，而多以明快筆法推進人物的互動，但幾乎所有

儘管今日看來這篇小說彷彿只是平凡無奇的言情故事，但在 1955 年的東京，當年方二十的石原慎太郎以親身經驗作為為書寫題材，已預示著日本告別戰敗蕭條後嶄新時代旋律的端倪。在 2001 年東京幻冬舍重新出版〈太陽的季節〉等四篇小說合輯時，石原慎太郎透過〈後記〉回憶寫作當時的心情：

當時正值日本社會從戰敗後的荒蕪重新復甦之際，好不容易正要迎接消費時代的來臨，也就是正值一個未曾出現過的文明逐漸到來的時代。由於之前戰爭以及戰後的荒廢狀況已漸漸消失，對眾人自由的壓抑不再，每個人都想竭盡所能地在人生當中展現出自己的情慾，希望能脫去壓抑本能的枷鎖，以從中獲得心理補償的生活。……總而言之，我的青春就如同收錄在此的作品一般。直至今日，我仍保持著往常的心情，絲毫不覺得障礙或恥辱。

(2004：364)

對上一代教育與大傳統的反叛及懷疑，是戰後崛起作家普遍的心理。比石原小兩歲的大江健三郎，就對大人們在戰敗時丕變的說法感到荒謬—「直到盛夏之前，老師們原本說著天皇是『神』，要我們朝著相片膜拜，還說美國人不是人，是鬼、是野獸；突然間他們毫不在意地說著完全相反的事情，完全不提之前的想法、教法錯了，需要反省，祇是非常自然地改口說，我們天皇也是人，而美國人則是朋友。」因此「戰爭結束之後，我就不上學了。」(2002：2f) 思及戰敗當下的感受，石原也有著類似的反應：「戰爭中，他們教育我們，為天皇而死是光榮的；

關於本作品的評論，皆不忘引用主角初次發生性關係前，男主角「以勃起的陰莖戳破紙窗」(石原慎太郎，2004：38)的文字，而這一畫面也就為這部作品種下爭議形象。時至今日，或可判斷石原的快意描寫並非偶然，其小說中一個又一個血氣方剛的男主角，乃至對父親威嚴的歌詠，男子氣概的凸出是石原好強調的特徵之一；加以其多次以閹割之於男性譬喻憲法第九條之於日本，在在披露了石原在「國家」、「男性氣概」與「自我實現」之間所安放的連結。

可接下來我所知道的全是懺悔、民主、和美國相處等等。大人們顯得既膚淺又虛偽。」(Nathan, 2001) 這些態度明顯不同於在戰前便成年的林房雄、三島由紀夫等人⁶。對石原所屬的世代而言，比起家國、傳統崩潰的憂懼，更切身的困惑是如何在價值系統一瞬改朝換代的文化真空中，覓得安身之路標。壯年後的大江成為日本新左翼健將，以普遍性的人道主義話語持續思索戰爭反省與和平締建；而缺乏戰爭創傷體驗的石原則轉向對自我感受、信念的探索與肯定。因此他擁抱熱烈的情感與都市消費體驗中流竄的欲望，並對「大人們」緬懷的傳統嗤之以鼻。

在〈太陽的季節〉中，他是如此刻劃老一輩的迂腐與年青世代的徬徨：

如果大人們不要毀壞自己所創造的世界並且能夠重視晚輩的話，那麼他們不得不害怕的便絕非是共產黨。事實上，他們也不害怕。他們在這枯竭的土地上，不知不覺地用自己的雙手孕育了新的情操與道德，並培養出創新的人類，就像在沙漠中的仙人掌，雖然乾渴卻仍得意洋洋地開著花，那些在乾燥地面上綻放的花兒們，並不覺得自己的土壤是乾枯的，這實在是很可悲。

旁人用來責難的那一套標準，事實上他們相當憎惡，因此在潛意識中更試圖去破壞它。大人們認為已經廣闊開展的世界，事實上反而變得狹隘，他們要求更開放活潑的世界，但最先把人類的情感當作物品來衡量的，究竟是誰呢？

(2004：33-34)

從這段文字裡，不只可以讀出跨時代青年共享的叛逆性，也蘊含著1950年代日本社會在冷戰結構下的「美國」體驗。社會學者吉見俊哉指

⁶ 以比石原慎太郎年長七歲的三島由紀夫為例，戰敗時正滿二十歲的他，感受到與傳統被割離的憂惶：「戰爭結束了，當我聽到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時，心中唯一想到的只有金閣寺。金閣寺與我之間的關連被切斷了，我想現在我要回去，回到一種美在一端、我在另一端的狀況。」(Nathan, 1988：67)

出，戰後日本對於「美國」的認識是建立在「基地」與「消費文化」間的二重對立上，前者象徵軍事與政治的支配狀態，而後者是經濟與文化的慾望對象，二種權力的互動便形構了日本面對美國愛憎交織的自他認識，一面要抗拒作為軍事霸權的美國，一面卻無法抵擋美國文化與生活方式的入侵⁷。〈太陽的季節〉主角正是邂逅於二戰後美軍佔領設施的銀座地區（Ibid：77）。因此，石原所謂「雖然乾渴卻仍得意洋洋地開著花」的意象，何嘗不是戰後日本青年獨有的困惑：他們既要承受敗戰衝擊下傳統被瞬間抽乾的集體空白，又迅即被推入消費文化生產的誘惑中，追隨高速經濟成長所勾勒的慾望法則。石原慎太郎看見了時代的轉向，於是透過小說人物的暴力、憤怒、自我中心來呈現其所屬世代的徬徨，而隨後所吸引的廣大迴響，也印證了此一心理的需要。

在褒貶兩極的評價中，石原慎太郎與弟弟迅速崛起為大眾文化的明星。〈太陽的季節〉在出版一年內暢銷近三十萬冊，創下戰後小說的紀錄；1956年，〈太陽的季節〉改編成電影，兩兄弟皆參與演出，該片立即在年輕人間掀起旋風，影迷們一窩蜂模仿片中人物穿起夏威夷衫、寬大的褲子，以「太陽族」自居；隔年再推出石原慎太郎撰寫劇本、裕次郎擔綱演出的續集電影「瘋狂的果實」，裕次郎就此成為超級明星，兩兄弟也陸續又合作了十幾部電影作品，將石原裕次郎打造為 James Dean 一般的叛逆英雄，石原兄弟頓成一代憤怒青年的偶像⁸。

⁷ 根據吉見俊哉的看法，這兩種「美國」的意象並非對立關係。作為軍事強權的美國符號與暴力、帝國勾連在一起，是日本從上到下都亟欲抵抗的，但作為經濟文化領導象徵一易言之，作為現代性表徵一的美國，則迅速填補了戰後日本集體認同的真空。兩種「美國性」的脫鉤，於是也為日本創造了內在的他者，使得各種欲確立「日本特性」的政治論述必須往斷裂而遙遠的傳統求索，卻更顯虛無而緣木求魚。

⁸ 值得注意的是，石原的優渥身世使他成為特定生活經驗的傳播者。他在訪談中提到：「當時除了東京以外，日本其他地方都落後地令人難以置信。大多數孩子都沒見過遊艇、滑水和摩托車，當然更沒有像我們那樣和女孩子在一起。我們買了作女孩子裙子的、顏色鮮豔的花紋布，讓裕次郎的一個女友縫成襯衫，所有人都迷上了。年青人竟然這麼盲目，讓我覺得驚訝。」在戰後積極重建、發展不均的日本，東京仍是文化朝聖的中心，足見單以世代的憤怒情緒不足解釋〈太陽的季

1966年年底越戰方酣之際，石原慎太郎接受《讀賣新聞》雜誌社委託，前往越南採訪。在此之前他已是全日本稿酬最高的名作家，大量創作小說、劇本，並曾環遊世界，過著奔放的名流生活。而同一期間的日本則處在國內與國際政治的緊密糾結中，國際冷戰結構體現為國內的「保革對峙」：在美國強加的「民主－和平」體制下，國內左右兩派勢力間在「護憲－和平主義」和「修憲－重新武裝」戰線上相持不下，右派批評憲法第九條的和平條款致使日本國家主權跛腳，亟欲脫離從屬位，修憲確立日美平等的「夥伴關係」；而左派則批判美國勢力在東亞的擴張，並欲維護和平憲法，唯恐再次捲入戰爭。此衝突在1960年的反安保續約運動中到達最高點。當時，石原認為續約是正確選擇，惟反對國會不顧民意強行通過的作法，故夥同文評家江藤淳成立「有朝氣的日本之會」，推動國會的民主化；在輿論沸騰中，他也為文反對群眾因「盲目反美」而反對安保續約，鼓吹揚棄「絕對主義與粗糙的二元對立論」，並評論抗爭中死於劇烈衝突的東大女學生樺美智子為「自己踏死自己的女學生」（石原慎太郎，2006：15）；目睹國內的反戰潮浪，他更對所謂進步知識份子語帶奚落，認為其只是出於下意識地反美因而愚蠢地投向共產主義陣營（Ibid：8）。

在越南的採訪經驗令石原慎太郎感到震撼。「那種自暴自棄似的對於自己明天的命運的冷笑和不關心，我好像在這裡見到了和我的祖國日本的強烈類似之處。」（Ibid：14）回國後目睹知識界瀰漫的同情中國風氣⁹，以及勃發的反資本主義運動¹⁰，都激發著石原入仕之念；適逢自民

節〉的走紅，在物質層次所提供的新鮮感與異國情調，亦扮演推波助瀾之力量。
⁹ 由於知識界反美的心態和對於侵略中國的愧疚心態，戰後的日本學院由馬克思主義佔據了政治正確性，可參見孫歌，2007，〈在大陸語境中翻譯竹內好——進出政治正確的中國論述〉。

¹⁰ 包括：尋求戰爭賠償的「戰爭受害者運動」、抗議環境傷害的環境保護運動、要求合理住屋分配的「住民運動」、抗議不當勞動條件的工人運動、以及反戰意識下激越的大學生罷課潮，都在六零年代的尾聲高分貝挑戰著自民黨執政的正當性。

黨因應鄉村人口結構的變革，有意招徠形象突出的知識份子入黨，石原慎太郎於是投入參議院選舉，並在巨星弟弟的拉抬下以創紀錄高票當選，四年後競選眾議員，同樣順利當選，就此連任八次。1995年，因不滿自民黨的腐敗與官僚主義，他曾短暫退出政壇，旋即於1998年重返政界投入東京都知事選舉，一路連任至今。

貳、從退出中國到中國威脅論：日本的大國路

自明治維新以降，日本的自我認同便緊扣著如何在歐洲與亞洲之間安放自我的困惑。1885年福澤諭吉的「脫亞論¹¹」開啟日本超越亞洲，擺脫「他者」落後形象的意識，藉器物革新與亞洲鄰國割袍斷義，而戮力成為與歐美平起平坐的「文明」國家。直到戰後這條思維仍由丸山真男所繼承。除了在知識上效法西方史學，學習從歐美的眼睛來看待亞洲他國¹²，並且從各種角度與有著深刻歷史聯繫的中國進行區隔¹³，在外交戰略部分，日本政府則模仿西洋各國的行徑，試圖依樣畫葫蘆的依循現實主義邏輯，擺出一切以擴張國家利益為指導原則的西洋國家姿態。經歷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勝利，並成功佔領台灣、朝鮮後，日本已被捲入列強的侵略競賽中，不再有與中國為友朋的餘地；1915年對中國提出「21條要求」，象徵日本政府選擇將自己擺在西方侵略者的立場，正式與中

¹¹ 又名「惡鄰論」：「現今的中國朝鮮對我日本不僅未有絲毫幫助，而且因三國地理相連，在西方人眼中，間或同一視之，或以評價中韓的標準來看日本……為今日計，我國沒有餘裕等待鄰國的開明以共興亞細亞，而應該不與其為伍，與西方文明諸國共進退。」轉引自山室信一：2005。

¹² 這裡指的是東京學派白鳥庫吉建立「東洋史學」，使日本取得超越亞洲的客觀主體位置，進而與歐美平起平坐的作法。可參見 Steven Tanaka, *Japan's Orient: Rendering Past into History*.

¹³ 可參考子安宣邦，2001，〈巨大的他者—近代日本的中國像〉，收錄於子安宣邦，2004，〈東亞論—日本現代思想批判〉，趙京華譯，長春：吉林人民；或石之瑜等，2007，〈日本近代中國學：知識可否解放身份〉，中國社會科學學院院刊 163 期，pp.168-178。

國為敵 (Ibid : 220) ; 但由於「進入西方」的不順遂¹⁴ , 又遭逢國內不景氣和龐大的發展壓力, 表面一律採取現實主義的日本, 也能認識到現實主義解決不了身分問題, 遂又將焦點轉回亞洲, 提出了「大東亞共榮」主張, 以「解放亞洲」之名, 儼然東亞一體, 進而在東亞各地遂行亞洲各國眼中的殖民佔領與經濟剝削¹⁵。

這番學習修養的過程終竟以二次大戰戰敗的屈辱告終。戰後日本在冷戰格局下被劃入美國圍堵線中, 順理成章地成為「西方」所管轄, 其生活方式與價值也全面向美國傾斜。1961 年, 在安保運動帶來的社會緊張中, 池田內閣提出了「所得倍增政策」轉移政治對立的焦點, 果真締造了傲人的經濟成長¹⁶, 而此成就更在日本國內外俱形成深遠影響: 在國內方面, 高速經濟成長使得公民社會運動漸趨瓦解, 60 年代激越的反美、反資本主義擴張意志已無以為繼, 取而代之的是中產階級壯大後的個人主義抬頭與政治冷漠 (Asada, 2000 : 20f)。在國際層次, 此一受到西方在內各界公認的成就, 大大提高日本之聲望, 為日本加強與東南亞各國的經貿交往築就利基, 包括馬來西亞、新加坡、寮國陸續以「向日本學習 (Learn From Japan)」為口號推動經濟發展計畫, 強化與日本的經濟關係 (Singh, 2002 : 285), 「雁行理論」應運而生, 相信日本能夠引領著亞洲諸國共同發展經濟; 美國學者 Ezra Vogel 甚至寫作《日本第一》一書, 以日本的發展經驗質疑美國模式的未來。同時, 日本逐漸增加對外官方發展援助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DA) 的經費, 到 1980

¹⁴ 要者如甲午戰爭之後俄、德、法三國干涉還遼, 以及 1920 年代美國國內的反移民排日運動, 都提醒著日本受到西方完全接納的不可能, 於是將眼光轉回亞洲。

¹⁵ 因此日本對於亞洲由「脫亞」而「興亞」再至於「侵亞」的政策轉變, 實深受其歐化工程的成敗所牽動: 日本愈是受到西方排擠, 就愈需要強化其於亞洲的歸屬感, 好帶著「亞洲第一」的身份來領導亞洲抗衡西方; 然由於渴望成為文明大國的「優等生意識」不熄, 日本面對亞洲鄰國時便只能複製歐美帝國主義的富國強兵邏輯, 渴望歐美的承認, 因此無時無刻又存在一種以排除中國來取得西洋身分的誘惑, 「亞洲第一」反而變得不相關。因此這並非真是所謂現實主義。

¹⁶ 1961 年池田內閣提出「所得倍增政策」後, 日本締造驚人的高速經濟成長。1964 年, 日本加入 OECD, 1968 年 GNP 躍為世界排名第二位, 到了石油危機爆發的 1973 年, 全國 GNP 已較 1955 年增加了 5.4 倍。

年代不但躍為世界第二大 ODA 輸出國，在亞太地區投入的經費甚至超越美國，成為 ODA 輸出最高額的國家¹⁷（Grant & Nijman, 1997：42）。

更重要的是，經濟成就讓知識界重新瞥見了日本重登「大國」之林的曙光。由於日本政府深明其外交動作的敏感性¹⁸，因此早已承諾全力發展「經濟大國」角色，並「保證不成為軍事大國」¹⁹。然而，這一路線在 80 年代中曾根內閣上任後發生質變：1982 年 12 月，甫上任的中曾根康弘在自民黨內演講時喊出「戰後政治總決算」的口號，要使日本的國際政治、外交地位與經濟地位並駕齊驅²⁰，日本欲走向「政治大國」的目標已昭然若揭。然而此時中曾根康弘以「立足日美同盟、貢獻國際」作為口號，並在訪問美國時鼓勵其「將日本建設成一艘『不沈的航空母艦』，落實日美同盟關係，共同抗蘇」（孫政，2005：232），顯見此時日本的自我認知是要作一個與美國並駕齊驅的政治大國。所謂的「戰後政治總決算」，所意味即是從 1945 年來日本全心全意向美國學習、欲化文明「大國」之目標終完成階段性任務，只等著普世文明的「師傅」對其點頭，肯定日本就此躋身「進步大國」之列。

但冷戰的瓦解又將日本的發展帶入新處境。首先是「日美安保條約」的合理性面臨問號，要不要繼續作美國的戰略夥伴？另一方面，日本又要如何處理與亞洲的關連？此時從日本商界到大眾傳媒皆吹起「脫美入亞」的口號（卓南生，2006：467-472），彷彿重蹈著戰前由「脫亞」轉

¹⁷ 學者們認為日本積極輸出 ODA 的理由，不外乎此舉有助提升自民黨政府在國內外的聲望，同時也提供日本一個更趨開朗、具有國際參與實力的未來圖像，彰顯日本符應西方現代大國標準的實力（Yasumoto, 1989）。然而卓南生也指出，此舉對於提升日本國際形象助益有限，東南亞國家仍慣常感覺日本的經援政策是精打細算的「支票本政策」。

¹⁸ 1974 年首相田中角榮訪問東南亞，在泰國曼谷、印尼雅加達皆遭遇激烈示威，顯示東南亞各國對於日本在戰爭期間的暴行仍有憤怒。

¹⁹ 即著名的「福田主義」，由首相福田赳夫 1977 年 8 月 18 日訪問菲律賓時在演說中發表。

²⁰ 中曾根的政治改革包括三個方面：1.財政改革，內涵為放鬆政府管制，擴大國營事業民營化；2.教育改革，具體內容為加強愛國教育，改變歷史意識；3.外交政策改革，具體措施即增加防衛經費，突破戰後「禁區」，進而能夠作為「西方一員」以貢獻國際。

回「興亞」的軌跡，但曾經睥睨世界經濟的日本卻在 90 年代初期陷入泡沫經濟危機，而一百年前慘遭列強瓜分的中國卻逐漸擺脫弱者姿態，而儼然有超越日本成為區域新霸權之勢，這是一個日本所陌生的中國，也是不可能憑藉「大東亞共榮圈」名義將其收編的中國。因此不同於戰前興亞論者將中國視為己身之一部份，尋求共同朝普遍性邁進的態度，戰後日本在「重返亞洲」的同時也流行起「中國威脅論」²¹，將中國視為日本在區域的勁敵。

正是在此氛圍下，石原發表了一系列「日本可以說 No」的主張。在自民黨內繼承中曾根康弘「保守本流」路線的他，國際關係觀點也與日本的國家主義相互纏繞。以下就詳述其對美國與中國的看法，以釐清其國家主義思考與二戰前右翼觀點的聯繫。

參、石原慎太郎對於美國的批評

從 1989 年至 1995 年之間，石原慎太郎陸續出版了四本政治評論集《可以說 No 的日本》（與新力總裁盛田昭夫合著）、《即使這樣也敢說 No 的日本》（與上智大學教授渡部昇一、軍事評論家小川和久合著）、《日本堅決說 No》（與文藝評論家江藤淳合著）、《亞洲也可以說 No》（與馬來西亞總理馬哈地合著），這一系列作品圍繞著清晰不變的主軸：日本要在外交上擺脫「沈默是金」的服從性，挺身拒絕來自美國的不合理要求。提綱挈領，他對於美國的挑戰包含以下三個面向：

²¹ 發軔於日本防衛大學村井友秀 1990 年發表於《諸君》的文章，以「論中國這個潛在威脅」為題，從軍事實力與綜合國力著眼，指出中國正在重建部隊積極尋求重新成為「霸主」的機會，對於正在走向政治大國之路的日本是個潛在的大威脅。此文引起日本社會極大迴響震撼，一時湧現畏懼中國現代化、「要讓中國永遠在技術上落後日本十至十五年」的聲音，也使日本政府重新檢討對中國政策轉向保守。詳見何思慎，2001，「『中國威脅論』與二十一世紀日本對中國政策芻義——以經濟與軍事為中心」[http://www.koryu.or.jp/08_03_03_01_middle.nsf/1384a27fc6686a1a49256798000a62f6/274073eeb7d0a1ef49256ab00025bea4/\\$FILE/hoszushe n.pdf](http://www.koryu.or.jp/08_03_03_01_middle.nsf/1384a27fc6686a1a49256798000a62f6/274073eeb7d0a1ef49256ab00025bea4/$FILE/hoszushe n.pdf)

一、美國對日本懷有種族歧視，使日本屈居從屬地位

從 1980 年代起，日美之間便為了美日間年年成長的貿易逆差頻生齟齬，美國責怪日本不肯開放市場，透過貿易制裁要脅日本促進貿易平衡，兩國在 1986 年的關貿總協烏拉圭回合談判中，更為農產品補貼等關鍵議題爭執不休；加以日本企業在美國社會中的存在日益明顯，一股「日本威脅論」在美國社會中蔓延，主張重新評價美日同盟為美國所創造的利益（查道炯，2003）。石原慎太郎批評此種心理完全出自種族歧視，使美國不願承認日本在貿易與技術研發上的創意，不珍惜日本對兩國同盟關係的貢獻，而以蠻橫的手段對日本予取予求（石原慎太郎，2006：499）。石原認為，貿易摩擦僅僅是美國對日偏見的例子之一²²，從軍事分工到在日美安保條約中的形象，石原都為日本抱不平。

我追問：「美國的核子潛艇數目不及蘇聯，因此常受到壓力。為什麼不能讓日本分憂，如果是德國或英國的商船，是否就另當別論？」對方率直地回答說：「如果是他們就可以。」

簡而言之，他們率直地認為：日本是個不能信任的國家。……委託日本做這種情蒐工作反而令人擔心害怕，或許委託蘇聯人還比較好呢！我想我們必須覺悟，因為他們內心的種族歧視非常根深蒂固。（1990：37-38）

石原也抨擊美國輕視日本在美日安保條約中的付出。「美國積累戰術和戰略經驗所設計出來的軟體，如果沒有日本的半導體晶片，即使輸入電腦也不會運轉。由於日本的技術，使美國減少波斯灣戰爭中的犧牲，無知的美國政治家們說甚麼『日本人沒有流血』，真是太不講理。……日本的技術對美國的軍事力量起著多麼重要的作用，五角大廈再清楚不

²² 石原也曾分別指出美國對日本丟擲原子彈（1990：38），以及首相田中角榮的洛克希德醜聞（1995：64），都是美國對日種族歧視的例子。而 1990 年應該書英譯版發行前往美國宣傳時，石原也在電視節目中直接抨擊美國國內種族歧視的氾濫。

過了。」(1992: 71) 因此，他主張日本應重估日美關係，「日本人不會被他們的軍事威力嚇得發抖，也絕不會再對『日本的貢獻不夠』等無端指責保持沈默。……如果美國人作不到這些，今後的美日關係將難以確定。」(Ibid: 73)。

二、日本人應發展出新的自我意識，勇敢參與國際事務

為了挑戰美國在外交關係中的強硬姿態，石原鼓吹日本要懂得善用手中的王牌——高科技技術，「在能說『No』時就說『No』」(1990: 115) 以能與美國平起平坐；而更根本的是日本自我意識的改革：

戰後日本一直處於異國文化——美國文化統治之下。從言論限制到憲法，美國在促使與西歐不同的深具特殊性的異己——日本解體。……美國對日政治戰略的核心，就是強加給日本一部帶有令世人吃驚的英文註釋的憲法……，現行憲法限制了日本人的國際意識，不正當地損害了日本的國際地位。正是這部憲法使日本這個國家就像個中國古代的太監，只有陰莖而無睪丸。……

……日本人有個缺點，就是過多地做自我批評，這也可以說是由地勢條件造成的。總是看他人臉色行事，處處都要使他人如意，這樣做是非常被動的。……然而，現在我們國家已經到了應該發揮男子漢作用的時代了。日本在二次大戰後一直追隨著美國，這種日本有史以來最女性化的被動的生存方式應當結束了。

(1992: 92-95)

石原寫作這段文字的用意，除了抽象地要求日本人能發展獨立意識，不再唯美國馬首是瞻外，亦具體呼應了 90 年代初日本國內對於自衛隊是否出兵海外的辯論。雖然修憲與否是從戰後便縈繞著日本政治的老議題，但歷經 70 年代的經濟成長和 80 年代的中曾根主義洗禮，日本

追求成為「正常國家」的意識與合理性已不同於戰後時空下的頹喪，加以蘇聯垮台後東亞地區軍事秩序重新洗牌，日本也趁機摸索在國際事務中的新角色。1990 年自衛隊出兵參與聯合國在柬埔寨的維和行動，首相海部俊樹提出《聯合國維持和平行動法案》為自衛隊出兵建立法源；8 月波斯灣戰爭爆發，總理也提出「中東貢獻論」，意圖追隨美國腳步參與中東安全事務，隔年 4 月更派遣自衛隊海上掃雷艦出航。這一主張也在 1993 年小澤一郎出版的《日本改造計畫》中得到呼應，不同的是當其他政治家仍在「強化日美同盟、伙伴關係」的底線上發言時，石原已將憲法第九條視為美國所強加的束縛，必須加以掙脫，日本才能走自己的路。

三、西方文明已沒落，日本要引領全亞洲發展，抗拒偽善警察國家美國插手

除了批評美國對於日本的輕視，在 1995 年與印尼總理馬哈地合著的《亞洲也可以說 No》中，石原慎太郎進一步將美國所代表的西方文明相對化，從而預言亞洲的崛起：「亞洲必須向美國的單邊主義說『No』。我相信亞洲的其他國家寄望日本能大聲說話，並且亮出手中的王牌。作為這個地區最強大的國家，日本必須作為楷模，與華盛頓平等對談。」（1995：58-65）

石原抨擊美國是偽善的警察國家，不顧國內的種族歧視盛行、犯罪率高升、貧富差距，而以人權警察之姿四處干預（Ibid：99f），其下的驅力則是以一神論為基礎的基督教，使西方擴張主義徹底缺乏容忍精神（Ibid：93）。反之，亞洲的文化是以容忍、尊重多元為基礎，而且強調「和諧」，要求小我與大我相互配合，亞洲的世紀必將是和平共存的時代（Ibid：93-95）。

更重要的是，這個亞洲的世紀將由日本所引導，共抗歐美：

超過一世紀以來日本一直勤奮地吸收西方文明，如此專注一意而幾乎遺忘了我們也是亞洲的一份子。我們是歐美的好學生，也在某些領域表現特出，但在心底我們還是非常貼近亞洲。文化的相互模仿是歷史進步的驅力……就像亞洲人曾經受到西方現代主義啟發，歐洲與北美將再次地向東方學習智慧。

(Ibid : 89-92)

綜合以上三點，從石原慎太郎對於美國的批評中，他欲證明的是：日本不但經濟實力足以與歐美並駕齊驅，成為現代化的好學生，相較於言行不一的美國，日本甚至更具有普遍性，更有資格帶著殊異於西方文化價值的亞洲來稱霸世界。然而，在石原期期扛起亞洲抗衡歐美的同時，隔鄰的中國已不再是百年前的東亞病夫，而以蓄勢待發之姿與日本競逐著亞太地區的領導權，因此單是挑戰西方尚不足以證成日本的文明大國地位，更要對崛起中的中國有所評價。以下就進入石原對於中國的評論，以完整其國族敘事的兩面。

肆、永遠的「惡鄰」——石原慎太郎眼中的中國

儘管是偵測並緊緊依隨著美國的腳步，日本早在 1972 年就趕在美國之先與中國關係正常化，之後便與中國建立密切經貿關係。1980 年代中曾根內閣上台後，其政治大國主義為兩國外交製造許多摩擦，包括戰爭責任問題、二次大戰歷史認定問題、主權與領土問題、台灣問題等，都成為兩國關係中的地雷區。政治上的溝通差距與經濟的熱絡來往，為兩國政治關係營造了高度張力。而在這些議題上，石原都曾提出鷹派立場鮮明的發言或政治行動。以下根據發言時序與議題，一一列舉。

一、青嵐會時期堅決反共

由於不滿田中角榮首相與中共建交，1973 年石原即刻邀集了參眾兩院三十一位議員組成政團「青嵐會」，提出六大宗旨：一、維持自由社會，堅持外交應與自由主義國家群保持緊密聯繫。二、發揚國民道義，改革物質主義，應斷然進行教育正常化。三、照拂弱勢者，建立社會正義，排除富豪之不勞所得。四、為建設和平國家，在和平須來自自衛的前提下，向國民訴求國防與治安之必要性。五、為其在新的歷史中日本民族的真正自由、安全與繁榮，制度自主獨立的憲法。六、黨的運作應打破安逸的妥協、官僚化與機會主義化等弊習（Ibid：199）。

在對外說明青嵐會成立緣由以及血盟的意義時，石原慎太郎以「神風特攻隊」自比，指出必要時將拿出忘我精神，為國家犧牲；另一位成員渡邊美智雄更直指其首要敵人便是共產主義－「青嵐會必須與共產主義決一死戰，否則自民黨終將趨向滅亡」（聯合報，1973a）。青嵐會一成立，便組團前往台灣訪問（聯合報，1973b），以與同時訪問北韓的自民黨議員團互別苗頭；此外也與台灣在日推動對日外交的關係組織「日華議員懇談會」往來密切，定期聚會。而該組織成立未久，適逢內閣正與中國開始研議「日中航權協定」，安排兩國互惠開放領空。青嵐會對此議案極力杯葛，在國會中以扔煙灰缸、掀桌等動作暴力抗議，輿論界頓時將青嵐會與 30 年代發動「二二六事件」、「五一五事件」的極右派青年政治社團相提並論（卓南生，2006：14f）。

二、關於二次大戰的認知

二次大戰戰敗作為現代日本國族主義發展的創傷之核，向來驅使著日本極右派知識份子對之爭辯、抹寫、重新定義。1963 年林房雄發表《大東亞戰爭肯定論》，將黑船事件至二戰之間的日本政治發展史定調為反擊歐美帝國殖民的努力，日本併吞韓國、殖民東南亞因此皆是抵抗侵略

過程中的必要之惡；此種認識為立場接近的知識份子所繼承、發展，鼓舞了各種從現代化史觀和反殖民主義立場為二戰翻案的論述。1980年代起，隨著經濟成長帶來的民族自信高漲，檢討「大東亞戰爭」評價的意識也從知識界吹到了政壇中。在朝有曾根首相的一連串教育改革爭議²³和「藤尾妄言事件²⁴」，曾根康弘更開先例成為戰後首位參拜靖國神社者的首相；在野則有一連串右翼運動在林房雄等人的思考基礎上重新考察、詮釋戰爭歷史，拒絕將日本斷然描繪為創子手或侵略者的「自虐史觀」²⁵。在這股重新評價二戰責任的潮流中，石原慎太郎的發言也不讓曾為青嵐會同志的藤尾正行專美於前。1990年，在接受美國雜誌「花花公子」專訪時，石原表示「南京屠殺是中國人捏造出來的謊言」，此言一出立刻引起國際輿論反彈，不但中國政府提出抗議，在美的華裔歷史學者亦發表聯名公開信，舉證反駁石原（陳世昌，1990）。

當選東京都知事後，石原又施壓東京市內的中小學應採用「新版歷史教科書」，並強制市內公立殘障學校首先使用該版本的教材，此舉也引起民間反戰派強烈抗議，「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甚至遭人縱火（田思宜，2001）。另外，自從2000年8月15日首次參拜靖國神社之後，石原也年年都在戰敗紀念日率領右翼團體前往，每一次都引起反戰人士與右翼支持者的劇烈衝突（董更生，2001）；2004年8月，他發表給天

²³ 曾根內閣的教育改革乃是以「激發愛國情操、消弭個人主義」為宗旨，表現於施政卻形成對教科書的修改和二戰歷史評價的重估。1982年文部省介入中小學教科書的用語，要求將有關日本對外「侵略」的描述一律改為「進出」或「侵入」，「佔領」改為「派遣」，對天皇一律使用敬語，刪除南京大屠殺一節，改寫為「引起中國人劇烈反抗，日軍亦死傷可觀」等，凡此種種皆引起中國、韓國紛紛抗議（孫政，2005：225）。

²⁴ 曾為青嵐會一員的文部大臣藤尾正行又在1986年7月25日的記者招待會上公然發表否定東京審判、否認侵略歷史，他表示：「有的是對方國家認可的了」，暗指當年日本對於朝鮮的併吞乃是當時朝鮮政權所認可，而非侵略（Ibid：241）；8月6日，又說「不認為東京審判是正當的。」

²⁵ 自1970年代起，對於「南京大屠殺」真相的尋求也在日本知識界造成對立，70年代的鈴木明、山本七平等人，再至於80年代之後的田中正明、渡邊昇一等學者或媒體人紛紛從各種角度否定南京大屠殺的真實性，與以本多勝一、家永三郎等人為代表的「南京大屠殺肯定論」者形成尖銳對立。

皇的公開信，呼籲天皇參拜靖國神社，作為一國元首的天皇若能帶頭參拜靖國神社，可激發日本人的愛國心，整頓士氣，更可讓鄰國拿日本沒辦法。」2006年，石原更以「神風特攻隊」為題材撰寫電影劇本，取名「我為你赴死」，消息一出更是引起中韓兩國矚目與反感，深恐本片傳達的史觀再次浪漫化日本侵略歷史、煽動民族主義（黃菁菁，2007）。

歸納石原慎太郎一路以來關於日本在二戰中功過評價的發言，不管是南京大屠殺懷疑論、要求採用「反自虐史觀」教科書、或是歌頌為國捐軀者，核心認識無非為「日本也是西方侵略下的受害者」。1990年接受花花公子訪問時，在脫口而出「南京大屠殺虛構論」之前，他所欲談論的其實是日本的原爆災難經驗：

問：在你的書中²⁶，為了證明美國對日本有種族歧視，你引用美國在大戰時對日本使用原子彈，而非對德國人。但當德國人宣布投降時還沒有原子彈……。

答：我祇是把幾乎所有人心裡的話大聲地說出來罷了，這是我們大多數人的真正感受：也許這會讓你們美國人聽起來不舒服。

問：但這並非事實。

答：一般而言，美國人並不知道原子彈炸死多少人，也不曉得死於核戰後遺症的人有多少，每次提到這點，美國人就會反過來說「日本人攻擊珍珠港」。

問：難道日本的過去作為就不殘酷嗎？中日戰爭期間所發生難以置信的大屠殺，你又怎麼說？

答：手槍機槍怎麼能和原子武器相提並論？它們不是一回事。我們日本人作了甚麼？在哪裡發生過大屠殺？

問：只舉一個例子，1937年的南京大屠殺，十萬以上的中國百姓被殺。

²⁶ 指當時正要發表英譯版，然盜版已經隨著美國五角大廈翻譯而流傳的《可以說No的日本》（A Japan That Can Say No）一書。

答：人們都說日本幹下大屠殺，但這並不正確。這是中國人編出來的謊言；一直要污辱日本的形象。但這是騙人的謊言。

這段訪談的推進中，可以發現日本右翼談論二戰經驗的典型論法：一方面「虛幻化」南京大屠殺的死傷數字甚或真實性，一方面控訴美國加諸於日本土壤上的傷害；前者是大東亞共榮圈面對西方在其內部進行的自我砥勵與自我犧牲，後者是由日本單獨承擔大東亞共榮圈之後的責任負擔。這種態度在另一篇文章中更清楚地呈現：「我不是完全否定大屠殺的事實，我祇是說從許多權威資料來看，很希望把受難者的具體數字改為二萬六七千人這個準確數字，或進行重新調查。哪怕是這個數字的十分之一還是百分之一，肆意殺人終究是不人道的，屠殺就是屠殺，但是 30 萬人這個天文數字則完全是虛構。在美國，有人公開胡說八道，說甚麼『日本人在中國殺了 30 萬人，挨兩顆原子彈是罪有應得。』美國人至今不知道兩顆原子彈究竟使多少日本人死於非命。」(1992:47-48) 石原一面對中國說「不是要否認屠殺，但中國真的沒有死這麼多人」，另一面提醒美國「日本為了大東亞戰爭犧牲了更多人」，這裡是以受害者姿態卸責，不願正面面對中國，擔負起加害者的責任；而在詮釋侵略歷史時，石原採取了「自衛論」——「由於在歐洲近代主義的原理只有一項，那是要搶奪殖民地，或被搶奪為殖民地的二選一的帝國主義之力學而已。日本就在目睹發生於亞洲的鄰近各國被歐洲列強殖民地化的慘況，為了避免日本也被殖民地化，戰勝清國、俄國，而擠進列強之一。但是日本也誤入帝國主義這一當時的歷史原理，官兵變成強盜，自己也朝向殖民地而邁進。」(2006:496) 言談中充滿「身不由己」的意味，主張日本是在有限的選擇中為自保而向外侵略。當然可以批評這樣的想法也是缺乏獨立性的，是「躲在歐美的陰影裡的詭辯術」(溝口雄三，1999)，但這樣的剖白更幫助我們瞭解了日本至今難就戰爭侵略全盤道歉之情感癥結：如果向外侵略是日本因為不能成為西方，以至於必須回

到亞洲才能取得行動身分，完成現代化進程，那麼就戰爭侵略向其他東亞國家道歉，不就否定了東亞做為一體，也就否定了推動整個現代化過程的主體價值？

溝口雄三曾指出：日本右翼傾向採取「受害者」的單面向來記憶戰爭體驗，而淡忘「加害者」的角色，畢竟用受害者的姿態維持控訴的正當性是遠比作為悔過的加害者輕易多了（1999）。此發展與二次大戰之後美國接收日本、保留天皇制而免於戰爭反省的歷史有深刻聯繫，右翼史觀將太平洋戰爭看作是「日本帶領亞洲、對抗西方」的「有色人種對抗西方殖民者」，原爆的屈辱因此不只是日本民族的屈辱，同時也彷彿是日本「為了全亞洲」而概括承受的重創。而由於麥克阿瑟佔領日本後並未對裕仁天皇的戰爭罪責多加處理，甚至在韓戰後積極扶植日本右派、打擊左派，這些政治現實俱卸除了右翼國家主義者反省戰爭真實責任的壓力和需要，也使得其國家觀點在戰後仍隱晦地保存下來（小森陽一，2004）。對於與石原分享著相同意識形態的國家主義者來說，日本在二次大戰中已經付出了慘痛的代價，但受害國在日本的快速繁榮中始終沒能得到真正的寬慰，因此「南京大屠殺」之於中國人永遠是一個不斷生產仇恨與憤懣的記憶機器（溝口雄三，Ibid），但此般情感鴻溝卻使得和解之路愈加迢遙。

三、冷戰後的中國威脅論

在 1989 年之前，石原對於中國最主要的批判就是在「反共」陣線上發揮，隨著冷戰瓦解與中國大陸經改開放，「共產世界」與「自由世界」的二分法頓時失去意義。此後，石原慎太郎於是採取不同修辭將中國描述成世界安全與繁榮的威脅者，對內要求日本與中國審慎來往，對外呼籲美國與亞洲諸國共同提防。具體的觀點包括下列幾項：

1. 批判中共專制統治，預言中國崩潰

1995 年在與馬來西亞總理馬哈地合著的「The Voice of Asia」中，他首先批判北京政府對於天安門學生運動的鎮壓，接著預言市場的開放將為專制政體帶來多重衝擊：不均等的經濟分配將迫使族群意識上升，要求自治；而受到西方資本主義文化洗禮的東南沿海，也將逸出北京的高壓掌控。隨著北京當局的影響力減弱，中國將由集權國家分散為多族共和，並融入日本所領導的大東亞經濟圈中（Ishihara and Mahathir, 1995：142-143）。2002 年 6 月的日美商會上，石原再次預測中國在十幾年後必將分裂成數個小國家。

2. 中國是核武持有國，日本應與美國聯手制衡其侵略擴張。

石原慎太郎曾經多次向國際指控中國軍事擴張，包括 2000 年 8 月接受德國《明鏡週刊》訪問時稱「中國是最大的威脅」；2001 年 9 月訪問美國時，指責中國企圖在亞洲建立「擴張帝國」，支配整個亞洲地區；2005 年 11 月再訪華盛頓，石原在演說中表示「美中若開戰，美國必敗」，因為「戰爭歸根究底即是生命的消耗，但中國沒有尊重生命的價值觀，而有著公民社會的美國則仍仰賴公民決定，因此一但進入消耗戰，必定不敵中國。」因此石原主張美國應該對中國採取經濟封鎖，以遏止其軍事擴張。最後石原尚強調中國可能發動核戰：「美中之間若有紛爭，中國勢必想除掉最礙眼的美日安保體制，到時候中國的核子彈不是落在琉球，就是對準東京吧！」²⁷

3. 移民、盜版威脅日本內政與智財權

不僅中國政府是威脅製造者，石原眼中的中國人也象徵著對日本安全福祉的另一類威脅。繼 2000 年的歧視「三國人」言論引起國際關切

²⁷ 發言皆轉引自中國時報 2005/11/11 報導，「石原：中國可能發動核戰」，另外石原的詳細論證可參見 2005/12/05《產經新聞》文章：「アメリカは勝てまい」（美國必敗）<http://www.sensenfukoku.net/mailmagazine/no42.html>

後，2003 年 8 月 4 日石原慎太郎又發表文章〈昔遣唐使，今不法入國者〉²⁸，譴責非法中國移民形成東京市治安問題，犯下偷盜、非法打工等罪，又盜版日本的文化商品牟利，侵犯日人的智慧財產權；石原因此主張日本政府需要更積極管理的移民政策來抑制非法移民。

四、主權問題與中國正面交鋒

為了凸顯日本在亞洲的地位，石原動輒在主權問題和領土問題上與中國正面衝突，製造緊張。1999 年 4 月當選東京都知事後，石原即在媒體訪問中就西藏人權問題、台海兩岸問題對中國大肆批評，引發中國不悅。1999 年台灣發生九二一大地震後，石原即在 11 月來台訪問，成為 1972 年中日建交後前來台灣訪問層級最高的日本官員，期間石原直言「台灣是一個國家」，引起中共抗議，憤指其「挑釁中國主權」，最後日本內閣只能以「個人行為」向中國致歉。2000 年 3 月李登輝卸任總統職務，石原慎太郎與自民黨議員村上正邦籌組委員會邀請其訪日，再度引起中共關切（陳世昌，2000a）；4 月，達賴喇嘛訪問日本，石原慎太郎也計畫與其座談，再次造成中國大動作施壓（陳世昌，2000b）。2006 年，在產經新聞上發表的〈自由台灣的存在意義〉一文，石原再次批判中國對於台灣與西藏的壓迫，呼籲東亞各國應「共同維護台灣的獨立性，以保障亞洲的安定」。

在中日間敏感的主權問題上，石原也頻頻有動作。包括自 1978 年，石原慎太郎與青嵐會成員發起了日本方面的首次「保釣」行動，募集了十幾位大學生到釣魚台島的東南方蓋了一座燈塔；1997 年 5 月亦有類似行動。2005 年 5 月，在中國爆發激烈反日暴動之際，石原與民主黨議員枝野幸男共同要求日本政府派駐自衛隊至釣魚台維護主權（陳世昌 2005），並且在 5 月 25 日帶著國旗駕船登上東京東南方一千多公里，具

²⁸ 參見石原慎太郎官方網站：<http://www.sensenfukoku.net/mailmagazine/no14.html>

有戰略價值的「沖之鳥礁」，在島上揮舞國旗、親吻土地²⁹。6月，石原慎太郎在公開談話中繼續向日本政府施壓，鼓吹若中國侵犯釣魚台主權，日本政府應不惜發動一場「國土保衛戰」（人民網，2007）。凡此種種言論都屢屢引起中國的不滿與抗議。

隨著這一連串「中國威脅」論述的發表，連帶還呈現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便是石原對於美國態度的轉變。在石原積極向美國「說不」的時期裡，除了零星向中國表達抗議的舉動之外，石原甚少將中國描繪為區域安全的威脅者；但隨著1997之後中國崛起為區域霸主的態勢愈趨明確，石原對美國的態度也由挑釁逐漸修正為強調日美同盟關係、要求共同防堵中國崛起的基調。石原對美態度的轉變並非特例，事實上，他的轉向還反映了日本知識界面對新國際局勢的不知所措³⁰：雖然冷戰結束讓原就不對等的日美同盟關係更加值得質疑，但隨著中日韓間的歷史傷口重新掀開，而中國崛起和國內泡沫經濟又形成鮮明對照，危機意識驟升的日本不能不繼續追隨美國，外交的迴旋空間因而受到壓縮。就地緣政治來說，日本離不開東亞，因而必須設法和中國維持良好關係；但歷史仇恨尚未化解，新的競爭關係則已展開，於是除了以「中國威脅論」來投射對中國的敵意想像外，也只好繼續依附美國，甚至寄望日美同盟能夠與崛起中的中國抗衡。

²⁹ 可參見 2005/06/06 發表於產經新聞的評論「沖ノ鳥島の戰略の意味」<http://www.sensenfukoku.net/mailmagazine/no36.html>，石原在文中詳細說明了沖之鳥礁之於日本的戰略意義，呼籲日本政府拿出魄力捍衛主權，防止中國在西太平洋擴張軍力。

³⁰ 早在1992年，Kishore Mahbuban 便以「漂浮外交」形容日本浮盪在中美之間的兩難之境（“Japan A Drift”，*Foreign Policy* 88: 126-144）；另外關於日本因為擔心東亞權力平衡發生變動而希望加強日美同盟關係的剖析，可參見 Yoichi Funabashi. 1998. “Tokyo’s Depression Diplomacy.” *Foreign Affairs* 77(6): 26-36. 以及 Wu Xinbo. 2000. “The Security Dimension of Sino-Japanese Relations: Warily Watching One Another.” *Asian Survey* 40(2): 306

五、親台北、遠北京的城市外交

1999 年石原慎太郎當選東京都知事後，即在訪談中透露親台北遠北京的政治立場，不但透露「我與李登輝總統是好朋友，必要的話我會考慮訪問台北」，同時表示「中國大陸對人權和西藏問題的立場，讓我不喜歡目前的『中國』當局。東京與北京的都市交流不需要中止，但如果一定要派人參加，我將會指派副知事前往。（陳世昌，1999）」而他也說到做到，在當年 11 月便訪問了台灣慰問 921 大地震災情，但同一年東京北京姊妹市締交的 20 週年慶，卻僅派副知事前往致意。總計從 1999 年上任東京都知事迄今，石原慎太郎至少前來台灣五次之多，但卻從未訪問北京，引起北京市市長在 2005 年訪問日本時抱怨：「他既不來北京，也不招待我訪問東京，損害日中之間地方的友好基礎。」（中國評論新聞網 2005）

2000 年，石原慎太郎與三個亞洲城市共同發起了「亞洲主要都市網」，促進亞太地區主要城市之間的交流，這可以視為延續石原建構亞洲以面對美國的努力，因此即使石原不屑與中國往來，仍認識到北京的參與不可或缺。但 2004 年年會時台北與北京爭奪 2005 年主辦權，實則在石原的籌謀之下，造成北京不滿協議結果，拒絕簽署共同聲明「雅加達宣言」，於是退出主辦。北京退出後，石原積極協調台北提前主辦，於是台北將原訂於 2006 年秋天舉辦的第六屆年會提前至該年 4 月舉行，會員國於是在台北開了一場沒有北京的亞洲城市大會。石原對於北京的缺席僅表示「非常遺憾」，中國媒體則直指北京的缺席是石原基於親台立場的「陰謀」（泉州網，2005）。

伍、代結論：石原慎太郎的歐亞迷航

王屏在《近代日本的亞細亞主義》中曾指出：「近代日本人的國際觀是在『東洋對西洋、文明對野蠻』的框架內形成的。在按道德畫線時，日本把自己劃歸為東洋。在按文明畫線時，日本又把自己劃歸為西洋。」（2004：217）總結石原慎太郎的發言，這樣的困惑依然存在。儘管石原慎太郎對美國與中國都有所批判，但兩者作為日本國家的「威脅」，意義迥然不同：石原口中的美國是一個蠻橫的壓迫者，以偽善的世界警察姿態四處干涉，而日本明明有能力與之平起平坐，卻又因膚色之故受盡歧視，因此必得加以譴責，並且以亞洲特有的文明價值來聲稱日本比美國更優越，從而與之競逐普遍霸權姿態。相對的，中國則是一個落後的、反人權的、不遵守文明世界遊戲規則的麻煩製造者，同時又是亞洲安全的威脅者，因此日本不時以文明承載者的姿態對中國指指點點，甚至提醒軍事同盟的美國一起防範中國。石原想帶著亞洲對抗西方，是複製戰前日本由「脫亞」而「興亞」的圖式，遮掩其不被美國平等接納的狀態；但當中國經濟超越日本的預言蔓延，甚而與日本競逐區域霸主，石原又必須拉著日美同盟的力量來箝制中國，從而強調其比中國更優越、更符應現代性的文明身份。

然而恰恰是在石原對於中國的抗拒中，透露出戰後日本國家論述依違在歐亞之間，無家可歸的困窘。從戰前的帝國主義歧路到戰後的經濟大國路線，日本的國家主義是追隨著西方文明的普世價值而亦步亦趨發展起來；設若經歷共產革命、並且不願接受民主體制的中國能夠被世界所接納，等於否定日本過去以「文明化」為唯一標準的發展軌跡，也否定以亞洲一體爭取與西方平等的願望。這樣的兩難之境無巧不巧地揭露了石原愛國論述的罩門：由於石原選擇以現代化、文明化的程度來填充日本的主體內涵，這使他的國家主義論述失去了任何西方意識形態加以

挑戰的效力，而只能緊追著美國的腳步和美國所設置的標準，來界定日本的策略。正如酒井直樹（Naoki Sakai, 1997：157）在分析戰後日本發展經驗時所指出的，特殊主義和普遍主義之間存在著互為表裡、相互形塑證成的關係，戰後日本對於現代性的追求，其實是以日本的「美國化」為目標，因此既已無力對日本的發展模式提出反省，那麼即便選擇了以特殊化的日本民族主義形式來批判美國，最終卻只是再次確認美國價值的優越性，也強化了日本的無力感。

不同於戰前脫亞論者的是，一百年前的中國是隨時可能瓦解的弱者，石原所面對的中國卻是一個令戰後日本知識界滿懷愧疚的對象，也是一個早已走出自己「特色」的新中國，以致將其收編入大東亞共榮圈的可能性已不存，只好將其描繪為野蠻的流氓國家，或是隨時可能崩潰的脆弱政體。因此石原的「中國威脅論」與「中國崩潰期待論」為追求日本現代大國身分的一體兩面，一面警告著中國具有的潛在威脅，一面卻又預言著中國現存不合理體制的必然崩解。如同戰前思想家面對中國時的往返思辨一般，石原時而以「亞洲第一」的想像對抗西方，時而又在西方的陰影下檢舉中國的不合規範；離開亞洲，日本似乎不值得西方尊重，但建構亞洲，日本又似乎無法處理獨自崛起的中國。面對著難以定位的中國，日本在歐亞之間的漂流依然迷航。

參考文獻

(一) 中文專書

Nathan, John, (1987),《夢幻武士—三島由紀夫傳》，梁翠凌譯，台北：社會大學出版社。

(2005),《無約束的日本》，周小進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小森陽一，(2004),《天皇的玉音放送》，陳多友譯，上海：三聯。

王屏，(2004),《近代日本的亞細亞主義》，北京商務印書館。

石原慎太郎，(1987),《斯巴達教育》，蘇錫淇譯，台北：水牛出版社。

(1990),《可以說 No 的日本》，與盛田昭夫合著，劉秀琴等譯，台北：中央日報出版社。

(1992),《日本堅決說不一戰後美日關係總結》，與江藤淳合著，北京軍事科學院譯&出版。

(2004),《太陽的季節》，蔡姿淳譯，新店：尖端出版。

(2006),《國家的幻影》，劉崇稜譯，台北：商務。

孫政，(2005),《戰後日本新國家主義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

卓南生，(2006),《卓南生日本時論文集—日本社會》，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

謝志宇，(2005),《20 世紀日本文學史—以小說為中心》，浙江大學出版社。

(二) 中文論文

山室信一，(2004),〈面向未來的回憶—他者認識和創建的視角〉，《中國與日本的他者認識：中日學者的共同探討》，中國社會科學研究編，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石之瑜，曾倚萃，李圭之，(2007),〈日本近代中國學：知識可否解放身份〉，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刊 163 期。

吉見俊哉 (Yoshimi Shunya), (2002), 〈欲望／忘卻「美國」的日本戰後——「基地」與「消費文化」的錯綜關係〉, 李文茹譯, 《中外文學》31 卷第 7 期, 2002 年 12 月。

查道炯, (2003), 〈「正常國家」與冷戰後日本對華政策的研究〉, 香港社會科學學報 25 期, pp.1-29

溝口雄三, (1999), 〈創造日中間的共同知識空間〉, 趙京華譯, <http://www.frchina.net/data/personArticle.php?id=2959>

(三) 日文論文

Ishihara, Shintaro, (2003), 『昔遣唐使, 今不法入國者』, <http://www.sensenfukoku.net/mailmagazine/no14.html>

(2005), 『沖ノ鳥島の戰略的意味』 <http://www.sensenfukoku.net/mailmagazine/no36.html>

2006, 『自由台灣の存在意義』 <http://www.sensenfukoku.net/mailmagazine/no21.html>

(四) 英文專書及論文

Asada, Akira, 2000, “A Left Within the Place of Nothingsness”, *New Left Review* Sep-Oct 2000.

Dower, John, 1993a, “Japan In War & Peace: Selected Essays”, The New York Press

1993b, “Peace and Democracy in Two Systems: External Policy and Internal Conflict” in Gordon, Andrew (ed.) 1993, *Postwar Japan As Histo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Ishihara, Shintaro. 1989, “A Japan That Can Say No: why Japan will be first among equals”, NY Simon & Schuster

1995, with Mahathir Mohamad, “The Voice of Asia”

- Nathan, John, 2001 "Tokyo Story: A Profile of Shintaro Ishihara." *The New Yorker*, April. 9 2001.
- Sherif, Ann, 2005 "The Aesthetics of Speed and the illogicality of Politics: Ishihara Shintaro's Literary Debut." *Japan Forum* Vol 17 No.2, pp.185-211.
- Singh, Bhubindar, 2002, "ASEAN's Perception of Japan: Change and Continuity", *Asian Survey*, Vol.42, No.2, pp.276-296
- Sakai, Naoki, 1997, "Translation and Subjectivity: On 'Japan' and Cultural Nationalism",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Yasutomo, Dennis T, 1989, "Why Aid? Japan as an 'Aid Great Power'", *Pacific Affairs*, Vol.62, No.4. pp.490-503

(五) 中文報導

- 人民網 (2007), 〈日本頭號反華份子—石原慎太郎〉, 1月12日。http://big5.china.com.cn/international/txt/2007-01/12/content_7644506.htm。
- 中國評論新聞網 (2005), 〈王岐山晤日本三縣知事譴責石原慎太郎〉, 11月4日。
- 田思宜 (2001), 〈東京公立殘障學校採用新歷史教科書大江健三郎痛批〉, 8月9日, 聯合報 5版。
- 陳世昌 (1990), 〈接受『花花公子』訪問日本下屆首相人選石原慎太郎：『南京大屠殺，中國人編造的』〉, 9月8日, 聯合報, 6版。
- (1999), 〈石原親台北遠北京〉, 4月15日, 聯合報 13版。
- (2000a), 〈日議員將籌組委員會邀訪李總統北京重申堅決反對立場〉, 3月8日, 聯合報 A14版。
- (2000b), 〈北京與日本外務省強大壓力下達賴抵日訪問不與石原會面〉, 4月14日, 聯合報 A14版。

(2005),〈反中升溫石原慎太郎力促釣魚台駐軍〉,5月3日,聯合報 A14 版。

泉州網(2005),〈抗議台爭主辦權北京退出亞洲主要都市網〉,9月3日,
http://www.qzwb.com/gb/content/2005-09/03/content_1785421.htm。

黃菁菁(2007),〈石原新片引爭議神風特攻隊英勇赴死?美麗誤解〉,3月1日,中國時報 14 版。

新華社(2005),〈石原慎太郎登沖之鳥礁〉,5月25日,<http://news.sina.com.cn/w/2005-05-25/12226744932.shtm>。

董更生(2001),「日右派與反戰示威者,大打出手」,8月16日,聯合報 11 版。

聯合報(1973a),〈日自民黨年輕議員以組成青嵐會歃血為盟誓與共黨作戰〉,7月19日,四版。

(1973b),〈日本『青嵐會』會員採取明確反共行動〉,7月21日,四版。

Displaced in Modernity: The Question of Ishihara Shintaro

Ya-Han Chuang

Abstract

Widely known for his nationalistic view of Japan's international status, Ishihara Shintaro is commonly considered the most eminent character among Japan's right wing politicians. This article reviews his comments on Japan's history and foreign relation and examines his deeper motivation to resist US and China so as to ensure Japan's status as a modern, civilized nation-state. In doing so, the linkage between Ishihara's ideology and that of the Japanese intellectuals before World War Two is unveiled: both try to depreciate China while enabling Japan to challenge the West as Asia's leader. However, contemporary China's rise makes it impossible to disdain China as Ishihara's predecessors have done, and thus his critique is trapped in a different dilemma.

Keywords: Asia, Asianism, China, Cold War, Ishihara Shintaro, Japan, Normal State

國家發展研究 第七卷第二期
2008 年 6 月 頁 63-88

面對中華思想： 中嶋嶺雄解析現代中國

劉智瑋^{*}

收稿日期：2007 年 5 月 30 日

接受日期：2007 年 12 月 15 日

^{*}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生；通訊地址：新竹縣竹北市勝利一路 150 號 7 樓；聯絡電話：0932937720

摘要

本文在探討名聞國際的中國研究者中嶋嶺雄對現代中國的觀察與預測，特別是以他右翼學者的身份，如何面對中共政權統治下的中國。首先，本文介紹中嶋在政治面、經濟面與社會面對中國的看法。其次，本文進一步闡述中嶋在東亞，中華思想與中國威脅論三項重要論述。再者，本文藉由敘述中嶋對中日關係的批評，反映他對中國的警覺與不滿。最後，筆者嘗試分析中嶋透視中國的三種視角並做結論：他對中國的批判正是出於對「中華思想」的警覺與抗拒。他相信美國的自由和民主主義，但其右翼學者的身份，使得他將中國定性為畸形國家並嘗試將其國家前途完全抹殺。另一方面，則又從中國社會的特殊性出發，把中國放在特殊性的理論體系下理解，因而陷入無法把握中國發展的新動向之泥沼。

關鍵字：中國觀、中華思想、中國威脅論、中日關係、東亞

壹、前言：中嶋嶺雄其人

中嶋嶺雄 1936 年出生於日本長野縣松本市，東京外國語大學中國科畢業，東京大學國際關係論碩士、社會學博士，曾任東京外語大學教授、校長，北九州市立大學大學院教授、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客座教授、亞洲太平洋大學交流機構（UMAP）國際事務總長等職，現任設立於日本秋田縣的國際教養大學（首任）校長。他曾任日本文部科學省「中央教育審議會」委員（第 1 期～第 3 期），及「教育再生會議」民間委員。

年少的中嶋於就讀東大社會學研究所期間研究中蘇論爭，對於反映「毛澤東思想」的人民公社運動、大躍進運動等就存有許多疑問。因此在 1964 年秋天由青木書店出版了他第一本批判毛澤東思想的書《現代中国論—イデオロギーと政治の内的考察》。雖然得到許多的迴響，但他也受到研究中國和蘇聯的學者們強烈批判，引起喧瀾大波。¹而在中嶋首次擔任大學教師的 1966 年夏天，中國發生文化大革命。但由於日本和中國沒有邦交，所以中嶋很難取得相關資訊。為研究文化大革命及往後中國的走向，適逢在中國舉辦孫文的百週年誕生紀念大會，他自願前往中國參加。當時，他在上海時還因為要拍攝武力鬥爭的照片而慘遭紅衛兵的追趕，但也取得了非常重要的情報。於是他在《中央公論》裡以「毛澤東逃離北京真相」為題，寫了長篇論文，並翻譯成各國語言，在國際間受到廣大的迴響。²1977 年，在澳大利亞的國立大學創設沒多久後，中嶋被邀請去領導現代中國中心，1980 年當了巴黎政治學院的客座教授，讓他畢生難忘的是，研究中國的頂尖權威 John K. Fairbank 教授

¹ 佐藤文子，《私の半生—中嶋嶺雄》，第一號，「母校の教師に」，信濃毎日新聞松本專賣所：<http://www.matsusen.jp/myway/nakajima/nkj10.html>

² 佐藤文子，《私の半生—中嶋嶺雄》，第一號，「初めての訪中」，信濃毎日新聞松本專賣所：<http://www.matsusen.jp/myway/nakajima/nkj11.html>

邀請他執筆撰寫了劍橋中國史叢書。³中日建交後，中嶋常到中國各地旅行，兼作調查。1999 年夏天，他在短時間內跑遍大江南北，深刻體會到「中國之廣大」。對於北京、天津等都市嚴重的公害與環境污染問題，其惡化的程度實在超乎他的想像。他對此感嘆：「沒有以民意為依歸的政治，也就不會產生關懷環境的政策或考慮人權的思想。」⁴

中嶋嶺雄堪稱是目前日本國內研究現代中國的第一人，其著書甚多，主要在研究中國、台灣、香港的政經情勢與對兩岸三地做發展趨勢的預測。然而，日本右翼學者、文人的思想言論的基本特徵，中嶋嶺雄多半具備；⁵因此，稱他為首席右翼中國問題專家也不為過。不過，儘管中嶋有其立場，但他對中國的分析仍是不容小覷。他在 2003 年獲得日本富士產經集團的第十九屆「正論大賞」，理由是「以敏銳的觀察力，將台灣的總統民選評價為『提高台灣人的認同感，並且使其與國家相結合的一種制度』」。⁶可見他對兩岸三地的研究相當受日本民間的肯定。此外，從中嶋早在 1987 年就於《劍橋中國史》中撰寫關於中共外交關係的文章來看，他對現代中國的研究也是受到西方學界的注意的。因此，

³ 這件事使中嶋覺得他受到美國學界的肯定，因而讓他對美國產生好感，這可能是造成他日後親美的關鍵。佐藤文子，《私の半生—中嶋嶺雄》，第一號，「日中国交回復」，信濃毎日新聞松本專賣所：<http://www.matsusen.jp/myway/nakajima/nkj12.html>

⁴ 長谷川慶太郎、中嶋嶺雄合著，賴清松譯，《後李登輝時代風雲》，台北：台灣先智，2001，頁 189-191。

⁵ 日本右翼學者、文人的思想言論基本上有三點共通特徵：第一，「天皇至上主義與皇國史觀」；第二，「民族中心主義與免罪情結」；第三，「反共主義與排華思想」。見步平、王希亮，《日本右翼問題研究》，北京市：中國社會文獻出版，2005，頁 418-419；王向遠，《日本右翼言論批判》，北京市：昆侖出版，2005，頁 9-12。最明顯的例子是，中嶋認為，「即使是口頭上不得不贊成反日論調的台灣人，在其內心深處也對皇宮、天皇及皇室抱持著某種難以形容的尊敬或親切感。」見長谷川慶太郎、中嶋嶺雄，2001，前揭書，頁 165-166。

⁶ 日本富士產經集團的「正論大賞」選考委員會認為，中嶋是「以言論維護自由與民主主義具有最卓越貢獻的人」，並對於他在台灣的民主化所提出的評價特別肯定，而決定將該年度（2003）的「正論大賞」頒給他。見〈評價台灣民主化受肯定，中嶋嶺雄榮獲正論大賞〉，自由時報電子版，2003/12/19：<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3/new/dec/19/today-fo4.htm>

中嶋身為名聞國際的中國研究者，他對中國的觀察與預測是相當值得讀者一窺究竟的。

本文的寫作目的在探討中嶋對現代中國的觀察與預測，特別是以他右翼學者的身份，如何面對中共政權統治下的中國。首先，本文介紹中嶋在政治面、經濟面與社會面對中國的看法，讓讀者能一窺中嶋的中國觀。其次，本文進一步闡述中嶋在政治上、經濟上與軍事上對中國的三項重要論述，使讓讀者能深入理解中嶋的中國認識。再者，本文藉由敘述中嶋對中日關係的批評，反映他對中國的警覺與不滿。最後，筆者嘗試分析中嶋透視中國的三種視角並做結論。

貳、中嶋的中國面面觀

一、中國的政治情勢

對於中共的統治，中嶋一向抱持負面的看法；他認為「中國政府」的本質並未改變，也從未試圖改變。⁷換句話說，中共一黨獨裁的統治形式並不會因改革開放及經濟發展而鬆手。即使到了二十一世紀，言論自由與宗教自由仍然被中共嚴格控制，完全逆行於國際社會講求民主人權的潮流。⁸所以，近幾年「中國政府所表現的一切作為，只是為了順利取得奧運的主辦權，在這個前提下，一切都好談。」他相信在順利舉辦奧運之前，中國仍將延續這張假面具。⁹不過，中嶋也呼籲世人，「儘管中國目前依然維持著獨裁體制，但國內仍然有各種矛盾與危機，而且這些問題¹⁰將愈來愈嚴重。」¹¹中共一黨獨裁的統治系統也將難以維持下去。

⁷ 長谷川慶太郎、中嶋嶺雄，2001，前揭書，頁 184。

⁸ 中嶋嶺雄、古森義久合著，2002，《霸權か、崩壊か 2008 年中国の真実》，東京：ビジネス社，頁 275。

⁹ 長谷川慶太郎、中嶋嶺雄，2001，前揭書，頁 184。

¹⁰ 例如，失業問題、農村問題、糧食問題、環境問題、能源問題、國有企業改革問題以及貪污問題等等。見中嶋嶺雄、古森義久，2002，前揭書，頁 268。

畢竟，為了使中國這座「世界工廠」以後也能穩定的運作下去，整個社會系統必須朝著真正的「改革開放」之路邁進；在沒有政治自由的狀況下發展將是不可行的。¹²再者，「從毛澤東到胡錦濤，沒有一位領導人是由人民選出的國家代表。換句話說，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至今仍未舉行過任何一次真正的選舉。」¹³只要中國依然無法以民主選舉的方式決定國家領導人，中共的統治將一直處在不安的陰影下。因此，中嶋希望世人也要考慮未來中國以怎樣的形式倒下的可能性。¹⁴至於崩潰後的中國如果還想維持「統一」，他認為恐怕也只有「分權的中國」這個選項。¹⁵

二、中國的經濟景況

（一）中國經濟其實是隻「紙老虎」

對於近年來中國的經濟發展，中嶋並不看好，並強調不能被快速經濟成長的外表所騙。¹⁶「從目前中國的國民每人平均生產毛額或收入來看，在可預見的將來，中國幾乎沒有超越其他亞洲已開發國家的可能性。」¹⁷他進而揭發中國經濟根本的脆弱性：首先，中國向來不自力開發，其完全仰賴外資（三分之一來自台灣）的經濟構造一直沒有變化；如今日本的經濟援助（ODA）已成為中國支撐國內經濟不可或缺的一份力量。¹⁸其次，中國的經濟發展並未腳踏實地改善產業結構，GDP 中有

¹¹ 「中嶋嶺雄：中國經濟可能在 2008 年後泡沫化」，2003/8/16，大紀元時報：<http://www.epochtimes.com/b5/3/8/16/n359810.htm>

¹² 中嶋嶺雄、古森義久，2002，前揭書，頁 30。

¹³ 長谷川慶太郎、中嶋嶺雄，2001，前揭書，頁 63。

¹⁴ 中嶋嶺雄、古森義久合著，2006，《米中新戰爭—暴走する中国、封じ込めるアメリカ》，東京：ビジネス社，頁 22。

¹⁵ 中嶋嶺雄、古森義久，2006，前揭書，頁 23。

¹⁶ 中嶋嶺雄、古森義久，2006，前揭書，頁 166。

¹⁷ 長谷川慶太郎、中嶋嶺雄，2001，前揭書，頁 68。

¹⁸ 岡崎久彥等合著，林玉佩、周素芬合譯，2001，《2005 年美日中決勝台灣》，台北：台灣先智，頁 70；中嶋嶺雄、古森義久，2006，前揭書，頁 167；中嶋嶺雄、古森義久合著，2005，《中国暴発—なぜ日本のマスコミは真実を伝えないのか》，

40%是不良債權，且完全無法預料何時能達到平衡。¹⁹最後、也最重要的是，中國所負擔的龐大外債。儘管「目前中國沿海地區的經濟開發腳步，快得令人難以置信，但是這些用來開發的資金，卻不是中國國內所累積的自有資本。而是透過各種巧立的名目，由國外引進大量的資金，才得以勉強支持中國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換句話說，包括各國民間企業的直接投資，以及日本政府的巨額 ODA 援助在內，都是另一種型態的外債。這些債務總數在國內生產總額上所佔的比例，遠遠超過一般人的想像，所以說中國經濟是外債經濟也不為過。」²⁰因此，中嶋大膽預測「中國在 2008 到 2010 年可能會發生泡沫經濟的危機」；而目前中國經濟的發展，「只是官方粉飾太平的外表，一旦崩潰，所有投資中國的外資企業將身受其害」。²¹他因此呼籲日本和台灣等外資企業應該看清中國的經濟的危險性與極限，並先做好危機應變措施，否則「將被中國拖垮」。²²

（二）中共以「中國式社會主義」發展經濟

中嶋對於中國發展經濟的手法，抱持相當負面的看法。他警告世人，「在社會主義國家的大旗之下，中國人仍舊信服『共產主義者以掠奪資本家之財產為最大的善』的教條」；中國經濟體質的根本是「頑固的社會主義」。²³換句話說，中國人侵吞外商資產的手段，「可說五花八門無所不有；而其最終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徹底侵占外商的財產。」²⁴

東京：ビジネス社，頁 24。

¹⁹ 「中嶋嶺雄：中國經濟可能在 2008 年後泡沫化」，2003/8/16，前引文。

²⁰ 長谷川慶太郎、中嶋嶺雄，2001，前揭書，頁 68。

²¹ 「中嶋嶺雄：中國經濟可能在 2008 年後泡沫化」，2003/8/16，前引文。

²² 中嶋嶺雄、古森義久，2005，前揭書，頁 30；「中嶋嶺雄：中國經濟可能在 2008 年後泡沫化」，2003/8/16，前引文。

²³ 長谷川慶太郎、中嶋嶺雄，2001，前揭書，頁 74；中嶋嶺雄、古森義久，2002，前揭書，頁 92。

²⁴ 中嶋舉日本的「八百伴集團」在中國上海投資失敗為例，以諷刺「中國將成為二十一世紀的經濟大國，只要對中國投資就會賺錢」這種論調只是一種幻想。見長谷川慶太郎、中嶋嶺雄，2001，前揭書，頁 74。

對此，中嶋提醒日本投資者得小心提防，尤其要考慮「對方」是否是值得信賴的合夥人；「如果用一般的處世原則與中國人往來的話，恐怕將遭遇難以想像的下場」。²⁵此外，中嶋認為，在至今中國自我中心的「中華思想」仍舊是支配中國一切行動的最高原則下，中國政府當會試圖自行生產各項重要的民生物資；²⁶然而，以中國目前的條件，要達到這個理想實有困難。所以，引進外商的技術，並且使其惡性競爭，最終達到竊取「Know-how」的目的，再把外資企業一腳踢開，正是中國政府增強國民製造能力的惡劣手法。因而中嶋對此情形怒斥：「當利用價值喪失之後，中國人的殘酷與翻臉無情，只有曾經親身體驗的人才能瞭解。」²⁷

三、中國的社會實態

（一）缺乏法治觀念的中國社會

中嶋眼中的中國社會是相當缺乏法治觀念的，可謂「上下交相賊」，人人大鑽法律漏洞。他認為，雖然傳統中國儒教文化是由法治主義、德治主義兩大支柱來支持，但與近代歐美強調人民權利的羅馬法概念不同；中國傳統的「約法三章」被認為其法令並無詳細地規定。換句話說，中國的法令並非用來保護人民，而是傳統的刑責本位的法的概念，它主要是為了要處罰人民。對皇帝而言，則儘可能地將法令簡單化，如此便可方便皇帝自由地解釋法令。因此，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領導人們也幾乎是不守憲法，同時也是儘可能地將憲法簡略化。而對一般人民來說，也致力於欺上瞞下，大鑽法律漏洞。²⁸對此，中嶋將這種情形稱作「全然不考慮規制的中國人的本性」。²⁹

²⁵ 長谷川慶太郎、中嶋嶺雄，2001，前揭書，頁 74。

²⁶ 中嶋嶺雄、古森義久，2006，前揭書，頁 149；長谷川慶太郎、中嶋嶺雄，2001，前揭書，頁 73-74。

²⁷ 長谷川慶太郎、中嶋嶺雄，2001，前揭書，頁 74。

²⁸ 中嶋嶺雄，1988，《21 世紀台灣・日本・韓國》，台北：武陵出版，頁 139。

²⁹ 中嶋嶺雄，1988，前揭書，頁 140。中嶋經常在其書中指出，通常集體主義國家在法律與規定的執行上，可說毫無討價還價的餘地，但是中國則不然。「有時漫

也因如此，中嶋認為中國對法的概念和國際社會背離，並質疑中國能否遵守國際規則。³⁰例如，在中方不重視現代契約概念的情況下，中國想由日本導入工廠，卻突然取消；即使是中日合作的企業，也常有突然改變當初條件的狀況。對此，中嶋大感意外：「他們對於此一點也不覺得有罪惡感。」³¹並認為中國如今變成「為錢騙人的金錢萬能社會」正是二十年的改革開放所產生的最大負遺產。³²另一方面，中嶋則批評中國司法缺乏獨立性，政治色彩極為強烈。³³

（二）三大社會問題將使中共的統治面臨挑戰

中嶋指出中國三大社會問題將造成中國共產黨的統治面臨危機。首先，「法輪功」的盛行將對中國共產黨的統治造成挑戰。從某個角度來看，「法輪功」的出現確實提供了中國人民（尤其是貧民）宣洩不滿的出口；當中共一黨獨大的正當性愈發受到人民質疑時，「法輪功」的成長當然是一發不可收拾。³⁴反觀中國共產黨，現在的黨員人數遠不及「法輪功」，甚至連從黨中央都有「法輪功」的信徒；從中國當局不惜出動軍警對其展開徹底的鎮壓，更反映出中國共產黨已然面臨建黨基礎的動搖。³⁵其次，在中國「主要（優良）國有企業」長年虧損下，內地「下崗」的失業人數高達數千萬人之譜，讓整個社會幾乎陷入瀕臨崩潰的邊緣。³⁶最嚴重的是，中國社會的「新富階層」僅限於沿海，大多數人民仍舊貧困；貧富差距加劇可能動搖中國共產黨的統治根基。³⁷

步在中國的街道上，根本感覺不出車道與人行步道的差別，許多中國人就大刺刺地走在車道上，或許這便是中國人難以改變的一面」。見長谷川慶太郎、中嶋嶺雄，2001，前揭書，頁192。

³⁰ 中嶋嶺雄、古森義久，2002，前揭書，頁36。

³¹ 中嶋嶺雄，1988，前揭書，頁140。

³² 中嶋嶺雄、古森義久，2002，前揭書，頁48-49。

³³ 中嶋嶺雄、古森義久，2002，前揭書，頁129。

³⁴ 中嶋嶺雄、古森義久，2002，前揭書，頁82；長谷川慶太郎、中嶋嶺雄，2001，前揭書，頁196、199。

³⁵ 岡崎久彥等，2001，前揭書，頁85-86。

³⁶ 岡崎久彥等，2001，前揭書，頁71；長谷川慶太郎、中嶋嶺雄，2001，前揭書，

（三）行動電話與電腦網路將改造中國社會

中嶋預測行動電話與電腦網路的發達，確實會為中國帶來意料之外的重大改變。首先，藉由電腦或行動電話的資訊網路，各式各樣的情報將在社會上交流；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階層，難免會出現放棄共產主義路線的奇想；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或許就有這種傾向。如此一來，中國的戈巴契夫的出現或許指日可待。」³⁸此外，儘管中國政府持續對國內的行動電話與電腦網路進行全面監控是事實，但是面對已然氾濫開來的行動電話與網路洪流，就算是獨裁控制的共產黨也阻擋不了。³⁹更何況，現在中國拼命想擠上資訊產業革命的列車，唯恐落在世界各國之後，此舉更是形同中共在自掘墳墓。⁴⁰

參、中嶋三論中國

一、「中華思想」與中國的國家意識

（一）「中華思想」讓東亞共同體的幻想結束

中嶋大力批判中國仍舊以傳統的「中華思想」處理現代國際間（尤其是中日兩國）的外交關係，而他認為「中華思想」的本質就是「中國中心主義」；⁴¹其指的也就是研究「中國學」的學者所稱的「華夷秩序」。⁴²其一般被理解為「以中國皇帝與周邊各國的國王之間所形成的禮儀關係為基礎的國際秩序」。⁴³這種華夷秩序有兩項主要特徵：其一是

頁 87-88。

³⁷ 岡崎久彥等，2001，前揭書，頁 71；中嶋嶺雄、古森義久，2006，前揭書，頁 183-184。

³⁸ 長谷川慶太郎、中嶋嶺雄，2001，前揭書，頁 189。

³⁹ 長谷川慶太郎、中嶋嶺雄，2001，前揭書，頁 192。

⁴⁰ 長谷川慶太郎、中嶋嶺雄，2001，前揭書，頁 192。

⁴¹ 中嶋嶺雄、古森義久，2005，前揭書，頁 58-59。

⁴² 而「中華思想」一詞乃日本右翼文人一般對所謂「中國中心主義」的指稱。

⁴³ 白永瑞，2006，〈東亞地域秩序：超越帝國，走向東亞共同體〉，「政治學與文化研究第二十九次會議」論文（4月27日），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

以天子自居的中國皇帝為核心向外圍擴張的文明圈。即從將中國視為世界中心的同心圓出發，依照受中華文明「禮、法、德」教化的程度，由內而外區分成「內臣」、「外臣」、「朝貢國」等國，從而形成位階秩序的華夷文明圈。⁴⁴另一特徵則是中國皇帝和其文明圈周邊受教化國王之間的朝貢和回賜關係。由此看來，華夷秩序「既是國家、王朝之間的禮儀的對外關係，也是外交和通商上相輔相成的國際秩序」。⁴⁵然而，在中嶋的眼中華夷秩序則是「只有把中國皇帝作為頂點的垂直金字塔構造與要外國人下跪的朝貢外交」，沒有「東亞」的概念。⁴⁶因此，他呼籲世人必須讓東亞共同體的幻想結束，更不能給中國像過去那樣的舞台。⁴⁷

（二）舉辦 2008 北京奧運只會助長「中華思想」

對於舉辦 2008 年北京奧運是否將有助中國朝開放民主的方向邁進，中嶋則是持保留的態度。他進而提出否定的看法：「奧運在中國政府的眼中，只是另一個發揚國威的大好機會，因此中國可說傾全國之力，以不惜一切代價的態度，只為了奪得奧運的主辦權。只要奧運在中國舉行，中國人肯定會搬出更多的五星紅旗，插遍北京的任何一條大街小巷，一想到要在一大片火紅的旗海，與中國虛榮膨脹的國家意識中進行比賽，許多國家就不免心生嫌惡。」⁴⁸因此，中嶋也質疑，即便中國可能在歷經北京奧運前後幾年的激烈震盪民主化，民主化後「中華思想」是否會因此消失也是個大問題。⁴⁹換句話說，現在中國所謂的「愛國主義」並不是「愛國心」，而是自我中心的「中華思想」；尤其是「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中國是世界的大國」的這種意識，更是一種排

頁 1-2。

⁴⁴ 白永瑞，2006，前揭文，頁 2；中嶋嶺雄、古森義久，2005，前揭書，頁 104。

⁴⁵ 白永瑞，2006，前揭文，頁 2-3。

⁴⁶ 中嶋嶺雄、古森義久，2006，前揭書，頁 121、227。

⁴⁷ 中嶋嶺雄、古森義久，2006，前揭書，頁 122。

⁴⁸ 長谷川慶太郎、中嶋嶺雄，2001，前揭書，頁 187。

⁴⁹ 中嶋嶺雄、古森義久，2005，前揭書，頁 137。

外的國家主義。⁵⁰他強調中國這種國家色彩極度高張的想法與做法，確實引起許多發展較成熟的國家的反感。⁵¹

二、中國的社會主義及其經濟發展

（一）社會主義讓中國成為「儒教文化圈」的劣等生

一九八零年代初期，在以日本與東亞四小龍（台、韓、港、星）等東亞新興工業國家的經濟發展受到世界注目的同時，政經學界盛行著儒教文化有助國家經濟發展的論述，即所謂「儒家資本主義」（Confucian Capitalism.）；中嶋嶺雄當然也沒在這股學術潮流中缺席。他在 1987 年出版《21 世紀日本・台灣・韓國》一書，隨後於 1994 年又在西方政經學術期刊上發表一篇名為《東亞經濟發展與儒家倫理》的文章，兩者皆在論述「儒教文化圈」的日本、台灣、韓國為何能發展強盛，並預測此東亞三國的連攜將在 21 世紀成為東亞的核心以及帶領亞太地區經濟發展的火車頭。⁵²其中，中嶋引用並相當贊同韓國學者金日坤的論點，即儒教文化圈擁有三項特徵：第一、家族集團主義，第二、學習主義，第三、可用「信」來代表「仁、義、信」等全部德目的倫理行動規範；⁵³並認為其正是使東亞新興工業國家經濟發展迅速的關鍵。

不過，中嶋同時也指出，儘管中國、北韓和越南也算是「儒教文化圈」的成員，但在一九八零年代當時仍未達成工業化和現代化，是因為「無論儒教文化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助益再怎麼顯著，只要是採用社會

⁵⁰ 中嶋嶺雄、古森義久，2005，前揭書，頁 137；中嶋嶺雄、古森義久，2006，前揭書，頁 219。

⁵¹ 長谷川慶太郎、中嶋嶺雄，2001，前揭書，頁 187。

⁵² 他認為，「在東亞地區已漸漸形成日本、台灣和韓國的一個連攜現象。而唯有這個連攜，能成為東亞的核心；並領導日後的亞洲地區。日本、台灣和韓國的經濟、社會的牽引力，對亞洲太平洋地區活性化方面，有相當的影響。」見中嶋嶺雄，1988，前揭書，頁 101。

⁵³ 中嶋嶺雄，1988，前揭書，頁 144-147；Mineo, Nakajima. 1994.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East Asia and Confucian Ethics." *Social Compass* 41(1): P.116-117.

主義制度的國家，便不能達成其現代化的步調」。⁵⁴對此，以上述的第三項特徵為例，他說明了為何中國雖屬「儒教文化圈」卻難以發展的原因：「以『信』為代表的倫理行動規範，在日本則表現為各方面的優良服務。而由於受到毛澤東思想的壓迫，中國人的服務精神便極快速地低落。這原本是中國人的倫理行為規範，但在社會主義的制度下，何時被破壞無疑？特別是社會主義的假平等，以及欠缺競爭意識等，使得問題更加嚴重。」⁵⁵由此可知，中嶋認為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阻礙了其經濟發展的機會，同時也讓中國因此成為「儒教文化圈」的劣等生，無法趕上一九八零年代東亞新興工業國家經濟起飛的頭班車；他反對社會主義制度的立場，在此表露無遺。

（二）中嶋對中國經濟發展政策的三點主張

雖然中嶋否定「中國式社會主義」的經濟發展政策，但仍提出能改善並促進中國經濟發展的三點主張。首先，他認為現今中國「改革開放」政策最大的問題在於貿然引進市場經濟，卻幾乎沒有進行產業結構的轉換。⁵⁶而早在趙紫陽推行「改革開放」政策初期，他曾主張腳踏實地推行陳雲的經濟政策比較適合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情況：也就是在當時社會主義僵硬的經濟系統架構仍然存在的情況下，應該階段性緩慢引進市場原理，同時儘可能實行加強經濟基礎的政策，並避免消費過度或投資過熱。為了執行上述政策，他認為一方面必須使政治、社會生活彈性化以激發國民的生產力，使其能自己籌措資本、累積社會資金，並確實執行這種經濟基本原理。但是，這有個附帶條件，即必須配合增強經濟基礎以進行政治改革，採行民主措施。⁵⁷

⁵⁴ 中嶋嶺雄，1988，前揭書，頁131；Mineo，1994，前引文，頁115。

⁵⁵ 中嶋嶺雄，1988，前揭書，頁147。

⁵⁶ 岡崎久彥等，2001，前揭書，頁72。

⁵⁷ 中嶋嶺雄著，曾永賢審訂，張隆義等合譯，1990，《中國的悲劇》，臺北：中央日報出版部，頁124。

其次，中嶋還主張，中國應該與臺灣或東南亞等海外的華人社會合作，並建立某種平行的聯合關係，則或許會有很好的結果。但他強調，這與中共當局一再表示希望採取「一國兩制」的模式收回香港、統一臺灣完全不同，而是中國本身改採用聯邦形態，在經濟現代化及中產階級社會的進步程度方面彼此競爭。例如將香港與廣東省合併，讓其完全自由化；或讓臺灣與福建省合併，塑造成各省的發展典範；並進而成立「廣東話經濟圈」與「閩南語經濟圈」等。⁵⁸換句話說，他認為如果中國能建立這種形式的寬鬆聯邦制並採用「一省或數省現代化、工業化首先成功」策略，其未來發展將不可限量；而且「『中華聯邦共和國』比『中華人民共和國』要適合多了」。⁵⁹

最後，中嶋更大力主張，中國應該學習臺灣的發展經驗。但是，學習臺灣經驗將使中國脫離社會主義體制，中共的一黨獨裁政權更會因而崩潰；他認為在這個前提下將是相當艱鉅的事。⁶⁰

三、中國軍事威脅論

（一）以「槍桿子出政權」為信念的軍備擴張

中嶋的中國威脅論，主要建立在對近年來中國的軍事膨脹感到恐懼的認知基礎上。⁶¹他指責中國官方發表的國防預算不完全、不透明、更不可靠，官方公佈的國防預算數字更是實際的三倍。⁶²其次，中嶋認為中國近年來不斷擴編軍事預算的舉動正是基於「槍桿子出政權」的信

⁵⁸ 中嶋嶺雄，1990，前揭書，頁130、頁163-164。

⁵⁹ 中嶋嶺雄，1990，前揭書，頁132。

⁶⁰ 中嶋嶺雄，1990，前揭書，頁131。

⁶¹ 中嶋嶺雄、古森義久，2006，前揭書，頁126。

⁶² 中嶋嶺雄、古森義久，2006，前揭書，頁126。對此，中嶋一再強調，「中國是全世界最善於玩弄文字遊戲的民族，他們所謂的國防預算，實際上並不包括武器、設備的採購支出，當然更不包含開發與研究核武等高科技武器的費用在內。中國政府每年花在這些部分的預算，甚至還有日漸增多的趨勢。」見長谷川慶太郎、中嶋嶺雄，2001，前揭書，頁86。

條，並強調這種對於武力的過度迷信是「誰也遮掩不住的事實」。⁶³因此，他質疑中國在 2003 年成功發射的載人太空船「神舟六號」不是為了商業通信而是完全基於軍事目的，因為發射太空船的裝置和發射「東風飛彈」的裝置完全相同。⁶⁴最後，中嶋更屢次強調，現在的中國完全沒有任何軍事威脅的外敵，在世界上卻只有中國在走軍擴路線；因此中國這種年年增強軍力的動作，「被世人看作有意對外侵略的準備，也就無可厚非了」。⁶⁵

（二）中國「軍事大國化」的三點理由

至於中國為何要如此致力於擴張軍備？中嶋進而提出三個主要的理由。首先，他認為中國至今仍舊標榜著「中華思想」的華夷秩序；基於這種中國獨有的傳統霸權思想，中共正建構其獨特的世界戰略，目標成為二十一世紀的亞洲霸權。於是，為了讓二十一世紀成為中國人的世紀，中國政府「認真而天真地思索建立世界霸權之道」，而軍備的擴張正是主要的一環。⁶⁶其次，中嶋指出中國擴編軍事預算的原因，則是為因應國內的治安問題，並特別反映在中共武裝警察的數量驟增上。他認為中國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與中共一黨獨裁的權威越來越無法有效統治將近十三億的龐大人口，「為了重建統治國家的威信，強大的軍事力量因此成為共黨政權的唯一出路」。⁶⁷最後，中嶋認為中國積極走軍擴路線是為了配合 2004 年以來與俄羅斯合作舉行的大型軍事演習，並藉由「中俄一體化」來抗衡美日的軍事安全同盟。⁶⁸另外，隨著中國政府近

⁶³ 中嶋嶺雄、古森義久，2002，前揭書，頁 124；長谷川慶太郎、中嶋嶺雄，2001，前揭書，頁 61。

⁶⁴ 中嶋嶺雄、古森義久，2006，前揭書，頁 47。

⁶⁵ 長谷川慶太郎、中嶋嶺雄，2001，前揭書，頁 63；中嶋嶺雄、古森義久，2002，前揭書，頁 241；中嶋嶺雄、古森義久，2006，前揭書，頁 46。

⁶⁶ 長谷川慶太郎、中嶋嶺雄，2001，前揭書，頁 63；中嶋嶺雄、古森義久，2006，前揭書，頁 96、127。

⁶⁷ 長谷川慶太郎、中嶋嶺雄，2001，前揭書，頁 63；中嶋嶺雄、古森義久，2006，前揭書，頁 127。

⁶⁸ 中嶋嶺雄、古森義久，2006，前揭書，頁 128。

年來積極開發南海的海底油田與天然氣，中國擴張軍備正是為確保其能源戰略的執行。⁶⁹換言之，中共此舉其實是企圖挑戰以美國觀點為基礎的亞太安全秩序。

簡言之，中嶋一再強調，如今世界上沒有任何國家可能對中國動武，然而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卻一方面年年大幅增強軍力，把美國當作其霸權戰略中的假想敵，另一方面又侵犯日本的領海，讓身為日本人的他實在有種莫名的不安。⁷⁰對此，中嶋警告世人，「和平崛起」並沒有成為中國官方一致的世界戰略，「我們不能被中國的軟路線所迷惑」，中國對周邊各國仍然是可能的危險存在。⁷¹

肆、中嶋三評中日關係

一、對中「屈從外交」與「謝罪外交」使日本淪為國際笑柄

中嶋長久以來一直批評日本政府外交政策軟弱，無法挺胸面對中國，怯於表達真正的主張，反而淪為國際上的笑柄。⁷²他指出「凡事以北京馬首是瞻」的姿態，正是日本的外交得不到世人重視的主要原因。此外，由於日本一切都以避免刺激中國為最高前提，特別是牽涉到敏感的台灣問題時，往往造成政府無法做出正確的外交判斷，對外關係上也因此日漸產生惰性。尤其是，如今全球戰略中，美中對立的新冷戰結構已成形，如果日本「仍然一派悠閒，無法採取有效的因應對策，後果將

⁶⁹ 中嶋嶺雄、古森義久，2005，前揭書，頁 146。

⁷⁰ 長谷川慶太郎、中嶋嶺雄，2001，前揭書，頁 114-115；中嶋嶺雄、古森義久，2002，前揭書，頁 275-276。

⁷¹ 中嶋嶺雄、古森義久，2005，前揭書，頁 191；中嶋嶺雄、古森義久，2002，前揭書，頁 276。

⁷² 長谷川慶太郎、中嶋嶺雄，2001，前揭書，頁 66。

難以設想」。⁷³最後，中嶋認為中國周邊的亞洲鄰國對中共其實都缺乏好感，如果日本懂得利用這個外交空間，對這些東南亞國家表示具體的善意，提供經濟上的外援，日本的國際形象將因此會大幅提昇。⁷⁴

另一方面，關於中國抗議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並斥責為日本軍國主義復辟，以及宣稱日本的高額國防預算是日本帝國主義作祟等事，日本外務省向來採取低姿態的作法，中嶋對此怒斥為「謝罪外交」。⁷⁵他認為與中共相比，戰後的日本完全沒有犧牲國民生命攻擊他國的意圖（如韓戰），也沒有用國家的力量殘害人民（如文化大革命）；中國卻對日本頤指氣使，「的確是如此蠻不講理的國家」。⁷⁶因此，中嶋強調部分日本（財界）人的贖罪意識是他們的時代問題，現在的日本人不應該承擔。⁷⁷

二、日本對中國的 ODA 援助應該謹慎

中嶋從過去就一直抨擊日本對中國的 ODA（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官方發展援助基金」援助是「沒主見的援助政策」與「對中國的屈辱外交」。⁷⁸其主要理由為以下三點：一、日本的 ODA 援助恐怕會成為中國擴充軍備的助力，甚或成為中國政府打壓人權的幫兇。⁷⁹二、中國沿海和內地的間的貧富差距日漸加劇，正是日本的 ODA 援助所間接造成的結果。⁸⁰三、日本每年供給中國的龐大 ODA 援助，其中有

⁷³ 岡崎久彥等，2001，前揭書，頁 65。

⁷⁴ 長谷川慶太郎、中嶋嶺雄，2001，前揭書，頁 98。

⁷⁵ 中嶋嶺雄、古森義久，2005，前揭書，頁 35；長谷川慶太郎、中嶋嶺雄，2001，前揭書，頁 62。

⁷⁶ 中嶋嶺雄、古森義久，2006，前揭書，頁 170；長谷川慶太郎、中嶋嶺雄，2001，前揭書，頁 114。

⁷⁷ 中嶋嶺雄、古森義久，2005，前揭書，頁 159。

⁷⁸ 中嶋嶺雄，1990，前揭書，頁 181-182；「評價台灣民主化受肯定中嶋嶺雄榮獲正論大賞」，2003/12/19，自由時報電子版：<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3/new/dec/19/today-fo4.htm>。

⁷⁹ 長谷川慶太郎、中嶋嶺雄，2001，前揭書，頁 96。

⁸⁰ 中嶋嶺雄、古森義久，2002，前揭書，頁 150-151。

部分被中共以中國的名義再次轉手，提供第三國經濟援助，結果反而變成中國的外交成績；這點尤其讓中嶋感到不滿。⁸¹

因此，中嶋認為應該根據日本政府制定的 ODA 援助四大原則，重新檢討對中國的援助。他建議採取明定用途的方式，使日本的 ODA 援款得以專款專用；或將 ODA 援款作為解決那些因中國過度開發造成日本間接受害的環境問題的共同研究基金。⁸²甚至，他一貫主張在 2008 年日本對中國的 ODA 援助關係正式結束前，早就應該立刻中止對中 ODA 援助。⁸³

三、日本親中媒體鼓吹的中國熱只是暫時的

近幾年來，在日本媒體大幅鼓吹西進下，日本財界掀起一波波投資中國的熱潮；中嶋認為，造成日本中國熱的輿論風潮和中國滲入日本媒體有關。⁸⁴隨著日本媒體（如日本經濟新聞等）和中國的人民日報合作，日本增加了許多關於中國政經民情的報導；但他認為中共當局滲透了日本媒體，對媒體進行攏絡，使得部分日本媒體（如朝日新聞）立場親中，不夠客觀。⁸⁵例如，即使遠赴中國投資的日本企業並不那麼沒有成功，也會被日本媒體奉承，可是卻很少報導日本企業在中國投資所面臨的困境，關於失敗的悲慘的經驗也幾乎不被報導。⁸⁶因此，中嶋認為日本企業完全將資本賭在中國很危險，他希望日本企業家要冷靜，也要考慮國家利益的立場，不要只追求私人的商業利益。⁸⁷不過，他也認為近年

⁸¹ 長谷川慶太郎、中嶋嶺雄，2001，前揭書，頁 96。

⁸² 長谷川慶太郎、中嶋嶺雄，2001，前揭書，頁 96；中嶋嶺雄、古森義久，2002，前揭書，頁 152。

⁸³ 中嶋嶺雄、古森義久，2002，前揭書，頁 192。

⁸⁴ 「中國滲透日本媒體」，2003/8/19，大紀元時報：<http://epochtimes.com/b5/3/8/19/n361709.htm>

⁸⁵ 中嶋嶺雄、古森義久，2005，前揭書，頁 59；「中國滲透日本媒體」，2003/8/19，前引文。

⁸⁶ 中嶋嶺雄、古森義久，2005，前揭書，頁 70。

⁸⁷ 中嶋嶺雄、古森義久，2002，前揭書，頁 272；中嶋嶺雄、古森義久，2006，前揭書，頁 146。

來「浮躁的中國熱」只是暫時的，因為最近日本的親中媒體對中國的歌頌已減少，政治上「日中友好派」也衰退；這讓他安心不少。⁸⁸

伍、結論：中嶋解析中國的視角

一、對「中華思想」的警覺與抗拒

現在的中共霸權有著強勢的國家地位，處理國際關係都是以權力均衡的全球戰略來思考，而近年來急速成長的經濟實力也給周邊國家帶來一定程度的磁吸效應。就中嶋看來，這正是中國難以磨滅的「中華思想」持續存在的證據。而他所指涉的「中華思想」，就是舊中華帝國其傳統的「華夷秩序」概念，也可是現在世人所指稱的「大中華主義」。在此觀點下，中嶋大力批判中日兩國的外交關係是朝貢關係的延續，包括日本「凡事以北京馬首是瞻」的低姿態，⁸⁹以及日本對中國的 ODA 援助就像朝貢一般等；但中國方面似乎視作理所當然，毫無感謝之意，讓他對日本政府的軟弱感到憤怒與痛心。此外，中嶋也指責中共的霸權策略仍是建築在「華夷秩序」的基礎上，只有「把中國皇帝作為頂點的垂直金字塔構造與要外國人下跪的朝貢外交」，沒有「東亞」的概念。⁹⁰他之所以強調這點是因為儘管他相信日本才是帶領「東亞」發展的龍頭，但他並沒有拋棄「東亞」的概念；⁹¹而他認為中國現在處理國際關係的心態仍是過去那套「華夷秩序」，中國只會把自己放在世界的頂端，「東亞共同體」就只能是幻想。⁹²最後，中嶋認為中共反日抗美的心態正是出於這種排外的「中國中心主義」。因為，他相信所謂「愛國心」是熱

⁸⁸ 中嶋嶺雄、古森義久，2002，前揭書，頁 98、166；中嶋嶺雄、古森義久，2006，前揭書，頁 175。

⁸⁹ 岡崎久彥等，2001，前揭書，頁 65。

⁹⁰ 中嶋嶺雄、古森義久，2006，前揭書，頁 121、227。

⁹¹ 參見中嶋嶺雄，1988，前揭書。

⁹² 中嶋嶺雄、古森義久，2006，前揭書，頁 122。

愛自己生長故鄉的感情，不是出於這種自我中心、排外的情緒。⁹³簡言之，中嶋對中國的批判正是出於對「中華思想」的警覺與抗拒。

二、強調中國社會的畸形性與特殊性

中嶋眼中的中國社會仍是落後不堪的：「只要稍微深入中國的內地，貧窮、公害、髒亂等嚴重的社會問題隨處可見。」⁹⁴可知他以現代化的角度批評中國缺乏現代公民社會應有的現代性。此外，中嶋同時也強調中國社會架構的「特殊性」，並認為其正是能勉強維繫中國社會於不墜的原因：「中國近幾年來『下崗』的失業人數高達數千萬人之譜，在這種人心浮動的情況下，整個社會幾乎陷入瀕臨崩潰的邊緣。中國社會卻能夠繼續維持原有的機能，這一點是許多外人難以想像的。」⁹⁵換句話說，他認為中國是以傳統的農村組織為基礎，地緣／血緣關係發達的社會；而社會中民眾常透過地緣、血緣關係做平行活動，並因此形成一種無形的彈性結構，使中國社會中傳統的共同體架構不易解體，並得以暫時維持下去；這也正是中嶋所強調的「中國橫向社會論」。⁹⁶而他認為中國社會由上而下支配，很難貫徹到底，可以說是潛在性的／柔性結構的橫向社會；如果想要在這種橫向社會中強行社會主義權力和以共產黨一黨獨裁為中心的縱向統治制度和縱向系統，乃是「根本的錯誤」。⁹⁷尤其「以中國社會強烈的商人屬性，原本就不適合馬列主義或社會主義的發展。」⁹⁸如此看來，中嶋除了本身強烈的反共立場外，其實是把中國社會放在畸形性、特殊性的理論體系下來理解。不過，地緣／血緣關

⁹³ 中嶋嶺雄、古森義久，2005，前揭書，頁 136-137。

⁹⁴ 岡崎久彥等，2001，前揭書，頁 71。

⁹⁵ 長谷川慶太郎、中嶋嶺雄，2001，前揭書，頁 88。

⁹⁶ 中嶋嶺雄，1990，前揭書，頁 126；長谷川慶太郎、中嶋嶺雄，2001，前揭書，頁 88。

⁹⁷ 中嶋嶺雄，1990，前揭書，頁 126。

⁹⁸ 長谷川慶太郎、中嶋嶺雄，2001，前揭書，頁 189。

係發達的社會並不專屬於中國，商人屬性也非中國特有，他似乎也有意把中國排除在「儒家文化圈」之外。

三、親美反共的立場

中嶋相信美國的自由主義和民主主義是正確的；而他認為自己正用那標準來觀察中國，所以他批判中國才因此更加嚴厲。⁹⁹因此，他指責中國人「仍舊信服『共產主義者以掠奪資本家之財產為最大的善』的教條」，並批評「無論儒教文化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助益再怎麼顯著，只要是採用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便不能達成其現代化的步調」。¹⁰⁰可見他堅決反對共產主義，對採用社會主義制度的中國不具信心。其實，中嶋反共的立場也是建立在親美的基礎上¹⁰¹：冷戰結束後，他並不認為「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對抗就此終結，在亞洲更是如此；只要亞洲殘存的兩個社會主義國家（主要是中共）還在，美中對立的「新冷戰」時代將一直持續到中國放棄共產獨裁政權為止。¹⁰²此外，他特別警告，近年來中國一方面積極參與 APEC 會議與東協（ASEAN），另一方面卻又與俄羅斯、北韓等（舊）社會主義國家強化軍事合作，甚至在「9·11 恐怖攻擊事件」爆發後仍舊和中東伊斯蘭國家來往密切；身為自由主義陣營的美日兩國，實在應該充分警戒。¹⁰³對

⁹⁹ 中嶋嶺雄、古森義久，2002，前揭書，頁 247。

¹⁰⁰ 長谷川慶太郎、中嶋嶺雄，2001，前揭書，頁 74；中嶋嶺雄，1988，前揭書，頁 131；Mineo，1994，前引文，頁 115。

¹⁰¹ 中嶋早在 1987 年於《劍橋中國史》所撰寫關於中共外交關係的文章中，即隱約透露了他親美（西方）的立場。參見 Mineo, Nakajima. 1987. "Foreign Relations: From the Korean War to the Bandung Line."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ume 14: 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 1949-1965*. eds. Roderick MacFarquhar and John K. Fairban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259-289. 他甚至認為，「如果現在的國際社會沒有美國的存在的話，世界究竟會怎麼樣？如此，就不得不考慮美國的存在還是非常重要的。」見中嶋嶺雄、古森義久，2002，前揭書，頁 233。

¹⁰² 岡崎久彥等，2001，前揭書，頁 66-67；中嶋嶺雄、古森義久，2002，前揭書，頁 207、240。

¹⁰³ 中嶋嶺雄、古森義久，2002，前揭書，頁 205-206。

此，他建議日本將來仍須強化美日同盟的正規性，並強調這不只是為了日本、也為了亞洲各國的國家利益。¹⁰⁴由此看來，中嶋親美反共的立場，堅定如一。

總而言之，儘管他從未承認，但中嶋右翼學者的身份，使得他將中國定性為畸形國家並嘗試將其國家前途完全抹殺。另一方面，則是藉由「替中國人考慮」的心態，從中國社會的特殊性出發，把中國放在畸形性、特殊性的理論體系下理解，因而陷入無法把握中國社會持續發展的新動向之泥沼。所以，雖然中嶋對中國政治、社會、經濟發展做了許多預測，卻與事實都有所出入；中國不但沒像他預期的那樣崩潰，甚至討論中國崛起強大的文獻日多。結果，中嶋則又從原來的「中國崩潰論」者進一步成了現在的「中國威脅論」者。

¹⁰⁴ 中嶋嶺雄、古森義久，2006，前揭書，頁 78。

參考文獻

一、中文專書

中嶋嶺雄（1988），《21 世紀台灣・日本・韓國》。台北：武陵出版。

中嶋嶺雄，曾永賢審訂（1990），《中國的悲劇》。（張隆義等合譯）。臺北：中央日報出版部。

長谷川慶太郎、中嶋嶺雄合著（2001），《後李登輝時代風雲》。（賴清松譯）。台北：台灣先智。

岡崎久彥等合著（2001），《2005 年美日中決勝台灣》。（林玉佩、周素芬合譯）。台北：台灣先智。

王向遠（2005），《日本右翼言論批判》。北京市：昆侖出版。

步平、王希亮（2005），《日本右翼問題研究》。北京市：中國社會文獻出版。

二、研討會中文論文

白永瑞（2006），〈東亞地域秩序：超越帝國，走向東亞共同體〉，「政治學與文化研究第二十九次會議」論文（4 月 27 日），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

三、日文專書

中嶋嶺雄、古森義久合著（2002）《覇権か、崩壊か 2008 年中国の真実》。東京：ビジネス社。

中嶋嶺雄、古森義久合著（2005）《中国暴発—なぜ日本のマスコミは真実を伝えないのか》。東京：ビジネス社。

中嶋嶺雄、古森義久合著（2006）《米中新戦争—暴走する中国、封じ込めるアメリカ》。東京：ビジネス社。

四、英文論文

Mineo, Nakajima. 1987. "Foreign Relations: From the Korean War to the Bandung Line."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ume 14: 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 1949-1965*. eds. Roderick Mac Farquhar and John K. Fairban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259-289.

Mineo, Nakajima. 1994.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East Asia and Confucian Ethics." *Social Compass* 41(1) : P.113-119.

五、網路資料與新聞

佐藤文子，《私の半生—中嶋嶺雄》，第一號，信濃毎日新聞松本專賣所：

<http://www.matsusen.jp/myway/nakajima/nkj00.htm>

大紀元時報（2003）〈中嶋嶺雄：中國經濟可能在 2008 年後泡沫化〉，8 月 16 日：<http://www.epochtimes.com/b5/3/8/16/n359810.htm>

大紀元時報（2003）〈中國滲透日本媒體〉，8 月 19 日：<http://epochtimes.com/b5/3/8/19/n361709.htm>

自由時報電子版（2003）〈評價台灣民主化受肯定，中嶋嶺雄榮獲正論大賞〉，12 月 19 日：<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3/new/dec/19/today-fo4.htm>

Confronting the China-centric Belief : Nakajima Mineo's Views of Modern China

Chih-Wei Liu

Abstract

This text is probing into Chinese researcher Nakajima Mineo's observation and prediction of Modern China whose name smelt world, especially in the capacity of scholar of his Right Wing, how to Confront China ruled by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regime. First of all, this text introduces Nakajima's Views of China in politics, economy and society. Secondly, this text explains further Nakajima's three important discussion of East Asia, China-centric Belief and China-threat theory. Moreover, this text reflects his vigilance and discontented to China by narrating the Nakajima's criticism to China-Japanese relations. Finally, I try to analyze three kinds of Nakajima's view to observe China and makes the conclusion: His criticism of China are just for the vigilance

and resisting to China-centric Belief. He believes the Liberalism and Democratism of America, but his scholar identity of Right Wing make him determine China the Nation of the Deformity and try to completely deny it's National future. On the other hand, he also proceed from particularity of the Chinese society , put China under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the particularity to understand, and therefore falls into the mire that can't hold new tendency of the China's development.

Keywords: China- view, China-centric Belief, China- threat theory,
China-Japanese relations, East Asia

第四篇 從邊緣回寫

國家發展研究 第七卷第二期
2008 年 6 月 頁 91-118

大國的陰影： 越南《中國研究期刊》 對越中關係的認識

阮懷秋^{*}

收稿日期：2007 年 5 月 30 日

接受日期：2007 年 12 月 15 日

^{*} 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生；通訊處：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高雄市鼓山區連海路 70 號；電話：0917-401568；E-mail: huaiqiu2001@yahoo.com.

摘要

本文對在 1995 到 2004 這十年間，由越南社會科學院發行的中國研究期刊中的中國經濟政治，歷史文化，中國對外關係，港澳台研究情況進行整理，並透過越南學者的越中關係研究，進而歸納他們論述中國的角度。本文集中分析兩點：第一點是有關抵抗帝國主義的歷史背景發生變遷，亦即這十年間，在沒有任何帝國主義（如法、美、中）作為參照點，以及越南對中國關係大幅開展的情況下，越南的中國學家如何重新認識中國？第二點是關於研究者的角色，透過越南中國研究院學者對越中外交關係研究的回顧，分析中國學與越南政府對中國的看法有無相互影響？

關鍵詞：大國、陰影、參照點、中國、越南、學者、巨人、挑戰、利益

壹、前言

我們必須研究現代中國問題以及越南中國在政治經濟等方面的問題，目前越南中國均進行改革經濟以及政治系統，將國家朝社會主義道路建設。中國越南改革開放研究對比將是一個重要題目，其目的在於汲取經驗。研究現代中國的問題將會提供科學論證解決目前碰到的問題以及為將來發展提供預測之據¹。

一、從國情出發的中國研究

比鄰中國的亞洲國家都有中國研究，各有特色。日本、韓國和新加坡都屬於小中型資本主義國家，他們的國情以及國家體制與中國頗不相同，自然會影響到研究中國時所關心或忽略的問題，畢竟身處於資本國家的研究者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的看法，難免與身處於社會主義環境的研究對象有所不同，不像越南面臨非常類似於中國的發展處境。

韓國目前雖有關於中國研究的學會，不過還沒有專職的中國政治研究的機構，²但是許多大學都已經設有與中國相關的科系。韓國的中國研究教學特色是重視交流與通商，而且來自社會科學的中國研究者似乎比其他國家更重視東亞區域，進而確定韓國與中國這個大國的平等位置。新加坡的中國研究仰賴旅新的外籍學者，因此研究者對新加坡本身的政治文化需要缺乏敏感，同時新加坡設有東亞研究中心，出了專研中國之外，重視對東南亞各國中國研究的整合。台灣的中國研究也有顯著的成就，台灣的幾個學府都設立中國大陸與兩岸關係研究所，研究隊伍數量多，不過，台灣的中國研究受到兩岸之間數十年的政治衝突所牽制，也因學者多數留美，受到美國社會科學學理論所影響。至於香港，也稱得

¹ 阮維貴，〈我國中國學革新與發展〉，《中國研究期刊》，1995，期1，頁6。

² 鄭在浩教授，2006年12月19日〈韓國的中國研究〉演講，國立中山大學。

上是中國研究最豐富的學術社群之一，不僅在政治經濟對外關係而且還在歷史文化各方面進行研究，回歸後尤其，在戲劇，文學等歷史文化方面更加豐富。

越南的中國研究與上述各國的中國研究不相同。首先，越南當代中國研究的出發點，因其國情與中國體系相當，研究中國內部發展情況，可以對越南自身走社會主義模式的市場經濟有直接的啟發。不過，越南的學者也關心其他國家中國研究關心的課題，因此對於中國崛起的研究如同在別處一樣受到重視，主要研究議程包括了中國在世界上的位置以及中國對外政策的變遷，只是具體研究的重點則與越南有關，目的在於掌握中共對越南的政策。

另一方面，由於歷史的原因，早期越南同中國與蘇聯均屬於社會主義國家，作為小國的越南，當時受到蘇聯與中國在經濟軍事教育等諸多方面的援助，因此，在 50 年代到 60 年代之間，有一批學生赴中國大陸讀書，如今在越南中國研究院就有一部分資深研究員是當年留學中國回來，比如阮輝貴教授。另外，從蘇聯回來的如梨文美博士。現今中國研究院還有一批年輕學者受到台灣政府援助赴台灣留學，如阮春強碩士研究生、阮氏蓮香碩士研究生、揚文利碩士研究生、杜玉全碩士研究生、梨俊青碩士研究生。相較於在老一輩研究者曾經通過中國毛澤東時代的培養，新一代則享受新世紀的新國際環境，他們之間有何不同，值得關注。新的研究隊伍將如何對中國研究院有所貢獻呢？

二、實用性的中國研究

越南中國研究十年來主題豐富，而且獨立於世界各國之外的學術主體性頗高。不論從越南的中國研究經費來源，還是從研究課題的開展，研究者能完全依照越南政府實際要求出發，而不受國際流行話語的干擾。比如，越南中國研究院的經費來源就是由政府支付。研究院也發展與美國日本或台灣的合作研究項目。若在過去，越南的中國研究完全是

為了預防侵略，努力掌握中國對越南的行動。越中雙方進行內部改革而且雙邊關係改善以後，現今越南的中國研究增加了為學習而研究的動機，並為了解中國而有助於制定各種內外政策。由於過去衝突的背景距今不遠，故同時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是否仍有是為了防禦而研究的成份。

越南的中國研究是從小國看大國，從邊緣看大國，不過，這種越南中國研究的看法與日本、韓國、新加坡及香港等其他地區有所不同。因為，在體制與國情上，越南有很多條件與中國相像，意識形態也同中國雷同，這一點明顯與其他國家的中國研究的環境不一樣。在這樣的類似性之下，越南的中國研究的實用性很強，因為越南各界都認為，既然中國所走過的改革歷程可能越南也必須經歷，則中國在走向改革這一路線的同時碰到什麼困難，以及中國所選擇的總體方向是什麼，便應該予以注意參考，在越南展開社會主義改革的歷程後，「中國研究期刊一定是為國家政策制定機關提供科學論據」。³

准此，十年來越南學者在中國研究期刊主要研究並發表有關中國政治經濟、對外關係、歷史文化以及港澳台的文章總共 538 篇，其中政治經濟相關者 179 篇、對外關係 106 篇、歷史文化 183 篇、港澳台 70 篇。

在十年研究中，政治經濟方面主要發表的是包括，有關現代中國經濟現狀與展望（1995 年第一期），近來中國鄉鎮企業發展情況（1995 年第二期），中國國有企業改革初探（1996 年第一期），中國農業多樣化問題初探（1997 年第 4 期），東亞金融危機的中國初探（1998 年第 1 期），環境污染中國 21 世紀的挑戰（1999 年第 2 期），中國經濟改革開放成就與教訓（1999 年第 5 期），中國加入世貿的初探（2001 年第 2 期），經濟一體化影響下的中國對外經濟政策（2001 年第三期），中國二十一世紀的能源戰略（2002 年第 1 期），中國多黨合作機製（2001 年第三期），縮小貧富差距的中共第六次會議（2003 年第 2 期），專營鎮廣東省的一

³ 阮輝貴，〈回顧中國研究雜誌〉，《中國研究期刊》，2000，期 3，頁 7。

個新現象（2003 年第 6 期），加入世貿後的中國經濟（2004 年第 1 期），中國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探討（2004 年第 3 期）。⁴上述有關中國政治經濟方面研究的課題名稱就已經足以說明，越南中國研究期刊十年以來的政治經濟研究主要立足於越南的國情，根據越南進行改革所需要的知識，去了解中國的政治經濟。顯而易見，這些課題的研究符合於越南當代發展的需求。

表一：中國研究期刊課題開展情況

單位：個

Year	Politics and economics	Foreign relations	History culture	Taiwan Hong Kong Macau
1995	11	11	15	6
1996	16	13	23	12
1997	18	7	25	12
1998	21	8	23	7
1999	18	9	19	5
2000	21	13	16	5
2001	19	14	18	6
2002	17	13	17	6
2003	19	9	15	6
2004	19	9	12	5
總計	179	106	183	70

資料來源：作者透過中國研究期刊整理與制表

⁴ 《中國研究期刊》，2000，期 3，頁 31。

在近十年研究中，屬於歷史文化方面的，主要集中在中國古代與現代文化有關因素，其中還包括少數研究中國與越南之間的歷史文化關係，也有從中國歷史文化方面可以汲取的教訓出發。這些課題諸如：清朝人才選拔與使用初探（1995 年第 2 期），辛亥革命與孫中山思想對潘倍州與越南 20 世紀初民族解放的影響（1995 年第 3 期），中國反迷信（1996 年第 1 期），中國現代化與文化開放（1996 年第 3 期），現代化中國與儒家文化（1997 年 11 期），漢字與中國文化（1997 年第 4 期），古代中國社會性質探討（1998 年第 6 期），現今新一代中國文學家（1998 年第 4 期），中國婚姻風俗探討（1999 年第 3 期），中國民主革命勝利 1921 到 1949（1999 年第五期），莊子人生哲學（2000 年第 2 期），孫子兵法與現代買賣（2000 年第 4 期），胡志明在中國的革命活動（2001 年第二期），魯迅文學著作里的辛亥革命（2001 年第四期），中國元宵節（2002 年第二期），孫中山三民主義與胡志明主席（2002 年第一期），墨子的政治思想（2003 年第三期），改革開放中國的社會科學（2003 年第 6 期），五四運動與中國文學改革（2004 年第 3 期），華人在東協中國關係（2004 年第 6 期）。

在港澳台研究方面，十年以來的越南中國研究者主要把著重點放在台灣經濟發展，這從台灣研究的篇幅可以看出。在研究者的預期中，理當台灣有很多經驗值得讓越南參考。如同中國研究帶有實用性一般，台灣的研究就有舉足輕重作用，僅台灣研究就占港澳台這一類三分之二的研究篇幅。研究課題包括台灣在經濟現代化工業化的經驗（1995 年第一期），台海兩岸經貿往來實狀與展望（1996 年第 2 期），台灣風俗習慣宗教信仰問題（1998 年第 6 期），台灣工業化時代的農業問題（2002 年第一期），等等。除此之外還有少量的篇幅研究香港以及澳門如美中關係中的香港問題（1997 年第 6 期），澳門特區基本法初探（1999 年第 6 期），大陸香港金融合作展望（2003 年第 4 期）。

在對外關係也是十年來越南的中國研究者主要關心之所在，越南學者探討了冷戰以來中國對外政策以及中國崛起，中國與其他國家的合作關係，中國和東北亞國家以及東南亞國家、歐盟、美國、非洲關係共 101 篇。這些課題包括諸如從知識產權保護協定看中美關係（1995 年第二期），中國東協關係發展（1996 年第 2 期），新時期的中俄關係（1997 年第 1 期），正常化以來越中貿易關係（1998 年第 6 期），東南亞經濟危機中國作用（1999 年第 6 期）。在 106 篇研究中國對外關係方面，越中關係計 35 篇，占 30%。透過這 35 篇越中關係的文章，以下進一步探討越南學者怎樣在後冷戰時期認識越中關係，從而論述中國。

貳、中國研究期刊越中關係研究學者論述

一、傳統學派——擺脫帝國主義的陰影？

越南中國研究學者多屬於傳統派，研究的背景都從過去歷史加以傳承。因為大部分都是歷史學家，他們一般都能從中共的世界觀來看中共與越南的外交政策。冷戰結束之後，美國、蘇俄與中國似乎都不再對越南懷有野心，越南首次能在建國以來擺脫以帝國主義作為參照點了解世界。為了解中國，接著成立中國研究院，嘗試不從抵抗帝國主義的角度，重新更全面的研究中國。回顧十年間論文可以看出，越中關係相關的論文中，越南學者對越中關係的認識是以馬克思理論為準，認為越中兩國有共同的政治經濟體制，兩個國家有利益互補關係，同時也有共同的挑戰。以下根據初步歸納，將從四個範疇中整理當代越南中國認識的文本。

（一）以兩國有共同政治經濟體制作為視角

所謂共同政治體制是指兩個國家都是社會主義國家，共同面對資本主義國家。在蘇聯瓦解，再加上古巴以及朝鮮都被經濟制裁的狀況下，越南以及中國可以做為兩個具有典範型的社會主義國家。兩個國家都堅

持共產黨領導的政策，宣佈朝共產主義方向發展，目前正處於社會主義過渡期間。中國走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越南走向社會主義定向的道路。「不過，相比之下，越南不管從土地還是人口來講只是中國邊陲的小國，在國內條件與國際位置有差別，因此，研究中國為了參考而不是採用跟中國相同方法」，⁵畢竟「中國在很多方面是巨人」。⁶

從這樣的一套想法著手，可以說越南的中國研究比過往帶有更廣的視野，一方面承認中國雖然與越南有相同的地方，不過它往往是「大國」，因此又跟邊陲的小國有不同位置。字裡行間的筆法透露出，在越南學者的想法裡，大國往往有大國才具備的風度氣派和行事法則。作為小國的越南在世界上不具備同樣重要位置，因此雖然有共同體制，但也並不全相同，所以不一定受到中國的特殊待遇，則研究中國固然為了學習，重在了解什麼對自己有利，而不是完全模仿。可見，表面上對中國的認知不再承受帝國入侵的陰影，代之而起的，卻是某種大國的影子。越南學者有意識地區隔劃分自己與大國的不同。即使有相同的體制，但學者則希望在相同之外，就越南自己的特點加以肯定。儘管對中國的評價是給予肯定，但倘若已經真正擺脫陰影，越南學者不會有產生明確的大小對比的意識。

所謂共同經濟制度，是指越中兩國從傳統計劃經濟發展模型邁向市場經濟模型，具體而言就是中國自 1978 年開始的經濟改革開放事業，以及越南自 1986 年開始的經濟「革新」（Doimoi 事業）。因為有共同經濟體制，而且面對全球化局勢，兩個國家都認為經濟發展非常重要。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兩國都要發展其內在的經濟成長力量，所以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因為共同的經濟體制形成彼此競爭，越南是在雙方貿易交換方面承受逆差的一造。

⁵ 阮輝貴，〈中國現代化幾個問題〉，《中國研究期刊》，1996，期 3，頁 19。

⁶ 河輝成，〈1991 年至今的中越關係經貿關係〉，《越南對外開放政策於中國越南關係》，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頁 143。

越南學者認為越中外交關係與經貿關係不相等同。「從 1991 年至今越中關係在經濟文化教育國防等方面進行全面合作，不過……兩國的政治外交關係僅起開通作用，想讓兩國關係進一步鞏固穩定應有經濟關係做為基礎。」⁷從越南學者對越中貿易關係的評價可以看出，在與「巨人」的利益交換上，越南仍尚未找出獲得自己對等利益的方式。因此產生疑問，為什麼有這種不平等狀態出現但越南仍然接受？於是認為，「如果在將來一段時間兩國經濟不進一步發展將會影響到政治關係或者說這種政治關係僅可以在表面上維持罷了。」⁸

學者指出，「從中國越南投資關係的兩個重要特點，或者準確的講中國向越南投資，可以提出一個評價，中國投資項目在數量與質量指標方面均與中國經濟規模互不相等，中國已經成為萬億美金俱樂部的成員，理應應該向同自己有很多共同點的邊陲國家投資，反而就向柬埔寨、緬甸等國投資，這些指標甚至超過中國在越南投資指標。」⁹又說，「近十年來中共對越南直接投資極為有限，發展援助相當少。」¹⁰加上「中國對越投資尚未投資在越南基礎設施或者工農業開發項目而這種投資在加工小產品只不過是對自己打開投資方出口之路。」總的來說，「中國對越南的發展援助還很少，不過，很珍貴並有價值因為中國雖然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但仍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而不是發達國家。」¹¹再加上「十年來越中貿易與投資已經有快速發展的步伐，滿足兩國人民特別是邊境人民的經濟與消費需求，不過，這種發展尚未配得

⁷ 杜進森，〈越中建交 50 週年之際有關越中關係的幾點思考〉，《中國研究期刊》，2000，期 3，頁 19。

⁸ 杜進森，〈越中建交 50 週年之際有關越中關係的幾點思考〉，《中國研究期刊》，2000，期 3，頁 19。

⁹ 阮明姁，〈近幾年來中越經貿關係的一些特點〉，《越南對外開放政策於中國越南關係》，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頁 172。

¹⁰ 河輝成，〈1991 年至今的中越關係經貿關係〉，《越南對外開放政策於中國越南關係》，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頁 143。

¹¹ 陳度，〈中國對越直接投資概況（1991 年 11 月-1997 年 7 月）〉，《中國研究期刊》，1997，期 5，頁 32。

上兩國的潛力，特別是中國那一方」¹²以及「至今中國在越南的直接投資資金在項目數量以及在投資總金額方面同中國在同一時間在柬埔寨一個小國面積為越南二分之一，人口為越南的十分之一以及同東南亞其他國家相比較處於極少狀態」。¹³因而有學者提出如此評價：「總而言之，越中貿易比重還很低，尚未體現出兩國的潛力所在，配不上兩國的政治關係」。¹⁴

在國際上的位置，越南應該是中國投資的理想之地，因為越南在東協的地理位置可以幫助中國去掌握整個東南亞的市場，並且成為中國出口產品到第三個國家的重要管道。不過，實際上卻又不為然。越南學者的這種質疑，是否對於看似不再的帝國主義陰影，仍然延續其中某種殘存的卑微意識，認為大國不重視自己，而且帶來負面影響，從而感覺中國對越南繼續在抑制。尤其是，大家所走的路以及所從事的社會主義導向的市場經濟過於相同，若外界大量投資在越南身上豈不傷害中國。可見，表面的邏輯是中國應同越南建立一個緊密的經貿關係，不過實際上從來不是這樣。不過，中國雖然只向越南投資一些對自己有利的產品，而且投資金額十分有限，越南學者也不否認中共對越南的援助是珍貴的。越南的學者在研究貿易關係過程當中，是否真正對中國已有固定看法，值得再思。

越南學者這種對中國的認識可以說正處在疑惑不解的狀態之下。一方面認為應該如何如何，但又認識到並不所以然。是否因為中國這樣一個「巨人」在自己身旁使得越南變得弱小，以致於不敢開口明說，這種不相稱的貿易關係完全體現一個「大國」抑制小國發展的結果。倘若據

¹² 河輝成，〈1991 年至今的中越關係經貿關係〉，《越南對外開放政策於中國越南關係》，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頁 142。

¹³ 武方（陳度），〈過去 10 年（1991 年到 2001 年）中國在越南直接投資情況回顧〉，《中國研究期刊》，2002，期 2，頁 33。

¹⁴ 范高風，〈1991 至今越中貿易關係〉，《中國研究期刊》，2000，期 1，頁 32。

學者的評價兩國真正的肩並肩發展，是否還有所謂「巨人」這種不見得正面的稱呼？故謂「政治關係與貿易關係不相等同」。

學者的研究是為國家政策制定機關提供具有科學論證的論據，因此當然盡量要表現客觀性，不任意批評，而且的確從冷戰以來兩國在政治方面已經做出不少努力，只是這種努力還尚未換來經濟上的有利回報。這是為什麼在越南學者的認識裡，越中關係似乎還存在著某種中國是巨人，以中國自己為中心，好像「朝貢文化」尚未消除。

（二）利益交換的視角

所謂的利益交換關係主要表現在政治與經濟兩方面。在政治方面上，「中國與越南位於一般地理區劃上的東亞區域，由於地理歷史背景越中文化有很多相同點」¹⁵而且，「目前都追求一個和平共同發展的東南亞，面對冷戰局勢尚未結束的東北亞，越中或許可以促成某種東亞連結，率先建立和平合作發展的東南亞。由越南在東北亞和東南亞之間扮演橋樑角色，將對越中兩國有很大的幫助。面對和平發展的東南亞，中國可以放心從而努力解決東北亞的冷戰局勢（包括台灣與朝鮮問題）。東亞的和平進一步有助於亞洲太平洋地區的和平穩定，乃成就了世界的和平穩定」¹⁶。「杜進森認為，越中友好關係將有利於兩國改革開放和革新事業，符合兩國民眾的願望和利益。更重要的是，越中關係發展有利於東盟與中國關係和東盟—中國自由貿易區的建設」¹⁷。以及「中國重視與周邊國家的關係是為了三個目標，即政治上的依托、經濟上的市場、安全上的屏障。而中國與越南在這三方面互為依托，不是單方面的」¹⁸。

¹⁵ 阮輝貴，〈越中關係的新春天〉，《中國研究期刊》，2000，期1，頁19。

¹⁶ 范元龍，〈從東亞合作視角看越中關係〉，《中國研究期刊》，2002，期1，頁31、32。

¹⁷ <http://big5.ce.cn/gate/big5/finance.ce.cn/macro/gdxw/200611/27/t200611279588187.shtml> 〈越南專家稱中越兩國應鼓勵民企開展大型項目合作〉，來源：中新社。

¹⁸ <http://www.tynews.com.cn/big5/site1/dibucontent/2005-08/22/content1225616.htm>，杜進森學者觀點，〈中越共建新經濟通道 17 億人口巨大市場浮出水面〉，《太原新聞網 2005-08-22 10:20》，來源：中國經營報。

可以說，中國是越南走向東北亞合作道路的橋樑，而越南則是中國走向東南亞合作道路的橋樑。這樣的視角顯現出越中關係帶有利益交換為視角，倘若越南與中國的關係沒有那樣親密就可想像東南亞與東北亞完全沒有這樣活躍的合作，因此，從利益交換視角出發越南有必要與中國共同建立這樣友好關係。這種越中親密關係由於歷史環境帶來「越中關係不僅給越南帶來利益而且同樣給中國帶來利益，過去越南朝鮮以及日本同中國文化有親密關係，不過在 20 世紀中葉，越南與中國在政治制度有所相同。越南對中國的了解遠遠超過其對東南亞各國的了解」。¹⁹

同時，透過學者肯定兩國近代化過程頗為相同，更加強化兩國為了共同的利益應該更加緊密合作的感覺。日本同朝鮮與越南之前都受到中國文化影響，不過在走進近代化的過程中，日本以及朝鮮所走的路卻與越南不一樣。儘管朝鮮之前的意識形態與政治制度與越南或中國接近，不過，南北韓的問題尚未解決，因此，朝鮮面臨的形勢同越南並不相同。越南與中國土地接壤，政治制度相同，再加上歷史上有很多接觸了解，所以越南同中國走的路更接近也是可以理解。中國比越南早開放 8 年，中國這 8 年當中所經歷的過程值得讓越南參考，使越南的發展規劃能更加深思熟慮，此何以越南學者認為，「中國在建立祖國強大同時得到成功或碰到失敗挫折將會讓越南汲取相當多的教訓，若不想說的是「滿多」教訓」。²⁰

這種學習經驗的態度，仍然是從越南的利益角度去論述中國，所產生的印象是，只要越南能與中國維持好關係，將與中國之間相互增多利益。根據范元龍學者的判斷，中國將是越南走進東北亞的橋樑，而且其間越南得到的利益居多。這樣的一個論述反映了某種平等交換的意識，在這樣一個交換關係中，越南可以同中國平起平坐，中國並不必然是上所論述的「巨人」。

¹⁹ 范元龍，〈從東亞合作視角看越中關係〉，《中國研究期刊》，2002，期 1，頁 31, 32。

²⁰ 范元龍，〈從東亞合作視角看越中關係〉，《中國研究期刊》，2002，期 1，頁 31, 32。

正因為如此，應該努力讓越中關係的開展讓兩國共同認可，而越中兩國在地理上的位置相鄰，自然就有助於兩國共同合作建立東亞和平，咸信一個和平的東亞對兩國有絕大的利益，這是因為雙方都認為自己處在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的位置，都需要和平環境發展，與穩定和平地區環境，以便集中精神發展經濟。「中國越南合作越順利越有利於越南的發展」，²¹且「越中親密關係將會是糾紛爭議解決的典範，讓東南亞各國每想到一個和平的強國中國就身感安心」。²²既然好好利用與中國的關係將會有利於她自己，那麼越南培養與中國的友誼將會有助於避免中國在東南亞形成「威脅」，杜進森教授便如此強調：「走進新世紀，雖然在世界上特別是在亞太地區將會有難以莫測的演變，但是「友誼，合作，發展」將會是兩國將來的主軸方針，其中「發展」是兩國共同追求的目標，「友誼」是基礎，「合作」是最佳的方法」。²³

上述學者的論述都是從利益交換視角去開拓與發展越中兩國關係，爾後更從一個利益交換的角度去認識中國。在這類學者的論述下，中國就好像另外一個不斷追求利益的實體，認為中國會在黃金時期去爭取自己的機會以肯定自己，倘若越南方面能善加掌握中國這樣的性質，便足以利用這一點來幫助自己發展。同樣因為越南學者是從利益交換角度觀察中國，反映出越南學者研究趨向高度的實用性，亦即越南必然能從中國汲取經驗教訓與交換好處。

（三）面對同樣的挑戰

由於越中雙方政治經濟的背景雷同，社會制度也雷同，特別是現在世界上只剩下四個社會主義國家，其中古巴和朝鮮仍處在被制裁狀況當中，越南和中國現在共同面對資本主義施行『和平演變』的大戰略，作

²¹ 范元龍，〈從東亞合作視角看越中關係〉，《中國研究期刊》，2002，期1，頁31，32。

²² 范元龍，〈從東亞合作視角看越中關係〉，《中國研究期刊》，2002，期1，頁31，32。

²³ 杜進森，〈自正常化1991年以來的越中關係與展望〉，《中國研究期刊》，2002，期5，頁41。

為資本主義的對象，兩個社會主義國家是遭遇了同樣的挑戰。學者阮貴輝提到：「在新的世紀我們兩個國家共同面對國際與區域背景，在許多方面有相當多的機會但也要面對相當多挑戰」。²⁴這個看法就得到紅河的呼應：「越南的革新與中國的改革開放為兩國關係提供強有利的發展空間。在國際政治演變十分複雜，兩個國家要共同面對新機遇新挑戰，不過，兩國將會努力爭取機會超過挑戰增強合作，共同發展」。²⁵學者杜進森也強調：「作為兩個社會主義國家，我們都有針對企圖消除世界上以及兩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力量進行反抗的同樣需求」。²⁶從這三學者的評價可以知道，他們將越中兩國劃分為一個陣線，兩國各有機會也各有挑戰。但這種將兩國歸屬於同類國家的視角，且制度與文化均如此相同，是否就表示雙方必然會謀求某方面的合作，以及兩國應該更親密地往來。難道因為共同面對新世紀地挑戰，因此學者們便會主張要暫時忘記過去那段不愉快的歷史衝突？具體而言，是否為了促進雙方著手合作，就應該完全忘記中國的大國主義，天朝心態，以及動輒懲罰周邊鄰國的歷史記錄？

在作為帝國主義的參照點消失以後，有多少越南學者真的已經坦然面對未來的越中關係？這種友好論述是形式上的，還是發自內心的，確實有待深思：

「在政治安全方面，我們兩國面對社會主義走向低落狀態，強權政治在國際關係裡暫時呈勝利趨勢，民族衝突，宗教與反恐戰爭正被利用做為違犯國際法律國家主權的有效工具，東亞地區正隱藏著隨時爆發破壞穩定的因素。」²⁷

²⁴ 阮貴輝教授，〈迎接新世紀的中越友誼關係〉，《中國研究期刊》，2002，第五期，第43頁。

²⁵ 紅河，〈越中關係十年回顧與展望〉，《中國研究期刊》，2001，期6，頁23。

²⁶ 杜進森，〈越中建交50週年之際有關中越關係的幾點思考〉，2000年《中國研究期刊》，期3，頁20。

²⁷ 阮貴輝教授，〈迎接新世紀的中越友誼關係〉，《中國研究期刊》，2002，期5，頁43。

在闡述越中關係時，越南學者習慣於採用「我們兩國」這樣的稱呼，這種親密的稱呼方式就等同於我將你當做親人一般，有意識地引導人回憶起當革命時代的毛主席和胡主席論述越中關係。這種稱呼顯示著，敘事者想跨過中間那一段不友好的所謂懲越戰爭的歷史，以利共同迎接新世紀的挑戰。中國這時不是「大國」，也不是「巨人」，而是站在自己身旁共同面對同一個未來，只是相對而言比越南更強大且已經有型的政治實體，恐怕也因此比越南面臨更複雜的問題。這樣的看法下，中國成為革新時代的越南值得信賴的可靠國家。就像之前革命時代，也是共同面對帝國主義侵略，感到中國與越南特別親密，在新時代則同樣面對改革的挑戰。過去的親密引發今天的想像，今人便想追求像從前那樣親密。至於中間的那段經歷不愉快的時間，自就應該加以超越，或不提，或提出但只有稍微簡單講幾句即可，或就算明確提出，但只不過為了強調不正常的缺點，以便突出正常關係的好處。就像學者德明指出那樣：「越中之間在歷史上短時間內發生不正常關係，不僅對兩國有壞影響而且對整個東南亞地區也有不好影響。」²⁸以及潘如剛學者亦這樣論述：「我們國家在 1950 年代的戰勝和抗法抗美戰爭以及北部經濟恢復與建設過程中均受到中共以及中國政府，人民的珍貴的幫助，越南人民往往以知恩的心態牢記這樣一個支持，在中國方面很多領導在發表時曾經指出幫助以及支持越南不僅是因為出發於國際情誼而且還是因為中國在北方的領土安全。提起這些事情以便可以看到包圍中越關係在剛剛過去的那一段時間的陰雲已經消失，同時這樣的陰雲只是中越關係歷史長河中的暫時現象」²⁹。

不過這樣的認定所忽略的是，中國本身既然就是一個強大的勢力，會不會隨時就可以恢復以大國主義的心態對待自己？以回憶友好歷史

²⁸ 德明，〈正常化以來的越中關係回顧〉，《中國研究期刊》，1998，期 1，頁 30。

²⁹ 潘如剛，〈中國學研究以及鞏固發展中越友誼關係〉，《中國研究期刊》，1995，期 1，頁 13。

來跨過不友好歷史，再掀起今日「我們兩國」的友好來展望，應該說是迴避中有隱藏，雖然看出在政治上面對然帝國主義的壓力或抗拒已經完全消失，但某種陰影還殘留。在外交形式上，越南的中國研究可以說是擺脫帝國主義陰影的政治環境中進行，不過字裡行間的論述就並非全然如此。從「大國」與「巨人」的論述，到共同站在一起的面對同樣一個挑戰的「友誼朋友」，越南學者通過強調「友好」迴避懲越戰爭歷史，剛剛好說明還沒有找到一個可以處理懲越戰爭的角度，因此儘管越南學者企圖將越中關係提高到一個全新的發展階段，但這種不處理的態度反而間接表露出其對中共的陰影尚未消失。

（四）擺脫帝國主義陰影？

威信中國對越的外交政策出自利己主義的自我中心，這可以從越中貿易關係就明顯看出。值得探討的是，在越南學者的論述裡，越中關係似乎呈現出政治外交關係與經貿關係的不相等，其中外交關係比經貿關係更好。可能為了維護這樣的氣氛，每當在回顧之前的歷史時，各個學者都有迴避不友好的部份，直接回溯到雙方關係融洽密切的革命時期，而不願提起七零年代以降，以迄中國發動所謂懲越戰爭的那一段衝突，就好像因此可以期盼兩國將來的美好關係，能奠基在適當的歷史記憶中。

長榴在如此說：「我們高興的看到越中友誼與越中合作關係正處在一個新的美好之路，一個新的將來之門正為兩國走近 21 世紀打開。」³⁰再聽阮貴輝這樣的評價：

「越中關係一千年以來可以用『三同』這兩個字來概括，『同文』是說兩個國家共同所有東亞文化，『同種』是說越南的 55 個民族跟中國的 56 個民族，有很多血統相似的民族，其中有一部分民

³⁰ 長榴，〈越中友誼合作關係的新展望〉，《中國研究期刊》，1997，期 4，頁 27。

族生活在兩國邊界之地……；『同志』就是兩國關係在反抗帝國殖民主義的統治下已經得以加強，兩黨的誕生共同爭取國家獨立，民主與社會主義，這個勝利使得越南民主共和國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與兩國建交……從此，兩國的關係不僅是同文，同種而且還是同志。」³¹

他進一步希望未來能看到，「跟隨著越中邊境國際鐵路的開通，越中兩國的友好往來在各個方面將向兩國人民的友誼，本地區與世界和平穩定方向發展。」³²這樣的期盼受到長榴的呼應：「越中關係的歷史與每世紀轉換有緊密聯繫。我們希望越中關係在新時代裡不僅走向新時代而且還走上新世紀。」³³同樣地，范元龍學者更加強調越中關係對東亞地區有重要位置，這種關係將會在睦鄰友好，全面合作，長期穩定，面向未來「16個金字方針的框架內施行」。³⁴

然而，越中之間舊有衝突如此激烈，是否這種對越中關係充滿希望的表達方式，真的就能讓越南與過去那一段不愉快的歷史切割，甚至說完全忘記它，還有賴觀察。但就當前而言，充其量只能說是表現成忘記，實際上帝國主義的陰影揮之不去。記得兩國從最初成立國家並建交時，不是已如上述成為同志了嗎？但是曾經是兄弟的兩國後來卻突然變成敵人，如今再度又變成朋友，如何保證不會有朝一日變回敵人？難道1979年那一段歷史已經完全被遺忘？從中國研究學者對越中戰爭雖有提過，但不研究，不整理，不評價的迴避之中，透露出的反而恰恰是沒有忘記。

除了中國之外，還有美國。在越南的角度裡，從時間上來看，美國是介於法國與中國之間侵略越南的帝國主義。冷戰結束後，相較於中國

³¹ 阮輝貴，〈越中關係的新春天〉，《中國研究期刊》，2000，期1，頁18。

³² 阮輝貴教授，〈中國1995年〉，《中國研究期刊》，1996，期1，頁13。

³³ 長榴，〈越中友好關係向新高層發展〉，《中國研究期刊》，1999，期2，頁29。

³⁴ 范元龍，〈從東亞合作視角看越中關係〉，《中國研究期刊》，2002，期1，頁33。

的學界為了要阻止美國單極主宰國際關係，鼓吹施行多邊化，提倡一超多強的格局，越南則毫無要面對這樣的帝國主義。不過，在中美爭霸的陰影之下，越南學者還沒有立即面對帝國主義的急迫性。

二、越南中國研究學者的知識脈絡

越南知識界對中國的研究與學者受到養成的教育環境息息相關。參加越南當代中國研究的隊伍踴躍，大部分中國研究院的學者均受到高等教育培訓。從 1993 年至 2003 年，中國研究院的學者共 56 名，其中 70 年代前後出生的年輕研究學者共 30 名。老一輩的研究學者的豐富研究經驗與年輕一輩的研究學者的活躍，共同給予越南中國研究院新的研究活力。老一輩的研究學者大部分在國內就讀，有一部分資深輩學者如上述所說曾經赴蘇聯與中國就讀大學，不過，他們大部分年事已長。中年學者因為徵越戰爭連帶十一年的影響，因此出現斷層，這一代中年學者人數顯然較少，倘若這類學者在當時繼續從事同中國有關的研究，也是在與中國隔絕的環境下進行的，因此，這一類學者大部分是由越南國內培養的。年輕學者成長於越南已經進行革新事業之後，這時越南與各國已經發展較好的外交關係，因此他們獲得受到良好教育的環境，均有條件去台灣以及中國大陸進行短期或長期研習。中國研究院同時薈萃這三類學者，而這三類學者所受到的教育與他們所研究課題影響息息相關。

（一）非歐美中心非中國中心的實用性中國研究

在一般主流的英語中國學研究中，凸顯出的是歐美中心的知識與中國中心的知識。其中，歐美中心的知識論強調研究者的問題意識來自歐美研究社群所屬的歷史脈絡，亦即根據歐美知識界就歐美社會性質得出的相關研究，作為研究中國社會基點，據以觀察中國社會與歐美社會的距離。相對於此，中國中心的知識強調問題意識是來自於具有中國身分的行為者。不過上述越南學者所從出的問題意識，顯然完全既非中國中

心，又非歐美中心。相對的，透過學者在越中關係研究議程上所呈現的中國，看出當代越南中國研究的基礎命題，是越南與中國分享了同一條從近代開始的革命道路，並且當前面臨類似的發展需要與發展條件，與其他中國研究社群不相同的是，研究者與研究對象身處於同一個制度環境，對該環境有更多同情的理解，既不是從外好奇的窺探，也不是採取對異己的排斥，更不是盲目的維護。再加上，歷史上兩國曾親密相互扶持，格外能幫助越南中國研究者體會了解中國的處境與想法。這種越南學者的問題意識無非來自於學者本身所從出的歷史文化脈絡，也可以說是某種越南中心的研究議程，可見並非是歐美國家學者才能發展出以自己為中心的研究議程，但也說明歐美中心下中國研究的片面性。越南學者的越南中心研究議程在很大程度上反映越南研究社群屬於以自己作為中心去看自己與中國的距離，自己還離中國多遠並應該採取哪種方法趕上中國從而超越中國。學者從這樣的越南中心去看中國以及決定中國與自己的差別。這種越南中心的中國研究將會使得中國研究社群學者有一個以自己為中心去觀察中國，然而自己所處的中心又與中國有許多相同點，可稱是從越南中心中的中心。第一個中心是越南研究社群所處的位置，然而第二個中心就是中國。這時候越南與中國又有主觀成分也有客觀成分，主觀是因為越南從裡面看到自己並客觀地往外面看中國。

同樣的道理，即使嘗試採取中國中心的研究者，在沒有身處於類似的制度環境之下開展研究的話，所看到的政治體制與曾經有相似經歷的越南學者相比，勢必不同，越南學者的改革傾向與對既有體制帶來的牽制，必然掌握的更加細膩。越南學者是透過自己改革與發展的需要研究中國，沒有崇高的評價標準，雖然不能避免有主觀的問題意識，然而因為與中國環境相同，這樣的主觀不但不會脫離中國的實際，反而有助於體會中國的實際，體現出「我同你很像但並不全部一樣」的知識位置。越南學者比較有能力將自己擺在研究對象的體制底下去認識中國，其目的是反思並且為越南提出中國的優缺點，與自己相同與不同的地方，哪

一點值得學習或應該迴避。從實踐出發的越南中國研究因而與其他國家的中國研究不同。

同時越南的中國研究亦有由外而內觀察的性質，因為其中國學知識均嘗試先從中國各方面去論述中國而後方引進越南來做對照，因而給越南一個外在於中國的客觀了解之後與自己相做比較，並且找出自己與之的相同點或者不同點，與好處與壞處。

（二）中國研究採取客觀態度的意義

資深與年輕一代學者有一個共同點，是他們大部分從傳統研究途徑去分析中國，這當然與他們的專業以及所受到的教育相關，他們之中大部分學者都從歷史，法律等專業中成長，而且他們的分析都不從西方理論出發，而是從事情發展的過程中追蹤描述。從像阮輝貴、紅河、長榴，范元龍這一輩學者的論述風格中，就可以讀出他們來自於同樣一個研究傳統——重視資料、寫作細膩、不帶情緒。他們從一個現代學者的身分去回溯越中關係，好像是把越中關係作為一個可以切斷分開的歷史階段，研究者儼然是站在這段歷史的外面看歷史，似乎所研究的是某種不受時空影響的客觀歷史過程。

這樣一種不帶情緒的客觀分析姿態，不但有助於將歷史上的友好關係當成客觀的模式，以利於今人來遵循，同樣有助於將歷史上不友好的一段，當成是外於自己的歷史階段，則是否研究或如何研究，變成是一個研究旨趣的個人問題，或研究設計或的技術性問題，而不是關乎當代越中相互關係的身分問題。

參、研究知識與越南決策

面對中國這麼大的國家，與自己的體制又十分相像，越南政府成立中國研究院研究有關中國在各方面的知識。該研究院的研究知識到底會不會影響到越南政府對內調整以及對中共的決策？

越南對中國的研究除了是為了解中共以及向中共的優缺點學習之外，同時必須了解中共的外交行為以及對越南的決策，並進一步確定與中共的關係。這在冷戰結束之後更形重要，就在越南中國研究院擺脫帝國主義的陰影去認識中國之際，卻適逢中國崛起於國際舞台成為強國。由於兩國關係日益增強，「從 1991 年到 2000 年越中政治關係推到最高潮高層領導人一共互訪 11 次」，³⁵「1996 年雙方互訪代表團共 100 個，其中副部長以上代表團共 60 個」。³⁶

實踐中，兩個國家的高層互訪已經同學者研究產生互補作用。在上述所提到的研究，顯然同時反映了越南與同中共互訪增強兩國友誼的發展，與其間繼續夾雜稱呼中國為「大國」或「巨人」的潛在保留態度，經常或多或少是在支持政府應該致力與中共發展關係。而且在每次訪問當中，越南領導人都強調要如何將兩國經濟關係推到新的發展階段，如 1997 年杜梅總書記訪問中共時曾經提出：「雖然越中友誼關係以及在許多方面合作關係已經有積極的轉變，不過，經濟貿易以及投資方面尚未跟上政治關係。」³⁷再者，同江澤民總書記談話時他表示：「希望兩黨兩國促進在經貿科技合作以便符合於兩國友誼關係」，同李鵬總理會見時，杜梅表示：「建議中國加強投資改造之前中國已經幫越南建設的工程，

³⁵ 引用古小松〈廣西經濟發展與中越關係〉，《越南對外開放政策於中國越南關係》，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頁 220。

³⁶ 李家中，〈回顧思考展望〉，《中國研究期刊》，1997，期 1，頁 3。

³⁷ 引用杜梅總書記會見橋石同志時所發表的意見，1997 年 7 月 20 號人民報。

加強各省的經貿合作特別在中共有優勢的日用品以及農副產品。」³⁸1999年越南總書記黎可飄前往中共進行訪問時表示：「經歷過 10 年正常化關係，我想兩國應該共同討論將來全面合作關係的框架，趁著訪問中國之際我想了解並向中共學習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國家過程中所有的教訓和經驗」，³⁹又鼓吹「1998 年 10 月越南與中國領導共同表示決心將越中正式貿易總金額提高到二十億美元」。⁴⁰

越南政府高層領導所發言的基調，與學者寫作時的內容相一致，這兩位政府高層領導在會見中共高層領導時的發言，都坦然承認越中關係以及越中貿易所存在的一些問題。另一方面，學者從前述的三個層面去認識越中關係，鼓勵增進彼此走在共同道路上的互補性，也在中共與越共合辦的很多會議獲得反映。之前引述學者對越中關係具有制度、利益、挑戰的這三個共同點，正足以促進越中的關係，事實上，「中共以及越共在 2003 年已經在北京舉辦「社會主義中國以及越南的經驗」進而 2004 年在河內將會舉辦「建黨的理論」」。⁴¹

從中國研究與政府決策的高度重疊可以看出，研究者對政府決策的支持與配合。中國研究員擔負起對中共全面研究的責任，有助於越南政府推動與中國的合作關係。因此由越南政府在社會科學院成立的中國研究所，其研究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服務於政府與政策。

四、結論

面對正在崛起中的中國，又作為鄰邦國家，中國的崛起當然會提供越南加入世界經貿活動某些參考。中國研究院十年的研究期刊已經生產

³⁸ 長榴，〈越中友誼關係的新展望〉，《中國研究期刊》，1997，期 4，頁 25。

³⁹ 《人民報》，1999 年 2 月 25 號。

⁴⁰ 范高風，〈1991 年以來越中貿易關係〉，《中國研究期刊》，2000，期 1，頁 30。

⁴¹ 阮輝貴，〈中國 2003 年〉，《中國研究期刊》，2004，期 1，頁 20。

了數量豐富的研究，提供給越南讀者一個從中國了解自己的工具。研究期刊在政治經濟、歷史文化、及對外關係和港澳台等方面進行多方面研究。擺脫了抵抗帝國主義的參照點之後，編寫越中關係的學者已經改以制度、利益與挑戰這三個層面，透過研究越中關係重新認識中國。不過，帝國主義雖然不再，在越南學者的看法和思想裡，中國作為一個大國的陰影仍然揮之不去。然而，21 世紀的越南中國學對於越南該如何面對這樣一個大國陰影，猶未有定論。在大國的陰影之下，學者體會到越南與中共有共同的挑戰，不過，兩國又互相有競爭，共同點同時亦成為競爭點。

無論如何，這樣的的研究旨趣既非歐洲中心，又非中國中心，是為越南而研究，並帶有明顯的實用性，而這種實用性的中國研究恰好體現出越南中國研究社群的研究特質。共同的經濟社會體制有助於越南學者去迅速貼近中國的實際情況。越南社科院的中國學不是出自追求普遍法則的抽象理論興趣，或學者個人安身立命的知識使命，或意識形態主導的對抗或臣服，而是為了促成越南的發展的實用性研究。中國研究院的研究與越南政府的決策互補，研究者配合政府的政策，而政府成立該機構的目的，正是要藉由研究來強化政府決策。

參考書目

人民報，1999 年 2 月 25 號。

引用杜梅總書記會見橋石同志時所發表的意見，1997 年 7 月 20 號人民報。

古小松，〈廣西經濟發展與越中關係〉，《越南對外開放政策於中國越南關係》，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第 220 頁。

李家中，〈回顧思考展望〉，1997，《中國研究期刊》，第一期，第 3 頁。

杜進森，〈越中建交 50 週年之際有關越中關係的几點思考〉，2000，《中國研究期刊》第三期，19-20 頁。

杜進森，〈自正常化 1991 年以來的越中關係與展望〉，2002，《中國研究期刊》第五期，第 41 頁。

河輝成，〈1991 年至今的中越關係經貿關係〉，《越南對外開放政策於中國越南關係》，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第 142 頁。

武方（陳度），〈過去 10 年（1991 年到 2001 年）中國在越南直接投資情況回顧〉，2002，《中國研究期刊》第二期，第 33 頁。

阮明姮，〈近幾年來越中經貿關係的一些特點〉，《越南對外開放政策於中國越南關係》，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第 172 頁。

阮輝貴，〈中國現代化几个問題〉，1996，《中國研究期刊》，第三期，19 頁。

阮輝貴，〈中國 1995 年〉，1996，《中國研究期刊》，第一期，第 13 頁。

阮輝貴，〈回顧中國研究雜誌〉，2000，《中國研究期刊》，第三期，第 7 頁。

阮輝貴，〈越中關係的新春天〉，2000，《中國研究期刊》，第一期，18-19 頁。

阮輝貴，〈迎接新世紀的越中友誼關係〉，2002，《中國研究期刊》，第五期，第 43 頁。

阮輝貴，〈中國 2003 年〉，2004，《中國研究期刊》，第一期，第 20 頁。

河輝成，〈1991 年至今的越中關係經貿關係〉，《越南對外開放政策於中國越南關係》，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第 143 頁。

長榴，〈越中友誼合作關係的新展望〉，1997，《中國研究期刊》，第四期，25、27 頁。

長榴，〈越中友好關係向新高層發展〉，1999，《中國研究期刊》，第二期，第 29 頁。

紅河，〈越中關係十年回顧與展望〉，2001，《中國研究期刊》，第六期，第 23 頁。

范元龍，〈從東亞合作視角看越中關係〉，2002，《中國研究期刊》，第一期，31-33 頁。

范高風，〈1991 至今越中貿易關係〉，2000，《中國研究期刊》，第一期，30、32 頁。

陳度，〈中國對越直接投資概況(1991 年 11 月-1997 年 7 月)〉，1997，《中國研究期刊》，第五期，第 32。

德明，〈正常化以來的越中關係回顧〉，1998，《中國研究期刊》，第一期，第 30 頁。

鄭在浩，2006 年 12 月 19 日，韓國的中國研究研討會，國立中山大學。

The Shadow of Empire: A Note on the Vietnam-China Relations in the *Journal of China Studies*

Hoai-Thu Nguyen

Abstract

This document will give us a simple look about the *Journal of China Studies* of Vietnam China studies center from 1995 to 2004. The *Journal of China Studies* is published under permit of Ministry of Culture and Information and resolution approved on 1995 by the president of the National Centre for Social Sciences and the Humanities. The review is about four main fields: China economics and politics, China foreign relations, China history-culture and Taiwan- Hong Kong-Macau .This paper mainly is a note on the Vietnam-China Relations which is a main part in China foreign relations field in Vietnam *Journal of China Studies*. The document will point out two things: one is

in the new era with the establish of Vietnam China studies center (1993) and when no Empire regards as a reference, how do Vietnam Sinologist think about Vietnam-China Relations, and again think about China. What are the perceptions of them in the *Journal of China Studies* in ten years (1995 to 2004)? The second thing is about the role of researchers, analyzing are there any influences between the knowledge of China and the perception of Vietnam government about China through the backward looking of Vietnam-China Relations of researchers in the *Journal of China Studies*.

Keywords: the shadow, reference, China, Vietnam scholar, giant, challenge, interest, similar

國家發展研究 第七卷第二期
2008 年 6 月 頁 119-142

從殖民地看向東亞： 留日學生蔡培火的身分意識

顏欣怡^{*}

收稿日期：2007 年 5 月 30 日

接受日期：2007 年 12 月 15 日

^{*} 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通訊處：台北縣汐止市忠三街 120 巷 83 號 1 樓；
電話：0952-852611；E-mail: ce0129649@gmail.com.

摘要

本文的主旨，是透過閱讀蔡培火，試圖去了解日治時代台灣人的身份意識。從蔡培火的文字中我們可以知道，身份認同的論述是可以超越國家與民族的窠臼。蔡培火從王道樂土的概念出發，指出當時日人治台之不合理性，而從台灣議會設置運動等等的政治參與的過程中，他同時也了解到台灣的主體意識之崛起；雖然運動的結果是失敗的，但對於民智之開化卻有不可抹滅之作用。而蔡培火不只是作為一個島內人，同時也作為一個留日學生，他在日留學期間，接觸到了王道樂土的思想。對於蔡培火來說，那正是解決日本人與台灣人身份認同的出路，直接跳過低層次的論述，從「東亞」，不僅可以解決日本本國與台灣島的緊張對峙關係，更可以成為東亞和平的橋樑。

關鍵詞：王道樂土、蔡培火、東亞、台灣意識

壹、前言

在日本大正時期的台灣，台灣人身處被殖民的時空，不得不接受日本教育，因而在固有文化之上，由官方建置了一層更高尚或更有收編能力的思想體制。不過，固有文化所提供的身份意識或身份資源都具有潛在的抗拒力。同時，進入帝國體制意味著，台灣將成為帝國內部批判力量潛在的結盟或動員對象。故在檢視台灣人夾在政治與血緣之間的雙重身份時，採用日本流行的論述策略，結識日本的批判作家，利用他們的方法把中國固有文化的身份依據重現，成為合情合理的現象。相對於此，在重現的過程中，將固有文化的身份資源整合在日本身份之中，擷取日本知識界面對中國的各種主張，綜合運用，區隔台灣與中國，就形成了一連串足以啟發後世的身份策略嘗試。

本篇想要通過重讀留日的台灣青年蔡培火，以使今人去體會台灣人是否真的能透過日本人傳給台灣人的角度，開啟通往西方知識的大門，並將有關民族的知識介紹到台灣，如此藉由到日留學所受到的影響，導致台灣面對亞洲甚至是世界歷史的遽變時，是用一種非西方也非東方的視野來對位自身的處境。

貳、蔡培火其人

台灣自一九一〇年代以後留學日學生人數遽增，¹這些留日學生後來便逐漸成為台灣社會領導階層的主力，也嚮往民主。蔡培火，便是其中一位，他出生於沒落的氏族家庭，由母親扶養長大，到日本的之後接受日本的師範教育，在三十二歲時受到植村正久牧師的感召，信仰了基督

¹ 吳文星，1992，《日據時期台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台北：正中，頁120。

教。在信仰方面，他認為日本既然是當時的強國，台灣單依靠人力必然無法抵抗日本政府，是故，接受了植村正久牧師的說法，認為信仰基督教將來成有神之力可以相助。

蔡培火一生當中有兩個重要的運動，一為台灣議會設置運動，一為台灣羅馬字運動，在前者無法受到日本官方的重視的情況，蔡培火更致力於推動羅馬字運動，將主力放置於文化層面的轉化，但是這個運動並沒有被當時的士紳接受，甚至引起中國知識分子的疑慮，也就草草落幕了。自從一九二九年他便在自己的日記當中寫下要努力致力於羅馬字運動，一九三一年他又積極設置講習會等，讓台灣人民來學習，相較於一九一九年中國推行的羅馬字運動，蔡培火希望能夠在純日本語言以及純中國文字中，尋求出一種有別兩者但是能夠代表台灣人民的語言文字，語言文字可以決定民族歷史記憶的塑造，歷史記憶也是民族性格素行的基石，從蔡培火推動羅馬字運動可以看出他接受多元共存的想法，既不追隨那遠去的祖國白話文學，但也不願意此島上的人民遺忘自己固有的傳統。是故，他放棄了自己認為較難推動的國字的拼音法，而去推動與以往不同但應該是學習簡易的文字拼音方法，試圖保留與日本統治者不同的文化型態，目的並非反抗或是反對日本，而是在日本之內爭取台灣的權利，凸顯台灣人民與日本的差異。在他的日記當中寫道：「咱者緊緊來學羅馬字……若是按呢，台灣就會向上，台灣就會換新，台灣就會活起來」。²

² 張漢裕編，2000，《蔡培火全集》，台北：吳三連基金會，第五冊，頁199。

參、兩個運動的啟發

一、台灣議會設置運動

台灣議會設置運動除了為島內爭取發言的空間，蔡培火也希望能夠藉由重建溝通的管道，使得台灣能夠有日本帝國一員的地位，而不再是日本殖民地。蔡培火心目中的台灣的民眾運動不等於民族運動，因為東亞本身是同源的民族，不需要去區分民族的不同，但是個別的差異性仍需要藉由自然的同化消除衝突。

議會設置運動並非單純的民族運動，是基於自治主義的基礎，但是就連日本母國都尚未達到民權自由的情況，蔡培火認為台灣可以保留自治，但是議會仍然是需要建立，以維持日本和台灣本土對話的機構。正因為缺乏溝通的管道，所以島內的衝突才會不斷升高，蔡培火本人也曾因為治警事件入獄，但是他並不認為這是日本帝國的暴政，反而歸咎到領台日人的官僚主義所致。在東京的學生運動以及後來的台灣議會設置運動，都是希望能夠將台灣的民情直接呈現到日本的政界面前。

嗚呼！台灣長久以來，已經被一派人物所壟斷……台灣似非日本全體的台灣，似屬某一黨派的專有……無論如何須先擺脫此輩的獨占，使台灣與日本全體總體有所交涉……我們多年來，在母國東京開始運動，儘量使台灣的實情暴露於中央政界。³

在母國的立憲基礎當中，台灣的立法基礎是特殊立法⁴，但是這種特殊立法權落入台灣總督的手中，任其專制行使，是有違憲法精神，且無

³ 文中「一派人物」與同文後所寫的「彼等時常只將生番啦瘡疾拉介紹於本國，一直宣傳彼等困苦地與瘴煙蠻雨再戰鬥，炫耀自己功績，二則加強本國民對台灣的恐怖念頭，使其不關心台灣」，由此可見，蔡培火實指領台的日級官僚。引自張漢裕編，2000，《蔡培火全集》，台北：吳三連基金會，第三冊，頁142。

⁴ 此處指得是「六三法」，「六三法」為一八九五年，台灣總督府實行軍政，以武力制壓領台初期的武力反抗。次年三月，結束軍政，頒布「法律第六十三號」（簡稱六三法），採用委任立法制度，授權台灣總督具有頒布法律效益之命令，使台

視人民權利的官僚作風。唯有設置議會才能保證台灣人民的生存自由，並且將律法的設置權力重置台灣人民手中。

蔡培火堅信，台灣的特殊性必須被確立，但島內在此也有不同的意見，比如，與其設置台灣議會，不如直接要求中央參政權，而且此更符合合同主義的宗旨。但是蔡培火卻持反對的意見，原因有二：一為語言不同，生活方式不同等等；第二個理由是因為實行上有困難。在日本帝國當中的議會有殖民地的議員代表，等於是直接挑戰著日本的憲法，實行方法或是對於日本統治權威的衝擊更大，如果主張統治台灣不需要台灣總督，這會招致領台日人的強烈反對。台灣的自治是要等到台灣議會不再依附日本議會為止。

推動議會設置運動有一個重要的目的，證明同化政策⁵不是壓榨台灣人民的政策，但是在台灣的官僚手中卻將其實踐成為壓榨台灣人民的策略。蔡培火認為台灣即使是設置台灣議會也是根據自治主義，因為「六三法」對於台灣人民不公平；且自治主義的意義是「在日本主權之下，

灣被摒除在日本憲法保障之外。引用自黃秀政等人合著，2002，《台灣史》，台北：五南，頁116。

⁵ 蔡培火的同化主義有兩種，一為自然同化，一為人為同化。他認為自然的同化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有如公式變化的過程，這是物理界的變化；還有心理上的同化，這種耳濡目染的過程也是屬於自然的同化。而人為同化之起源是由於一國因領土狹小，不足以供其國人民之需時，不得已著眼其他之國土，將其他國家的土地據為己有，新君王為了求境內之一統，對於新住民所採取的政策，這就是同化政策之最善良之起源，也是人為同化之緣由。蔡培火認為，人為同化是困難的，因為人為同化必須建立在雙方心甘情願的感情基礎上；再者是因為不同民族原本就是因為生活習慣等等的不同而造成不同的民族性格；最後則是，蔡培火認為，人是理性的動物，無法突然從某一民族轉變成另一民族。但是蔡培火並沒有因此就否定人為同化的存在，他認為只要加上某些條件就可以讓同化策略推行，第一，就是其新領土與舊母國相隔離。第二，是需要尊重新領地原本的善良文化。第三，主張新舊領土雖然有不同的精神文化，但是這兩種精神文化必須將其視做是可以相互提攜的平等文明。第四則是，認為同化政策不能當作主要的統治政策，即不明說，但是可以強調新國民與舊國民的差異，如此，新國民就會體會到兩者之間的差別，而主動的去異求同。總而言之，一種以舊國民為中心的人為同化主義是不可能發生的，人為同化要發生是有其條件以及且有許多困難要去克服。只有將人為的同化主義放在順應自然的環境之下，才能夠產生同化應有的意義。

實行台灣自治」⁶。而台灣議會的設置意義是依據自治主義，但是因為日本的本土政治尚未達到真正的民權自由，蔡培火認為，台灣真正的實行自治一事可以保留，但求台灣議會的急速建立。對於領台日人等八萬餘人之不信任，造成了台灣人民與日本國民的對話的心理障礙。不過蔡培火認為台灣人民不信任的只有領台日人，對於日本本土的國民仍持有信心。蔡培火認為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目的，是要努力在台灣以及日本本土政界建立對話橋樑，不要讓官僚的領台日人造成雙方的誤解。

請願動運在台灣近代史上具有其歷史意義，這除了是非武裝抗日的運動的之外，在蔡培火的想法中則認為，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不但代表著台灣人民具有思想上獨立性，且對抗的並非是日本帝國的統治地位，而是權威的「在台內地人」。

我們的國是立憲開明的國，立憲國民……是沒有絲毫的權威可使、像在臺內地人諸君既往的行動、老實是令人傷心、似此撤了立憲國民的體面……⁷

二、羅馬字運動

羅馬字運動衝擊到日本的教育政策，對於蔡培火或是台灣人民而言，日本的國語政策等同於將台灣民眾放置於殖民主義的地位，因為台灣的人民不可以使用漢語以及台語。對於日本人，使用中文等同於台灣仍是中國的領地，人民仍是中國人，但是對於台灣人而言，使用漢字是因為漢字是自己的文化傳統，對於中國有著文化的情感，但是對於清朝則未必有政治的忠誠。

在日本，是直到十九世紀中葉，殖民主義才被適用到日本的身上，日本十分缺乏統治本州以外的統治經驗，就連北海道也是直到一八八三年才成為日本國土的一部份，而當一八九五年台灣被割讓給日本的時

⁶ 張漢裕編，2000，《蔡培火全集》，台北：吳三連基金會，第三冊，頁147。

⁷ 參見蔡培火，〈我望內臺人反省〉，《台灣民報》，第八十六期。

候，日本的殖民統治經驗也是採取自國外留學生的經驗，如國內留學經濟學家福澤諭吉的影響。日本各界似乎認為一切都要學習國外，甚至，若不能像歐洲國家一樣擁有殖民地，感覺日本就無法成為先進國家。

蔡培火同意日本統治台灣的成果是十分值得重視的。在台灣有效率的統治，使得日本在面對處理殖民地經濟社會政治公共衛生方面，都有了初步的良好的對策，不但使得日本成為殖民者，更可以使日本列入帝國主義國家之林，再加上接下來打敗了俄國，更使得日本成為當時世界強國之一，日本的殖民主義自此轉向。⁸台灣的總督從武官總督轉到文官總督，再轉到武官總督，第二次的轉變時機是在滿洲事變以後，因為台灣被視為是前進南洋的跳板。

國語教育的實行被視為是軍國主義以及民粹主義的實現，蔡培火認為錯誤的國語政策是同化主義的遺毒。經過了三十年的統治，台灣人民從中學到的教訓就是不能相信台灣官僚的教育制度，因為都只是愚民教育。台灣總督府對於台灣的人民的殖民地教育，一方面繼承後藤新平的無差別政策，一方面又對台灣人民實行差別化教育，尤其是台灣的高等教育中台灣人人數偏少。蔡培火自日本受教育之後，深感台灣人受教權遭到限制。雖然到了文官總督時期，開始施行內地延長主義，但是蔡培火認為這只是同化主義的換湯不換藥，「其精神基礎，歸根是五十步與百步之差」⁹

蔡培火在自己受教育時便深感日本的教育對於台灣有著不公平的待遇，而原本使用的漢字為文言文，艱深難懂，為了普及白話文字，使一般民眾可以識字，加上接觸了基督教的羅馬白話字，蔡培火花了三

⁸ Yosaburo Takekoshi, 1907, "Japanese rule in Formosa", New York, London, Bombay and Calcutta, Longmans, Green, and co., p.83-84

⁹ 張漢裕編，2000，《蔡培火全集》，台北：吳三連基金會，第三冊，頁 143。

便有學日文基本能力，他認為此一方法簡單易學，便自創了以日本假名拼寫台語的白話字母，¹⁰成為蔡培火畢生致力活動。

羅馬字運動對於蔡培火具有深遠的意義，他認為語言是種溝通的工具，在日治時代可以聯繫本島人與內地人，而在國民政府遷台後，羅馬字運動仍然需要持續進行，因為國民政府遷台之後，也需要跟原本住於台灣土地的人打交道，而彼此要親近最好的方式是突破語言的隔閡，這時，羅馬字便可以派上用場。¹¹不論是日治時期或是國民政府時期，都可以看出蔡培火對台灣教育之憂心，特別是他為台灣民智之開展以及獨立人格所做的努力，都可以看到他在日本所受的西方近代化的思潮的影響。

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以及羅馬字運動，是蔡培火在日治時兩個主要的活動，這兩個運動重要的並非其所帶來的影響或是成果。與其說是蔡培火面對日本帝國的抵抗，倒不如說是身為一個殖民地的知識分子，在看到了日本的知識界傳播的進步與科學的觀念，感覺到台灣人民的民智落後，加上受到了在台日人的欺壓，而發起運動。他的最終目的也希望台灣人民能夠自覺。畢竟，單純以反抗日本帝國的統治而無自覺的話對於台灣的長久發展不會有助益。

如果認真處理台灣與日本的問題，不可避免必須涉及到與中國的關係。而日本知識界則正浸淫在各種以東亞為核心的亞洲主義主張中，使得以蔡培火為典型的一種對「台灣」這個特殊身份產生的意向已經成形，既然東亞這種超脫國界的身份可以存在且被推行，同理，在台灣的台灣人理當也可以在日本統治下有自己的身份。

¹⁰ 李毓嵐，〈蔡培火與台灣白話字運動〉，《近代中國》，第155期，頁24。

¹¹ 蔡培火編著，1969，《國語閩南語對照常用詞典》，台北：正中，頁8。

肆、從台灣出發到東亞

蔡培火不喜歡國粹的民族主義思想，因為西方的科學主義進步卻是不爭的事實，尤其是到了東京大阪神戶等地方，眼見當地的繁榮衝擊，¹²主張國家應由德治，¹³王道是先於政道，只要是秉持著王道統治，自然就可以成為正統。表現在台灣方面，他主張，即使是日本的統治也可以為台灣帶來富足穩定的生活。他認為，對於日本人來說，台灣並非日本的殖民地，但也非日本本土。表現在政治體制以及教育制度方面，蔡培火本身也深知此點認識的重要性，故對他來說，承認日本的統制，維持現狀，才是對穩定台灣未來的不二法門，讓日本的統治階層和台灣人民之間原本緊張的對峙關係也得以有所緩和。於是乎，他提倡台灣議會運動，倡導地方自治，承認日本的中央政權。另一方面，處在日本統治下台灣，本身的身份意識實現需要被突顯。因為，雖然是日本統治，但是「台灣」本身的地位仍無法被磨滅，¹⁴表現於外，便是找回台灣語言，故他開始主張白話文運動。這些均非直接反對日本的政權，反而是同意日本的政權，在此前提之下，才進一步去尋求台灣安身立命的空間¹⁵。

他在日本留學過程當中耳濡目染，從歷史的感情上與實際的經濟利益兩方面，接受了當時東亞為一個完整的地理概念。他在大戰之中寫的《東亞之子如斯說》，反映了身為一個血緣上的台灣人以及國籍上的日本人，再加上地理空間裡離鄉的留學生，為了尋求一種身份的慰藉，依附於日本輿論界流行的這種大東亞身份，從而能夠跳脫出國家的框架，

¹² 張漢裕編，2000，《蔡培火全集》，台北：吳三連基金會，第三冊，頁215。

¹³ 張漢裕編，2000，《蔡培火全集》，台北：吳三連基金會，第三冊，頁239。

¹⁴ 自滿洲國的例子中可以看出，滿洲國的政權由滿清變為日本，但是滿洲國本身仍存有。

¹⁵ 台灣的政治也逐漸走向改革。且此種改革的發動是由下層社會開始，由基本的地方自治制度面發端，蔡培火認為台灣在這方面的成功是種實驗的成功，也是武士道精神的表現。

不再拘泥傳統的以血緣或是土地為依據的身份認同，而是去設想一種共同的歷史記憶。將心比心，依此類推，則不論是身處於中國大陸同胞，或是在日本的臺灣人，更或是在台灣的日本人，他們都可以因為東亞這個名詞而有共同的依歸。對他們來說，東亞作為一種身份所能提供的，是讓每個人的生存空間或活動空間不再只侷限於自己所出生的地方。

蔡培火認為在東亞的框架之下，台灣可以有自己的立身之地，因為既然認為台灣平等的處於東亞，則東亞的存在就可以賦予台灣人新的身份，不必再藉由國籍上或是種族間的認同。即使東亞是處於日本統治之下，這種統治只要是符合王道統治，是對於台灣人民來說最為合適的統治方式，可以為台灣人民乃至於所有的東亞帶來最大的幸福，如此這種統治便帶有正當性，統治即有合理性。

他對台灣身份的認識可以分為兩個部份，一部分是來自日本的對台灣的看法，另一部分則是自中國的角度出發來看台灣。在蔡培火的觀念當中，所謂的中國是個政治國度，但是因為中國領土幅度過大，所以各地的社會都有不同的特色，可說是個混合的社會。在中國血緣文化之內，台灣是一個有特殊定位的社會。他則把台灣與中國和日本的三角特殊關係看成是東亞和平關係的基點。另外，還可拿他對滿洲國的看法做參照。他認為滿洲國的存在是可以被允許的，不論是誰統治滿州，只要能夠帶給滿洲國人民最大的福利，就是最適合的統治者。或許可以就從這個立場端詳出他對台灣定位的想法，那就是，不論統治台灣的是日本人或是清廷，只要能夠秉持著王道統治，帶給當地人民最大利益就好。他把日本和滿洲國的關係，當成是中日親善的第一步，當滿洲國順利成立之際，蔡培火在日誌中對全國九千萬同胞表示，反對用暴力改革，並追隨天皇改革，即令排除中國，由日、滿共同建立一個社會也無可厚非。蔡培火更認為，滿洲國的成敗影響日本民族的興衰，也影響東洋民族的未來。¹⁶

¹⁶ 張漢裕編，2000，《蔡培火全集》，台北：吳三連基金會，第三冊，頁 317-323。

可以看出，蔡培火的東亞觀，是受到日本知識界流行思想的影響，他通過歸納日本的東亞論述，除了將台灣與日本視為可團結的一種結合體之外，同時還相信，藉由中國和日本的親善，將可以達到東亞的和平。蔡培火在大戰期間轉而主張的是王道統治，由王道統治來看中國、日本與台灣三者之間的關係。蔡培火在一生當中寫過許多詩歌、文章。其中，長篇的著作有兩本，一為《告日本國民書》，一為《東亞之子如斯想》。這兩篇分別在一九二八年以及一九三八年寫成，可以代表蔡培火在青年時代主要的思想，更可以看出當時社會以及歷史潮流帶給蔡培火的本人的影響。

一、《告日本國民書》——從台灣島內發聲

《告日本國民書》是蔡培火在一九二八年二月於日本寫成，開宗明義的表明是一個殖民地人是寫給殖民母國看的，同時也是台灣人寫給日本人；行文之中可以明顯看出蔡培火以台灣人作為對象抒發他對於日本、台灣本島、東亞等人文地理的情懷。尤其是身為一個台灣人，蔡培火不但期望自己的聲音被聽見，也期望自己的身分能夠被日本同胞所接受以及認同，特別是在日本的統治政策同化主義規劃之下。寄望台灣的政治地位能夠有所改變。

同化主義在台灣引起敵我概念的分野，因為有殖民地台灣以及殖民母國日本，所以有同化主義的出現。但是蔡培火在看到了日本也施行了普通選舉、實行政黨政治，他認為，日本人也曾經被西方人支配，但是對於台灣卻缺乏同為被支配著的同理心；日本已經脫離了被支配的地位，並且邁向了民主，應該同時改善台灣的地位。

蔡培火以批評在台日人的官僚主義出發，他並不是要直接批評日本政府所採取的統治政策，同化主義。他認為日本政府的作為並不霸道，但是到了台灣，總督以及官僚的表現就變成專制。這層關係的蒙蔽使得日本人民以及臺灣人民產生了帝國壓迫殖民地的現象。

台灣的官僚，惡用其特別立法權，施行極端以母國人（分全體母國人，祇一少部份）為本位的榨取政策，對於政治的，社會的，經濟的極盡庇護母國人，而強施榨取於我們本島人之故。¹⁷

蔡培火認為台灣人同胞與日本同胞因為台灣官僚的阻隔，雖然台灣已經在日本統治下三十餘年，但是卻對於日本人所知不多，甚為可惜。甚至於對於日本人的認識僅限於日本的帝國主義，蔡培火認為這對於日本的帝國的未來也有不良的影響。

台灣的人民對於統治者是清朝或是日本，台灣人民都具有自由選擇的權利；日本作為台灣的統治者，是台灣的人民自由選擇。那麼，日本的統治者對台灣的人民態度又是如何，蔡培火認為天皇對於其統治地的人民是一視同仁，而日本的官僚為了讓台灣的人民能夠與母國享受相同待遇，主張「需變換汝曹的素質而同化於我們」¹⁸。台灣的政治、經濟以及社會習俗皆需學習母國人，是以，台灣人與母國人才能立於相同地位。

這只是將台灣人立於奴隸地位，因為同化主義實行三十年來，只有虛名，台灣人的地反而受到了毒害，特明是在一八九六年¹⁹的「六三法」的設置，蔡培火認為這是「制定了萬病之源的惡法律……將制訂特別法律的權限授與台灣總督」。²⁰但是台灣總督卻將此濫用，蔡培火認為他們誤植「一視同仁」的聖旨。

二、《東亞之子如斯想》—東亞概念出現

蔡培火的短篇著作《東亞之子如斯想》中可以看出蔡培火對於台灣地位的看法。蔡培火將台灣視作是日本帝國的一部份，身為日本帝國

¹⁷ 張漢裕編，2000，《蔡培火全集》，台北：吳三連基金會，第三冊，頁 121。

¹⁸ 張漢裕編，2000，《蔡培火全集》，台北：吳三連基金會，第三冊，頁 123。

¹⁹ 明治二十九年。

²⁰ 張漢裕編，2000，《蔡培火全集》，台北：吳三連基金會，第三冊，頁 125。

人，蔡培火經歷的滿洲國的建立，且將日本的學說從民主思想轉變到接受滿洲國的東亞理論，襯托出蔡培火對於近代、以及東亞觀念的認識背景。

對於東亞，蔡培火主要觀察的對象是中國與日本。東亞的概念對蔡培火而言，不僅僅只是個區域，更具有相同的文化淵源，甚至可以說是同一種族（新東亞人，新日本人等同於台灣人），其所主張的東亞是不具有民族主義色彩的，例如白話文字運動，非僅單純具有教化人民的功用，反而是東亞連結的橋樑。²¹

從同胞到東洋，蔡培火敘事時有了跨國界的意識出現，但是民族意識並沒有消失，反而有不同層次的認同意識出現。近代的中國、日本或是東洋的國家，都遭受到西方國家實質上的入侵，不論是在政治、經濟或是文化方面皆然，也是因為如此，國家保障人民的功用才被突顯，武力強弱成為國家性格的重要特色，保衛人民不受列強入侵，甚至淪為殖民地，成為國家的重要課題。但是在這種情況下，國家的概念反而顯出其薄弱。近代以前，中國或是日本的統治體系以家天下或是天皇制度來統治人民，對於人民來說，沒有明確的政府體制存在，官僚只有執行操作的功用。國家的界線對自己來說沒有意義，如果在西方可以帶給人民安全的地方就是自己的國家，在東方對於國家的忠誠等於對皇帝或是天皇的忠誠。

對於蔡培火而言，即便有近代國家的出現，對政治信仰是否在國家這個虛擬的主體上，仍持保留的態度，特別是當代表國家的政府機關在蔡培火的政治經驗中不被信任，他便承續了中國傳統的孔孟觀念，主張王道的思想，將國家性格排除；最明顯的例子便是蔡培火再主張中日親善一事，中日親善可行的方法是透過人民以及文化交流等等，而不是透過中國對於日本兩個國家的談判來完成。

²¹ 當白話文字運動推行到東亞地區，此區的人民可以藉由同一文字來溝通，而此一文字是被大家所認可的，不具有優劣性質的文化價值批判。

蔡培火這種看似缺乏民族主義的東亞觀，其實反映出的是東亞本身就蘊藏廣義的民族主義的可能。對於東亞來說，還有東亞本身的存在來自於文化、歷史的傳統淵源；東亞的結合不僅是因為地理上的接近，也是因為實際利益的考量。缺乏國家性以及民族的東亞性可以藉由王道來結合，當王道的存在與否成為每個東亞人的共同的目標，那麼，東亞的和平便可以實現。

從蔡培火相隔十年，前後兩篇長篇文章可以看出，蔡培火從原本關注同化主義到轉變放大到東洋。同化主義原本是隨著日本帝國的統治政策而隨風起舞，特別是當同化主義套用在台灣身上成為欺壓人民的藉口時，蔡培火看到了也接收日本的民主思潮，他認為爭取民主有助於台灣人民取得不對抗台灣總督的應對方法。但是，就在日本國內的政局的轉變以及國際情勢的變化，蔡培火也跟隨著轉變，特別是在爭取議會設置運動屢屢失敗毫無進展的當下，當日本提出了王道樂土的概念時，蔡培火便發現了在東洋當中，日本可以尋求到自己的立身地位，同理，台灣也可以；特別是，王道的概念原本就源自於漢文化，接受王道的概念不但可以延續漢文化的傳統，更可以用以改善台灣處於劣勢的地位，同時與日本在東洋當中相提並論。

伍、王道樂土下的台灣意識

身為留日學生，蔡培火眼見西方的民主主義浪潮在日本帶來影響，從政治制度以及城市文明改變，在在都使得蔡培火深刻體認到西方進步主義以及科學實証觀念所造成鉅幅轉變。從政治體制來看，在國際環境的影響下，日本的政界以及思想界都受到了民主主義思潮的影響，這股思潮對於日本的新進知識分子來說，不僅是日本本土，對於日本來說十分重要的新附地，台灣，也應該有其民主思潮的進步，不應該只用殖民主義的統治方式來看待台灣。

蔡培火不認為反對同化主義會對於台灣人民有絕對的好處，反而可能因此受到擠壓。更何況，日本的統治對於台灣來說，也有帶來光明的一面，比方說教育和衛生等等的進步。雖說一路走來島內出現許許多多不同的聲浪，不但有來自領台日本人的反對，還有島內不同聲音，甚至同一陣營的同伴都不願意全力支持，但是對於蔡培火而言，改變台灣開啟民智遠比對抗日本的統治政權更為重要。世界各地在母國受教的千千萬萬被殖民者，經常有類似的心得。

蔡培火到了日本，接觸到了西洋文化，也信仰了基督教，西方文化歷史的精髓是以基督文明展開，蔡培火本人便能很快接受民主主義以及科學主義等思潮。信仰基督教不但在精神上也在實質上對蔡培火有所助益，例如植村正久、矢內原忠雄以及吉野作造等人，都是教徒，來自帝國核心的信仰，聯繫了在各國後進地區努力的知識分子。

日本的近代化浪潮感染到了台灣，但是，卻沒有感染到領台日人，蔡培火等台灣的知識分子面對此種斷層，自然只有直接求助於日本帝國，建議設置台灣議會，但是，卻被視做為反抗日本帝國統治的運動，這是因為蔡培火浸淫在民族運動的氛圍中，留戀來自閩南的台灣話，當然對日本統治者造成心理威脅，不過，蔡培火等人所運用的簽名、連署、宣傳和講習會等等方法，都是和平的爭取台灣人的權利，這些都是自日本本土民主浪潮中學習到的方式。蔡培火認為進步的不只應該存在知識分子，也應該傳播給台灣人民，只要台灣的人民能夠學習了近代化的腳步，那麼，日本帝國對台灣的統治，例如標榜以同化主義來開智台灣的領導方針，勢必面臨修改。他開啟台灣議會設置運動以及羅馬字運動，正是帶領台灣進入近代化的進程的努力。

從台灣意識來看，可以分為「文化認同」以及「政治認同」兩方面，而這兩種認同正是組成台灣意識不可以分割的兩部份。²²從大正時期到

²² 黃俊傑，2006，《臺灣意識與臺灣文化》，台北市：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頁 148。

昭和初期政治運動的混亂看來，台灣意識中的政治認同是處在大染缸的狀態，不僅對當下的政治認同無法達到共識；而文化認同亦然。政治上，到底是日本帝國、中國祖國還是台灣自己，文化認同也伴隨的台灣政治身份的混亂而有搖擺不定。蔡培火從滿洲國的存在得到靈感，相信只要文化的認同可以找到共同出路，並在台灣意識的組成中，把對王道文化認同的成分放大，期望文化認同可以穿越國族國家的政治疆界，將東洋各民族納入王道的光輝之下，人民便都可以安身。王道文化的概念就來自儒家文明，即使是日本的統治者，只要行為符合王道，日本帝國也可以是認政治意識的基礎。

當建立滿洲國的，提出王道樂土的理想，不但為日本帝國在東洋中找到可以運作的空間，也為台灣無以為恃的地位找到了出口，因為當時台灣處在於祖國中國以及殖民者日本之間的混亂地位，王道樂土的理想出現，忽視流行的民族國家作為劃境標準，轉而訴求文明範圍，利用日本、中國與台灣都處於儒家文明圈當中，不正好說明了台灣也是可以和中國及日本平等地處在王道的理想下？面對王道理想的訴求，蔡培火再次在本島人和內地人之間尋求平衡點，那個平衡點既不存在於日本也不在台灣人或中國人身上，而是在東亞人的大懷抱中。

這美好的理想出現來自台灣的精神上祖國，而建立者則是台灣當時的統治者日本，蔡培火找到了說服日本統治者以及台灣住民的美好理想，當東洋出現紛擾，蔡培火固然無法緩解他們，但卻在觀念上找到出路，而在這當中，台灣便扮演重要的關鍵角色，台灣所處文化的中日並存的特殊位置不再是台灣的弱勢，反而是東亞的優勢。日中停戰，王道樂土的觀念也可以因此傳播至中國，台灣便不再是次於日本或中國的依附之地，而是東亞王道不可或缺的關鍵。

陸、結論：從日本觀察到自身

多數研究台灣日治時期的政治運動或是民眾運動者，都不免會陷入對抗或是屈從的窠臼當中。蔡培火的行為卻並非如此，陳翠蓮教授將蔡培火的路線分類在兩者之外，而謂之為採取自治主義的路線。²³將蔡培火在日治時期的活動是視做為自治主義所做的努力。雖說蔡培火致力於運動的目標並非要反抗日本人，不過，不論是哪個運動，都被在台日本統治階級視為大敵，蔡培火多次與臺灣總督協調，且依照警察法的程序申請活動，但都沒有得到官方認可。而蔡培火仍認為他的作為不但沒有反抗日本帝國統治的意味，相反的，是有助於日本帝國的統治，而且也可以開啟台灣民智，他在妥協中的堅持運用包括西方的、中國的與日本的文化資源，可以是殖民地政治中具有創意的典型，但是也遭到各方反對，有時甚至也引來本島人的反彈。蔡培火雖面對荊棘難行的路途，他仍選擇持續為台灣的住民尋求有利的途徑：

我望台灣人同胞，你們要早識時勢、改變自己的頭貌、捨棄從來的奴隸根性、造成完美的人格。再一面、我望內地人同胞……做好了模樣給臺灣人看才是、就是希望大家表現立憲國所應有得襟懷拉。²⁴

在推行運動的同時，蔡培火也將現代的進步觀念帶給了台灣的住民；介紹了民主思潮以及科學主義等等西方的觀念，在日本的「一視同仁」的教育政策之下，²⁵台灣的民眾可以從不同的管道得到意見，開始

²³ 陳翠蓮，〈抵抗與屈從之外：以日治時期自治主義路線為主的探討〉，《政治科學論叢》，第十八期，頁 142。

²⁴ 蔡培火，〈我望內臺人之反省〉《臺灣民報》第八十八期，大正十五年一月一日。

²⁵ 陳培豐，〈殖民地臺灣國語「同化」教育的誕生—伊澤修二關於教化、文明與國體的思考〉，《新史學》，第十二卷一期，頁 152。

接受多元文化混融，不再只是單純「屈從」或是「對抗」的路線：無法單純的「對抗」，因為日本帝國畢竟是台灣的現有的統治者，若是反抗統治者，只有招來流血衝突；而若是完全「屈從」，又受到領台日人的不公平的欺壓，台灣人也無法完全的信服。可是蔡培火在近代化的浪潮所中找到解決台灣政治意識問題的方法，只能停留在概念與論述的層次，與時代中的民族主義浪潮不盡相符。

如果說台灣議會設置運動的目標是日本人，那麼羅馬字運動的運動目標便是台灣人，而前者以台灣不同的種族為前提要求自治，後者以祖國語言為前提要求自覺，竟又都潛在地讓中國身份介入。蔡培火在日治時期最主要的兩個活動，一個是面對統治者，一個面對自己的同胞，不論是哪種，蔡培火都期望努力去改變現狀，讓台灣的住民可以獲得更好的地位以及生活。在運動進行的同時，蔡培火也把近代化的思維帶入台灣，希望台灣的人民能面對近代化的衝擊，發現自身的地位，以及注意到台灣本身的存在意識。這樣的意識一直延續到抗戰之後，即使身為光復大陸設計委員，他也不忘用閩南語注音國父思想，讓台灣作為身分能與台灣作為身分之間，取得平衡。蔡培火最大的文化遺產，就是培養「合而不同」的台灣意識；這種意識既不抵抗日本殖民地統治也不疏離於中國文化，與一般認為以對抗建立認同的模式迥然不同。

參考書目

一、中文部份：

（一）書籍

吳文星

1992,《日據時期台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台北：正中。

張漢裕編

2000,《蔡培火全集》，台北：吳三連基金會，第一至第七冊。

黃秀政等人合著

2002,《台灣史》，台北：五南。

黃俊傑

2006,《臺灣意識與臺灣文化》，台北市：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

蔡培火編著

1969,《國語閩南語對照常用詞典》，台北：正中。

（二）期刊、論文

李毓嵐

〈蔡培火與台灣白話字運動〉，《近代中國》，第 155 期。

陳培豐

〈殖民地臺灣國語「同化」教育的誕生－伊澤修二關於教化、文明與國體的思考〉，《新史學》，第十二卷一期。

陳瑋芬

－〈自我的客體化與普遍化－近代日本的「東洋」論及隱匿其中的「西洋」與「支那」〉，《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十八期。

－〈「道」、「王道」、「皇道」在近代日本的詮釋〉，《中山人文學報》。

陳翠蓮

〈抵抗與屈從之外：以日治時期自治主義路線為主的探討〉，《政治科學論叢》，第十八期。

蔡培火

〈吾人之同化觀〉，《台灣青年》，第一卷第三期。

〈終日親善の要諦〉，《台灣青年》，第三卷第三期。

二、英文部分：

（一）書籍

Takekoshi, Yosaburo, “*Japanese rule in Formosa*”, New York, London, Bombay and Calcutta,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07

The East Asia identity in Taiwan During The Japan-Ruled Period through Reading Cai Pei-Huo' Consciousness of Taiwanese.

Xin-Yi Yan

Abstract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paper trying to understand identity consciousness of Taiwanese during the Japan-ruled period through reading Cai Pei-Huo.

Form his view , we can know the discourse of identity can beyond be the limits of states and nations. He begins from the idea of "Oodoorakudo" criticize the policies of Japan . Though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the movement of petition for Council, he also noticed that the rise of Taiwanese consciousness . Although the movement failed, it still had enormous effect upon Taiwanese consciousness.

Cai Pei-Huo not only as a Taiwanese, but also as a foreign student in Japan. During his study at Japan, he was aware of the idea of “Oodoorakudo”, which is the way to solve the different concept of Japan and Taiwan identities for him. Through the identity of “East-Asia”, it can mitigate the tension between Japan and Taiwan Island, become the bridge of peace in East-Asia.

Keywords: Oodoorakudo, Cai Pei-Huo, East-Asia, Taiwanese consciousness.

